

第 **1** 集
修订合编本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长沙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

(修订合编本)

第一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责任编辑：徐日晖

装帧设计：张小平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1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348,000 印张：15.5 印数：1—8,100

统一书号：11109·176 定价：1.45元

(内部发行)

重 印 说 明

一九六一年十月，政协湖南省委员会开始编印《文史资料》（自第四辑起，易名《湖南文史资料》），至“文化大革命”前共编辑出版九辑。由于每辑印数很少，又经十年动乱，这些选辑现在均不易找到了。为供广大史学工作者和读者研究近现代史的需要，特修订重印，每两辑或三辑合订一集，分四集出版，改名《湖南文史资料选辑》。

此次重印，删去了个别史实有出入的文章和附载的文件。

政协湖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一年一月

目 录

发刊词·····	(1)
辛亥革命前后回忆片断·····	程 潜(3)
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	李书城(25)
与黄克强相交始末·····	章士钊(61)
关于黄兴、华兴会和辛亥革命后的孙黄关系·····	周震麟(74)
回忆先君克强先生·····	黄一欧(86)
追忆蔡松坡先生·····	唐才质(97)
辛亥湖南光复的片断回忆·····	阎幼甫(100)
辛亥长沙光复的东鳞西爪·····	余 韶(120)
辛亥湘西光复经过·····	黄穆如(129)
谭心休招抚宝靖始末·····	李晴云(136)
启蒙时期青年运动的急先锋——禹之谟·····	邓介松(142)
关于邹永成的二三事·····	邹协勋(152)

发 刊 词

发动在旧社会具有丰富经历的人们，特别是那些曾经参与过各次重大历史事件的老年人士，及时把自己亲身经历的社会各方面的变化及所熟悉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秉笔直书地写出来，传给我们的后代，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湖南在我国近代历史上处于重要的地位，往往成为各种力量（革命和反革命以及反革命的各个派系）斗争的焦点。从清朝末叶到解放以前，湖南经历过无数的大小事变，其中有一些具有全国的意义；也产生了不少的重要人物，他们的活动和影响，远远超出了本省的范围。这些历史事件的演变和历史人物的活动是错综复杂而又丰富生动的。如何把这些历史事件的演变和历史人物的活动真实地、全面地反映出来，乃是年老一辈的人，特别是曾经亲历其事的人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政协湖南省委员会根据周恩来主席在全国政协一次茶会上号召“具有丰富经历的老年人士，把他们的亲身经历和见闻纪录下来，传之后代”的指示，在中共湖南省委的领导下和政协全国委员会的指导下，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开展了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由于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决定编印《文史资料》这一不定期刊物，陆续出版，以便更好地保存和积累所征得的史料，进一步推动史料撰写工作的开展。

我们所征集的是历史资料，即作者根据他们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所写的具有历史价值的第一手资料。因此要求内容必须真实具

体。但撰写稿件的文字体裁，可不加限制。至于同一历史事件，几个人所述互有出入，除了由于记忆模糊而产生的明显的错误可以商量订正外，也可以各存其是，不必强求一致。我们在征集稿件和编印集子当中都贯彻了这些原则。

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文史资料》第一、二两辑，都是选载辛亥革命时期的史料。

当《文史资料》出版的时候，我们谨向撰写稿件的各位先生致以谢意，并希望各方面人士今后继续踊跃投稿，共同努力来完成党所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辛亥革命前后回忆片断

程 潜

我于一九〇四年十月到日本东京，在振武学校肄业。是年十二月，我和湖南留日学生黄兴、宋教仁、程子楷、赵恒惕、欧阳振声、曾继梧、陈强、仇亮，云南留日学生杨振鸿、罗佩金、殷承瓛、郑开文、唐继尧，直隶姜登选，江苏章梓、伍崇实，河南曾昭文等共百余人，组织革命同志会，从事民族革命。翌年八月，同盟会成立，我因仇亮介绍，加入了同盟会。

我加入同盟会不到几天，仇亮引导我到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日人金弥宅，谒见孙中山先生。先生态度和藹可亲，与同志谈，谆谆不倦。我请面示革命方略，先生指示三点：

一、首先打倒自己脑海中的敌人，抛弃富贵利禄的观念，树立爱国家爱人民的思想，服膺主义，不与敌人妥协。

二、革命军占领地区，必须立即成立政府，以为号召，即使占领地区小至一州一县，亦应如此。

三、慎选革命基地，以发展革命力量。

孙先生言尚未竟，我插问一句：

“中国如此广大，选择革命基地，究以何处为宜？”

他讪漠在胸，不假思索地说：

“革命必须依敌我形势的变化来决定，如形势于我有利，面于敌不利，则随处可以起义。至于选择革命基地，则北京、武汉、

南京、广州四地，或为政治中心，或为经济中心，或为交通枢纽，各有特点，而皆为战略所必争。北京为中国首都，如能攻占，那么，登高一呼，万方响应，是为上策。武汉绾毂南北，控制长江上下游，如能攻占，也可据以号召全国，不难次第扫荡逆氛。南京虎踞东南，形势所在，但必须上下游同时起义，才有成功希望。至于广州，则远在岭外，僻处边徼，只因其地得风气之先，人心倾向革命，攻占较易；并且港澳密迩，于我更为有利。以上四处，各有千秋，只看哪里条件成熟，即可在那里下手；不过从现时情况看来，仍以攻取广州，较易为力。”

此外，他还讲了许多有关革命的道理与经过，我都能有所领会。自从我亲聆这次教诲以后，一时思想大为开朗，从此衷心服膺三民主义，并心悦诚服地敬佩先生。此情此景，印象最深，至今不能忘怀。

不久，我到姬路野炮兵联队入伍一年，随即转入陆军士官学校，至一九〇八年十二月毕业。适川督赵尔巽调我和姜登选、舒和钧、王凯成四人入川训练新军，于是受同盟会委派，我担任了长江上游联络员。

我们到达四川后，赵尔巽派我充任陆军第三十三混成协参谋，姜登选充任工兵营管带。就职一个月后，我同同盟会少数同志详细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研究了四川的情况，认为要在四川进行革命，就应立个行动纲要，以为守则。当时拟定的行动纲要，大致有如下四点：一、服膺三民主义，始终不渝；二、稳步发展组织；三、切实把握军事实力，应付事变；四、联络一切力量，共策进行。我们当时认为，只要这个纲要能够切实做到，那么，他方一有动作，我们可以立即响应；他方未有动作，我们也可以掌握时机，随时发难。我们商妥后，即邀集林修梅、杨瑾、季雨霖、舒

和钧、梁达沅等同志开秘密会议，讨论行动纲要，得到一致同意，当场并推我主持其事。这是一九〇九年二月的事。

那时协统是旗人锺颖，我们对他很为警惕。到三月间，川督调他带兵入藏，协统一职另调东三省道员朱庆澜接充。在朱未到差前，锺颖把混成协的事务交我代办，他专筹划入藏事务、有时也同我商量调动军队与安排人员的问题。入藏军队约二千余人，编为三营。第一营由防营改编，管带陈庆，二、三两营均由陆军合编，二营管带为张葆初，三营管带为林修梅。五月间，锺颖所部从成都开拔入藏。锺走后一个月，朱庆澜才到成都接事。

朱庆澜素有廉洁勤敏之名，有虚心好善之意，同我相处，亦颇融洽。赵督打算扩编新军为一镇，交朱筹划。朱问计于我，我说：“由协扩编为镇，要解决五个问题：其一为总方略；其二为迅速设立讲武堂以训练干部；其三为购买枪炮器材服装；其四为加紧建造营房；其五为增购马匹。除第一项属于国防，须经我们拟定后呈请军谘府核定外，其他四项，应有一年半的准备，才能成镇。”朱以为是，属我草拟计划，交赵督批准。朱推荐我担任购买枪炮器材服装的任务，并得督练公所总参议黄忠浩的同意，于是赵尔巽委我为主任，派兵备处杨瑾、曾广开为随员。我本不乐意担任这个工作，经姜登选力言，到长江中下游走一趟，多多联系同志，对革命大有好处，我才决意担负起来。

这年十一月，我们一行三人从成都出发。到了武昌，见到了统制张彪、协统黎元洪。我们在武汉三镇，参观了兵工厂、纺纱厂和陆军三十二标。三十二标训练甚好，士兵体操技术也很高明，为各地所少见。协统王得胜、刘韞玉，统带曾广大、李襄邻，将湖北建立陆军的经过情况，向我们作了详细说明。与这些高级军官接触，给我一个印象：我认为他们都是循规蹈矩、怕惹是非的

人，一旦军队有事，他们是不会从中作梗的。

在武汉逗留期间，我特别着重对下层情况的了解。经过考察，得知党人在两湖一带活动最力，革命空气十分浓厚，许多青年学生都投入新军，以展其救国的怀抱。上年冬，湖北陆军中，即有蒋翊武等组织群治学社（文学社的前身），社员如李六如、杨王鹏、廖湘芸等，都是思想进步、才能出众的人物。杨瑾与蒋翊武是旧交，我这次到武汉，因杨之介，得与蒋见面。我们两人谈话的内容，多为有关革命运动的进行问题。翊武说：“在湖北一镇与一混成协的新军中，有许多革命志士；不过因为禁网严密，侦探密布，我们文学社未便在他们之中大事发展，只能稳步前进。宪兵方面已有联系，所以我们的活动得以安然无事。”我当即告以四川方面的情况，并谓只要军队训练成熟而又为我们所掌握，只要切实执行我们的行动纲要，我想四川虽暂时落后于两湖，不久也可以迎头赶上的。翊武又说：“孙武、居正等领导的共进会，与文学社合作得还好。听说谭人凤、焦达峰在湖南也有共进会的组织，今后亦应联合一致，共策进行。”我对他的意见极表赞同，相约各自努力而别。一九一〇年二月，由武汉到上海，在沪完成任务之后，又抽空往南京一趟。四月间，告假一个月，经长沙回醴陵省亲。六月间回到成都，仍供原职。

一九一〇年冬，四川陆军第十七镇正式成立，统制为朱庆澜，我任正参谋官，两位步兵协统由五十五、五十六两标统带施承志、陈德都升任。步兵中有一位统带叫叶荃，是同盟会会员，与炮兵统带、工兵管带一起，均同我们有联系，一旦有事，可以运用自如。惟姜登选没有升任为步兵统带，是一缺点。过了年，即一九一一年正月间，接但懋辛来信，大意是，“近得异人传授法术，要往广州学道，无法分身回州，有负盛意”等语。这是暗语，不久

果有广州三月二十九之役，但懋辛是亲自参加这次起义的。但既不能回川，我们只好另外找人来代替他做联络工作。

四月间，川督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总督，川边大臣赵尔丰接充川督。此时全国人民正受着黄花岗烈士死难的刺激，义愤填膺；复有铁路国有风潮，川、粤、湘、鄂四省人民纷纷成立保路同志会，各派代表赴京吁请清政府收回成命。闰六月中，接家电，得知父亲病故，只好请假回籍奔丧，把我担负的同盟会的工作交给姜登选接办。我于闰六月二十三日动身，取东大路返湘。朱庆澜送我至成都东郊，以时局演变甚剧，究应加何应付相询。我因简略进言，大意是：“老百姓与士绅反对铁路国有的风潮越来越扩大，十七镇新军是为捍卫国家而设的，以不介入这次风潮为好。我闻新督性情急躁，统制似应多方进言，总以不激起大变为妥。去年长沙抢米暴动，岑春煊、庄庚良受到撤职处分，连新军协统杨晋也牵连受累，可为前车之鉴。此次风潮远远超过长沙抢米暴动，希望统制相机行动。如有紧急，姜登选沉着勇毅，胜我十请，遇事请与他商量。”朱颇首肯，互道珍重而别。

我从成都急行七天，到了重庆，其时川南、川东各大城市已纷纷罢市。从渝坐船东下，七月二十日抵达长沙。在长沙见到了文斐。他说：“自广州起义失败后，黄兴、胡汉民已不能在沪露请。但宋教仁、陈其美等已奉命从港到沪，组织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联络长江各省同志，指导各地工作。”我说：“这个组织极为重要。我们近年来，各省工作都是各自为政，既无联系，又无统一计划，徒然使工作受到损失。现在有了这个组织，今后工作定会大有进展。”此外，又谈了一些有关湖南反对铁路国有的情形，彼此预感到革命时机行将成熟，遂互相勉励努力革命工作而别。

七月底，我回到醴陵，安葬好父亲，已是八月上旬了。其时，

接朱庆澜来电，大意是，四川省派我为永平观操员，须于二十日赶到北京报到。我因于十四日从家动身来长沙，又会见了文斐。他说：“浏阳人焦达峰在湖南组织了共进会，对新军士兵有联系，对会党也进行了不少工作。”我说：“四川会党极盛，我竟对之束手无策。我认为，会党流品很杂，运用这种力量，如不能操纵自如，以后必致发生流弊。我是着重在军队方面进行工作的，对会党，我不甚重视。我现欲借观操机会到北方看看，你以为如何？”文斐很赞成我北上一趟，恰好在长沙碰到程子楷由广西省派赴北京观操，正好同行。

八月十六日，我与程子楷到了汉口，到武昌寻找蒋翊武，没有碰到。十八日乘车赴京。十九日车抵彰德，得知武昌起义。是日午后到京，始知秋操停止举行。因与程子楷商量，最好立即南下，参加革命，以遂平生之愿。时京汉路已停止客运，只有赴津航海南下一条路。其间因子楷得病，稍留至二十七日才到天津，候至三十日搭商轮南行。沿途在各港起货上货，直到九月七日始抵上海。从京至沪，沿途所见，截然不同。京津两地，熙来攘往，仍然一片昏昏沉沉。上海则革命空气十分浓厚，尤以工、学、商三界表现最为热烈，令人兴奋。计自武昌首义，至九月十三日上海独立，不出一月，全国即有七处起义，声势之壮，为前所未有的。

在沪得知黄兴已于月初从港经沪转赴武汉。我与程子楷商量，决定同赴武汉。同路还有邓希禹、黄子伟二人，他二人均系清廷文官，愿意弃职从军，真是难能可贵。我们一行四人，于十三日从沪乘轮赴武昌，轮船准期到达汉口附近，停泊洪山江心。我们雇了民船登陆，面见洪山防守司令，说明我们是随黄兴来武汉助战的。防守司令立即写了介绍信，让我们进城。这天下午，下了一场秋雨，泥泞载道，我们冒雨步行三十里，到了武昌，城门紧

闭，守城士兵验看介绍信，才放我们进城。城内人人精神焕发，意气轩昂，确有一番革命新气象。又见市上间有青年，身着青缎武士袍，头戴青缎武士巾，巾左插上一朵红绒花，足穿一双青缎薄底靴，同舞台上武松、石秀一样打扮，大摇大摆，往来市上。我想，这大概是“还我汉家衣冠”的意思吧！

黄兴得悉我们到了武昌，即于当晚派唐蟒前来，把我们招待到客栈住宿，并表示欢迎我们参加汉阳战事。第二天，即十八日，唐蟒带路，由鲇鱼套过江，到了汉阳昭忠祠总司令部。克强见我们来了，十分高兴。我们谈论了当时两军对峙的情形，得知湖北陆军自起义后，破坏了原有建制，原有管带以上官长，由于士兵不服，多已离开军队；因此，汉阳军队虽有三协和一标步兵，但由于统兵官不够，或者统兵官军事水平不高，所以力量显得有些单薄。不过士兵为革命精神所鼓舞，士气尚好。至于敌方，此时业已起用袁世凯，并派冯国璋率军两镇南下，与我作战；惟山西、陕西先后独立，清廷在在需要设防，所以除冯部两镇外，要再派兵南下，也很困难。又自十三日上海宣布独立，十五日苏、浙宣布独立后，为张勋所窃踞的南京已成一座孤城，只要苏、浙、沪合军进攻，南京即可攻下。可见汉阳战役，关系至巨，如果一战而胜，则革命形势即可稳定。

以上就是当时的基本情况，是这次见到克强同大家谈话后所总结出来的。克强并说：“湖南已派王隆中率新军四十九标和巡防营数营援鄂，我们革命声威益振。”言下对战局殊为乐观。当时谈话在座的，我记得有谭人凤、参谋长李书城、副参谋长吴兆麟和同学曾继梧等。谭白发矍矍，语言耿直，给人印象最深。总司令部组织异常简单。克强留我们吃便饭，饭后继续谈话。克强说：“湖南关系甚大，在焦、陈（作新）遭人暗算之后，问题颇多，最

好我们有同志前往联络，共策进行。汉阳战事，我已派曾继梧指挥炮兵团，颂云来得及时，就请你帮助凤岗（继梧字）”。我说：“不论什么工作，只要对革命有利，我们都是应该做的。凤岗是我们的同志，我们一定会合作得很好。”谈至此，即辞出。

从总司令部出来，我与继梧随即亲至龟山下选一古庙作为指挥部，并委派邓希禹、黄子伟任秘书。接着又上龟山察看炮兵阵地，见有日本三十年式七生五野炮六门、汉阳仿造克鲁森五生七山炮十八尊，炮位布置合法，还构筑了临时掩护工事。询问炮兵，得知是第八镇炮兵团的老兵，是训练有素的。惟山炮口径小、射程短，不能发挥多大作用；所幸野炮虽已陈旧，尚属可用。我在龟山了望汉口，得见租界外的房屋，大都为清军焚毁，情状异常凄惨。平日万船云集的襄河，也空无一船。一幅战时景象，呈现在眼前。我认为，既有这样的阵地，而清军却纵火焚毁人民房屋，甘与人民作对，可以说，我们既得地利，又得人和，器械虽腐朽，只要发扬革命精神，是可以取胜的。

二十二日，湘军协统王隆中率军到了汉阳，这是武昌起义后首先得到的援军，人心为之大振。王隆中与我，是日本士官同学。湘军将领卿衡、鲁涤平、胡兆鹏等都是湖南武备或陆军速成学生，尚能团结一致。只是湘军五十标自杀害焦、陈、拥护谭延闿后，势力有所扩展，而四十九标奉命援鄂，反而不免向隅，所以四十九标官兵咸感不平。不过自从开来汉阳后，由于大敌当前，大义所在，大家也就没有什么议论了，军心仍很坚固。二十二日夜晚汇报，我把此事报告克强，克强答应格外加以慰勉。汇报时，在座的除新添王隆中一人外，仍旧是谭人凤、李书城、程子楷、吴兆麟、曾继梧和我几个人。这晚集中讨论进攻问题，谭人凤首先说：

“湘军已到，正好从速进攻，不能拖延。”

克强接着说：

“许多同志都与谭石老所见相同，这是个重要问题，请大家多多讨论。”

我对此有不同的意见，即说：

“我军士气昂扬，胜敌百倍，这是不待言的。但就现时情况论，我军兵力单薄，建制已破，新旧兵参差不齐，这也是事实。我认为，最好是利用长江天堑和各省响应独立的声威，作防御中的攻势准备。使敌人不敢越襄河一步。再派得力部队渡过襄河扰乱敌人侧背，牵制敌人，使之力量分散，不敢一意向我进攻，这也是用兵的通常办法。只要再坚持一月，援军日多，北方定有变化。”

克强不同意我的意见，他说：

“你这办法十分稳妥。不过以今日情形论，即使扼守汉阳不动，也嫌兵力单薄。”

程子楷插一句：

“防守汉阳，必须巩固蔡甸，蔡甸巩固，汉阳万全。”

李书城立即接上一句：

“蔡甸已派得力部队防守，且与此地相距很近，亦可随时策应。”

谭石老迫不及待地大声说：

“现在我军士气旺盛，正好进攻，无须迟疑，还是趁热打铁，不必‘刻舟求剑’的好。”

我看谭石屏的议论，跟我针锋相对，因而我说：

“石老的话必有所本，能够代表多数同志的意见。我意力主速攻的同志，因为受压迫太久，怀恨甚深，屈螭求伸，自是热血灌

顶的表现。但这个敌军，非有坚强的实力或革命的内应，是不可能一击即破的。事关重大，值得再三思考。”

王隆中初到汉阳，勇气百倍，也力主速攻。我看主速攻者太多，孤掌难鸣，最后只好说：

“必须就敌我情势、兵力多寡、训练优劣，作通盘打算，最好请总司令作出最后决定。”

至此，讨论中止。是日各方传来消息，如桂、闽、粤三省的独立，海军的起义，都足以振奋人心。尤其是海军起义关系特别重大，因为有了海军巡弋江面，首义的武昌便可解除许多顾虑。

二十四日汇报，同志们莫不意气昂扬，兴高采烈。有的说：“在这样有利形势下，即使进攻不利，但因海军在我们这一边，敌人也无法飞渡长江；更何况各省都在陆续响应，宣布独立，声威之大，足以寒敌之胆。”我对进攻虽持不同意见，然大势所趋，我也不能独执己见。克强因作最后决定，准备进攻。当时总司令所辖各军兵力如下：

鄂军：

步兵第一协	协统	蒋肇鉴
步兵第四协	协统	张廷辅
步兵第五协	协统	熊秉坤
步兵第四标	统带	胡效辜
炮兵团	司令	曾继梧
工程第一营	管带	李占魁

湘军：

步兵第一协	协统	王隆中(四十九标全部)
湖南巡防营四营	统领	甘兴典(约千二百人)

总司令部兵站司令 王安澜

为了过河进攻，总司令下令工兵营在琴断口附近架设便桥。总司令于二十六日下令，定于二十七日拂晓进攻汉口大智门之敌，企图一举突破，收复汉口。关于攻击目标、各军攻击部署和任务以及各部队渡河时刻，命令中均有详细规定。总司令亲率幕僚，于二十六日夜随同各军前进。我指挥龟山阵地炮兵，准备射击，以掩护各军前进。各军遵照命令渡过襄河。湘军为先头部队，渡河后即向博爱书院堤岸前进，与敌前哨线发生了冲突，惟枪声不密。我在龟山上看得大智门一清二楚。我想，我们这样堂堂正正的进攻，敌人当然早有准备。我自到汉阳后，每夜听到敌人机关枪声通宵达旦不停，而今晚却万籁俱寂。由是我才悟到：敌军官长平日为了睡得安稳，不惜牺牲子弹，乱放一阵，表示有备；今夜不同，官长不睡了，各自站在火线上，是准备要跟我们拼一下的。

当前哨战开始时，离拂晓还有两小时。我命令向大智门发炮，十余分钟后，敌炮才对我回击。在昏天暗地中，敌人的炮弹全落在龟山后面，我们的炮更处于劣势，也没有命中目标。经过前哨战一小时左右以后，遥望博爱书院堤岸一带，始而大火熊熊，继而步枪声拍拍作响，又继而机关枪声砰砰齐鸣，最后则炮声轰轰震动。不到一个小时，这些声浪渐来渐稀，知道敌人前哨已撤回本阵地了。于是我又下令大小炮位，向大智门猛轰，敌炮不稍示弱，也向我阵地反击。正在炮战激烈中，东方渐渐发白。在龟山上，我看到两军的动作，历历在目。剧战经过三个多小时，敌军总在原阵地胶着不动，这就说明我进攻部队遇到了顽强抵抗。敌人能够顽强抵抗，必有工事与地形地物的障碍，阻滞我军不得进展。因忆数日前，我谍报报称：大智门一带，地形复杂，障碍甚多，敌火焚汉口市后，又利用残垣破壁，做了许多工事。我想这些工

事，如无重炮对直摧毁，是不易攻破的。如今战斗呈胶着状态，我军不得进展，势必要受到挫折。果然未到正午，忽见我军有一部分队伍，从博爱书院堤岸后退，未几影响全军，各部队都争先恐后地纷乱溃退。这场暴风骤雨的战斗不终朝而风消云散。从军语上说，我军在这场战斗中，叫做攻击不奏效。不过敌军始终居于被动地位，当我军退却时，并未跟踪追击。对我来说，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实战的经验，也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一次经验。

这天午后四时，克强回到昭忠祠。他跟平日一样，仍然态度雍容，意志坚定，真不愧是个革命领袖。他从来就不以失败归罪于人，成功引为己有，而是遇事引咎自责，所以能够博得同志们的敬仰。这次进攻受挫，他的态度还是如此。有人说：“这次进攻，功败垂成，是因为湖南防营要吃中饭，一部分后退，才牵动全局的。这虽于总司令声名有损，但作战命令对动用携带口粮已有明确规定，防营不照命令办事，岂能归罪于最高长官？”也有人说：“军队复杂，未经整理，即上阵作战，受此挫折，也是责有攸归的。”平心而论，克强抵鄂不过十余日，湘军到汉阳亦不过数日，各军官兵都急于要迅速进攻，革命意志高昂，气氛紧张，也是不能让克强从容加以整理的。总之，在这样情急势迫中，能够指挥进攻，取得主动，即是一种胜利。人们不察其时实情，事后论长道短，不是历史家应有的观点。何况此一战，影响所及，实际上结束了清廷二百六十八年的君主专制统治，自有其一定的价值，事实具在，岂容抹煞！

克强因进攻汉口失败，某日找我谈话。克强认为，我军进攻失利，汉阳岌岌可危，要我迅速返湘，联络湘省当局，准备一种持久力量。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并建议克强，在中山先生未回国以前，负起领导全国革命的责任，及早摆脱汉阳前线指挥任务，驰

赴上海，设法攻下南京，作为革命根据地。克强深以为然。越数日，我即回湘，克强旋亦离鄂赴沪。

我回到长沙不久，南京即告光复，从此转入停战议和阶段，因此我回湘后的活动，就没有在汉阳作战时的那么紧张了。此时同谭延闿的接触则很频繁。

辛亥革命后，谭延闿（组庵）以一谘议局议长一跃而为湖南都督，应该是心满意足、笑逐颜开的。但他终日坐困愁城，眼红脸黑，感到很苦恼，这是什么原因呢？其中有这么四点：一、他好用权术，联甲制乙，用丙控丁，使之互相牵制，彼此猜疑而皆倾心于一己，不过以此却使内部意见分歧，不能团结一致。二、革命后，人事安排最不合理，投机者捷足取得高位，有功者依然屈居下僚，以此咸感不平。三、湖南六个师，系由焦达峰、陈作新执政时扩编而成，其中许多干部为革命元勋，动辄恃功集会要挟，以致纪律荡然。四、各师有名无实，兵多械少，虚糜国帑，经费异常支绌。组庵面对这个局面，一筹莫展，所以烦恼起来了。一九一二年五月间，他听到黄兴在南京大刀阔斧地一次解散了十几万军队，风平浪静，安然无事，使他羡慕不置。有一天，他找我密谈。他说：

“克公在南京，仅仅两个月时间，遣散了十几万军队，没有发生事故，不知他采用什么方法，面收功如此神速？”

我针对组庵的弱点，对他说：

“克公公忠体国，解散南京十几万军队，不是靠留守地位，而是靠他平日革命的声望取得成功的。”

他紧接着我的口气说：

“湖南经费支绌，养不起许多军队，你看，能否假克公的威望，来一个大裁兵？”

谈近此，我对湖南军队情况作了点分析，便说：

“凡是爱国的人，都认为湖南应该裁兵。比如第三师，程子楷和我，便心同理同，具此愿望。第一、二两师，实力较薄，裁兵亦较易为力。应当注重的，反而是四、五两师，如能得到这两师同意，问题可迎刃而解。”

组庵高兴地说：

“第五师，我可与梅馨商量，但一、四两师则非你去说服不可。”

同时，他并请我到上海走一趟，向克强请求援助。我即说：

“此事一旦泄漏，诚恐发生意外，还是请你另派妥员办理的好。我能力办得到的，无不尽力帮助。”

他认为妥善，乃于六月中派机要秘书吕苾筹赴沪谒见克强，请求克强对湖南裁兵事作出主张。克强不赞成裁尽，主张留两师或三师以应缓急。吕用电报将克强主张告知组庵、组庵回电，大意是，裁汰改编，必致发生争议，不如一律退伍，另建一支新军，较为妥善。但组庵手无寸铁，要实行这个方案，甚感棘手。适当时第八师赵恒惕一旅，原系从广西带来的新军，器械精良，因赵与第八师将领不甚融洽，从南京返桂，路过湖南，如组庵截留调用，则湖南裁兵得有监视的部队。而第八师也可以新招一旅补充，以解除上述不融洽的矛盾。广西陆荣廷平素厌恶新军，赵不回桂，亦足以解除陆之顾虑；而于赵旅则得到安身之所。一举四得，皆大欢喜。经过与有关方面的协商，组庵的裁兵方案就决定了。八月中，赵恒惕率旅回桂，道经长沙，借炎暑为名，假长沙休养。至是赵旅为组庵截留调用，即开始裁兵运动。组庵求我对第四师作说服工作。我和王隆中是同学，交谊很好，前后与王商谈两次，结果他竭诚赞成裁兵。王隆中耿介忠厚，深明大义，殊令我钦佩

无已。我把这个消息告知组庵，组庵闻之大快，并亲自与王商谈一次。经过以上的酝酿与协商，才正式组织裁兵委员会。委员会开过几次会，我主张每师留二营，加以训练，作为今后成立新军的干部，但结果却作出了一律裁撤的决定。决定对各师所有官兵，分别年资与革命功勋，一律优给退伍年金。计共裁撤官兵四万几千人，跟南京遣散军队一样，没有遇到阻碍。只有各师学生出身的军官，事后颇有烦言，惟因兵心安稳，也鼓不起什么风波。到十月三十一日克强回到长沙时，裁兵已将办理完竣。

克强回到长沙，全省各大中城市居民欢喜若狂，长沙举行了空前盛大的欢迎会。组庵对他推崇备至，事事都听他指示。克强主张：革命党人应该团结一致，政治上展开民权运动，经济上振兴实业，教育上培养人才，多派学生赴欧美留学，军事上训练一支新军，并推荐张孝准任军事厅厅长。张曾在德、日学习军事，学识很好，担任过留守府军务厅厅长，经验丰富。如张出任厅长，湖南可望建立一支新军，以为全国楷模。其时，组庵心广体胖，安心做个文治都督，把所有师长，如余钦翼、赵春霖、王隆中、梅馨、蒋国经、向瑞琮一起送赴北京授官给禄。从表面看，湖南局面一时好象海晏河清，于是专心致志筹办第一届议员选举。至于训练军队工作，同盟会的同志都属望于我；不过我有志兴办实业，在岳阳已筹办一所制革厂，所以对于练兵的事不感兴趣。那时，湖南原武备、兵目、速成各学堂及两标学兵出身的军事人才很多，裁兵后他们失业了，而政府却以为发给了退伍年金，即可安然无事，詎知事实正相反。到一九一三年新年，渐渐议论纷纭，局面开始出现动荡状态。张孝准建立新军的计划，在四个月中并无若何进展：一则由于组庵优柔寡断，拖延时日，二则由于孝准人缘不熟，无法推动。而大多做失业军官，则已由口头议论，进

而结党成群，企图推翻张孝准。至于政治方面，议员选举结果，国民党虽取得多数，实则全无根柢，许多人不仅不知三民主义为何物，并且醉心利禄的官僚分子亦多摇身一变，混入国民党内。幸因宋教仁回湘，一番欢迎伟人的热闹气氛，暂时掩盖了上述的矛盾。

宋于二月十七日回湘，到处演说，力倡责任内阁制，企图以议会为武器来制服袁世凯的专横独裁。我和宋在欢迎会和宴会上，几乎每日见面，可惜无法深谈。因私人设宴招待他，我得间向他提出三点：一、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内部复杂，即令将主义与政纲降低水平，意志亦不能统一；二、起义各省，其属于同盟会者，有名无实，同志间精神涣散，并无中心力量作为国民党核心；三、袁世凯依靠武力，专横独裁，目无法律，安问政党。有此三点，而欲实行责任内阁制，不能无疑。宋答以实行责任内阁制正所以制服袁之专横，如政治不能上轨道，再作道理。我又劝他，工作应以训练党员为中心。他认为有此必要，并说湖南应从速训练军队。谈话并不投机，草草收场，此后便没再谈了。

宋离湘后，省内骚动即日趋紧张。到三月十三日，退伍军官以兵目学生易堂龄为首，假反对张孝准为名，运动少数巡防部队，围攻都督府，当经卫队击退。翌日查出主使人犯，组庵大起恐慌，请我到府会商处理办法。我建议：将主谋拘禁，其余从宽，只要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就可迅速解决。组庵深以为然，即将易堂龄拘禁，其余从宽一概不究，一场风波，归于平息。

风波平息后，孝准辞职，组庵要我继任。我早看到国民党与袁世凯的斗争必将尖锐化，湖南关系甚大，即令此时迅速练兵，亦势难挽救危局，我若陷入军事机关，实在用非其才。但组庵坚持要我担任，并谓：“这回风潮虽已平息，但人心浮动，非你出来

不足以镇定人心。”至是我乃推荐陈强、程子楷以自代，组庵均认为不可；组庵反挽程子楷与赵恒惕劝驾，再三怂恿，我始应允。我于三月十五日就职。打算首先成立两团，严格挑选干部，加强训练，作为模范。詎知二十日即有宋案的发生。

宋案发生后，国民党中枢一面坚持由法律解决，一面准备实力以应付事变。四月底，由李烈钧发起赣、皖、粤、湘四督秘密联盟，并以黄克强为中心，进行反袁斗争。四省反袁的实力和情况，大致如下：

克强上年在南京解散军队后，又另外编成了四个师，以陈之骥（第八师）、章梓、章驾时、冷遹分任师长。四师靠苏、皖两省财力支持，不虞匮乏，器械也比较精良。假使从建军起，克强能慎选将领，严加训练，则到宋案发生时已有一年之久，南京四师应该业已成为劲旅，足以应付任何事变。无如一年以来，领导无人，致使军队有名无实。例如陈之骥系冯国璋女婿，官僚气味浓厚，旅长黄恺元为湖北富商之子，两人虽具有爱国反满的热忱，却少推倒袁氏的本领。王孝缜（第八师另一旅长）算是耿介之士，但亦非济变之才。章梓虽富于革命性，却为一纯粹文人。其他自诨以下，不足深论。这些军队以领导不得其人，所以训练并无成绩，组织亦甚复杂，正如一盘散沙，实无作战能力。南京之外的四省，如皖省军事力量，即包括在南京四师之内，此外别无军队；而在政治上，又意见分歧，尔虞我诈，在在堪虞。江西军队号称两师，实则只有留守府拨给的林虎一团可以作战，其他皆蹈言过其实之病。广东僻处岭外，亦无训练有素的军队，面胡汉民与陈炯明同床异梦，更是致命之伤。至于湖南，已如前述，一兵一卒未练，仅恃赵恒惕一旅，倚为长城。由上所述，可见四督联盟，军力异常脆弱，内部团结亦有问题，只不过在政治上提出反袁的号

召而已，而四督联盟之不足以抵抗袁氏的进攻，却早在意料中。加之，黎元洪倾向袁氏，论地利与政治影响，均对四督联盟十分不利。原来宋案发生后，黎元洪即力主和平，甘为反袁路障。不仅如此，他并利用组庵依违两可、反袁不坚决的弱点，先后派金永炎、程守箴来湘作说客，企图破坏反袁联盟。金、程以同学之谊，首先以我为游说对象，经我严词拒绝，晓以大义，黎的阴谋遂不得逞。组庵在湘，也因反袁派势力占了优势，只好跟着走反袁的道路，而未为黎氏游说所动；但只要局面不好，组庵还很有可能发生动摇的。

当时形势对反袁联盟不利的因素，还有一点应当提一下。那就是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已被袁利用为反对国民党的政治工具。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蔡愕才以同乡同学的关系打电报给我，对我们表示格外关怀，并劝告我们勿走极端。经我复电辩明是非，力言湖南只有与国民党同进退、共始终，不能另作主张，事势如此，只有各行其是。

在袁世凯一方面，自他就任临时大总统以来，即着手准备武力统一全国、消灭国民党的计划，宋案只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及见宋案发生后，国民党四督有不稳之势，于是不顾一切，投靠帝国主义，竟向五国银行团贷款两千多万镑，作为消灭异己的费用。袁以段芝贵为第一军军长，率第二、第六两师及毅军屯驻豫、鄂边境；以冯国璋为第二军军长，率第三师及张勋、雷震春、倪嗣冲各部，分由津浦路与河南两路向宁、皖推进。军事布置既妥，才转而从政治上向国民党采取攻势，其步骤有四。第一步，非法杀害《民主报》主笔仇亮，并于五月六日下所谓“除暴安良令”。第二步，暗使北洋将领联名通电，痛责国民党利用多数捣乱议会、反对大借款。第三步，恶毒毁谤黄克强，捏造去年季雨霖的“叛

变”为黄所指使，张勋、张作霖均指控黄运动军队并争为大总统候选人。第四步，授意北洋各将领呈请“枕戈待命，讨伐有罪”。然后，第一军由豫入鄂，黎元洪敞开大门，任北洋军队通行无阻。六月九日，袁下令免李烈钧赣督职，以黎元洪兼赣督。十四日袁调胡汉民为西藏宣慰使，派陈炯明为粤督。三十日袁下令调柏文蔚为陕甘筹边使，派孙多森为皖督。四省都督中，独对湘督谭延闿未加处理，仅下令缉拿湖南“叛乱”首犯程潜及附逆程子楷、陈强、唐蟒等人归案惩办，同时阴使向瑞琮、唐乾一、杨宏图等于七月七日火烧湖南军械局，湘省所储军火付之一炬。

当李烈钧被袁免职的时候，我曾电李力主抗不交代，联合四省尚可一战。乃李因受内外压迫，竟于六月十日遵命免官，交卸赴沪。他至沪后，大受国民党急进派的谴责，而李又不敢明言江西实力有限，无力抗拒北军。他迫不得已，乃于七月十二日返回湖口，起兵讨袁。袁亦于同日任李纯为九江镇守使，率第六师入赣，战事由是爆发。时林虎一团已扩编成旅，惟战斗力已大减。所以当李纯部队从东北向南昌进攻、敌海军进入鄱阳湖以后，李烈钧、林虎就被迫率部退至赣西。

当时南京各师见湖口起兵讨袁，亦跃跃欲动，尤以八师下级军官与士兵义愤填膺，鼓噪特甚。王孝镇、黄凯元两旅长见时机紧迫，乃于十四日赴沪，向克强请示。克强即于十五日偕同两旅长驰赴南京，被推为讨袁军总司令，宣布起义。而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反于此时逃往上海。战事开始时，第一师与第八师一部，在徐州附近与张勋部队交锋，迭见胜利。嗣以苏皖战线过长，乃于七月二十二日放弃徐州。克强命前线各军在临淮关构筑工事，命第八师刘建藩团增援前线，以柏文蔚为临淮关防守司令。柏文蔚因安庆内部不稳，不能赴临淮关执行任务，于是主帅

无人，再加以江西战事失利的消息影响士气，于是军心涣散，各师相率自由撤退。二十九日，克强得悉江北岸军队溃乱情况，在前线既无可战之兵，在后方又因苏督程德全等不与合作，致无可靠之饷，迫不得已，只好乘日本军舰而去。

柏文蔚在安庆，因内部受到袁世凯的策动，胡万泰、洪承点等从中捣乱，安庆一夕数惊。柏无力应付，终于八月六日一逃了局。倪嗣冲不折一兵，安然进入安庆。从此长江北岸国民党势力丧失殆尽，仅剩南京孤城一座，坐待北军攻陷。

湖南方面，我接任军事厅厅长刚刚五天，宋案就发生了。我默察当时局势，认为终必出于一战，所以我的唯一任务，便是抓紧时间，训练军队。计在四、五、六三个月间，成立了三个步兵团与一个炮兵营。进一步拟从巡防营改编三个团，合赵恒惕所部桂军一旅，共为两个师。假使战事能延缓三个月爆发，我在军事上就有相当把握。但时不我与，战事终于在我尚无准备之时就发生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袁世凯其时也无兵力进攻湖南，但他收买湖南败类向瑞琮、唐乾一等火焚荷花池湖南军械局，却使湖南军队断绝了军火来源。湖南当时有以上两方面的困难，但国民党人反袁的斗争并未因此稍衰。例如谭人凤、蒋翊武等由沪由汉连袂来湘，领导反袁运动。又如刘崧衡、邹代藩、周名南等，组织公民联合会，公开揭露袁世凯的罪恶，集会反袁，对湖南讨袁运动发生了很大的作用。只因突遭军械局的大变，必须等到粤、赣两省接济的军火运到，湖南才能发动，所以迟至七月二十五日才宣布讨袁。讨袁军成立，以程子楷为第一军司令，赵恒惕为副司令。湖南作战，主要是集中力量援赣；至于湖北方面，袁氏既利用黎元洪为盾牌，我亦可利用黎元洪为缓冲，以此只派一部分部队防守边境。这时，江西方面因湖口已被攻陷，赣军苦战兼旬，

已到精疲力竭的地步。至敌海军驶入鄱阳湖以后，南昌告急。我因派唐麟率军从萍乡进入新喻，掩护赣军主力集中。无如赣军节节败退，渐成瓦解之势。最后李烈钧、林虎仅率残部千余人，于八月八日退保赣西，幸得我军支援，并收容其逃散士兵，李、林二人才得从容入湘，并由我军保护他们离湘赴日。赣军战败，已使谭延闿心神不定，至八月八日得到陈炯明弃职潜逃的消息，他更感不安。他此时又眼红面黑，大起恐慌了。于是跟我密商，他说：

“湖南在上月二十五日宣布独立，从当时环境看，可以说水到渠成，除独立外别无第二条路可走。现在我们处于四面楚歌之中，孤立无援，取消独立，也可以说是瓜熟蒂落。我想取消独立，依靠黎元洪担保，可免生灵涂炭，还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你以为如何？”

我深知组庵的意思，因说：

“我很谅解你的苦衷。黎元洪的代表金永炎来长沙时，我对金说过，湖南宁为玉碎，不愿瓦全。今日事势如此，玉碎不能，瓦全亦难。但黎元洪倒在袁氏怀中，他无实力，其本身已是皮之不存，湖南以他为护符，真所谓‘毛将焉附’。你的办法，只不过暂时避免危险而已，将来演变，仍然未可乐观。我决意马上辞职，把一切责任都推在我个人身上，这样做，你对袁氏也有话说。”

组庵甚为高兴，但仍装出一副共患难的样子，说道：

“不能把一切责任都推在你身上，所有罪恶皆归于我。”

谈至此，再没有什么文章可做了。于是组庵于八月十二日通电取消独立，待罪查办。我呢，一面设法保护同志离湘，一面办理移交。当时如谭人凤、蒋翊武、程子楷、陈强、周震鳞、唐麟等，都是由我设法，使他们潜往上海转赴日本的，其中只有蒋

翊武一人，不愿经过汉口，改走桂林转香港，竟为陆荣廷所害，迄今回忆往事，仍感痛恨。组庵宣布取消独立后数日，公民联合会刘崧衡等，因痛恨谭氏二三其德，遂组织一部分党员进攻都督府，遭到失败，刘亦为谭所杀害。我掩护同志离湘的任务完成以后，办好移交，也就于八月底离长赴沪，一路改作商人打扮，得以混过密探耳目，安全抵沪。在沪流离月余，十月底便到东京作亡命客了。后两月，谭延闿由黎元洪、熊希龄担保入京待罪，黎亦被迫离鄂入京，过其“瀛台生活”。

广东方面，胡汉民与陈炯明不能合作，前面已经提到。再加上内部情形复杂，派系门户之见很深，更难以团结一致，全力讨袁。如新军有陆军、海军，旧军有防营、绿营，各自为政，不相统摄，东江潮汕，南路琼崖，可称军队如林，土匪亦如林。上年姚雨平率一军开赴南京，实际上只有一混成旅，调回广东后也未加整理训练，使之成为可以统摄各种杂牌军队的中心力量。所以坐令地方杂牌军队为袁世凯所收买，到七月十八日陈炯明为势所迫宣布独立之时，汕头莫肇宇、南路陈德春、惠州鍾鼎基等部，从暗中反对，根本也就动摇了。到八月六日，陈炯明见大势已去，只好一逃了局。

癸丑讨袁之役，就我所知，已如上述；至于上海战事、福建孙道仁、许崇智和重庆熊克武的宣布独立，因我未亲历其境，不敢深谈。

（原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本刊在个别地方作了删节）

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

李 书 城

(一)武昌起义以前

一九〇二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从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选派学生三十多人，赴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学速成师范，定期八个月毕业，学成回国后充任学堂的师资。黄克强先生和我分别从两湖书院和经心书院被派出国。在武昌出发时，我才认识黄先生。从三书院派出的同学，还有李熙、卢弼、金华祝、李步青、周维桢、张继煦、冯开藩、余德元、万声扬、王式玉等。到东京后，同班上课的还有浙江学生周树人(鲁迅)、汤槿(尔和)、许寿裳、寿昌田等十余人。弘文学院院长由日本高等师范学院院长嘉纳兼任，教师都是日人，梁启超的弟子范源濂任翻译。那时，梁启超正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主张君主立宪，留学生中附和者不少，弘文学院学生亦多对梁启超表示崇敬。不久，我们与湖北早先派出的学生戢翼翬、刘成禺、程家桢等接触以后，知道他们曾在孙中山先生居住日本时，同孙先生见过面，听过孙先生讲述排满革命的道理。他们并介绍我们阅读一些书籍，如《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及黄梨洲、顾亭林、王夫之等明末清初诸大儒的著作，遂激发起我们的民族感情。我们回溯中国从鸦片战争到庚子事变以来，遭受外国人的侵侮日甚一日，将有亡国灭种的惨祸，这都是由于清廷的腐败无能、抑压汉族民气所致的。我们觉得清廷是

中国复兴的障碍，爱国志士要救亡图存，必须首先推倒清廷，因而都认为孙先生主张排满革命是对的。弘文学院同学每晚都在自习室讨论立宪和革命的问题，最初颇多争论，以后主张排满革命的占了多数。

黄克强先生在同学中一向是笃实厚重、不多发言的，但他把问题看清楚了，决定自己应走的道路以后，意志即异常坚决。他曾说，他的远祖在清初曾写过遗书，要黄氏子孙永不出仕清朝。有一晚，他与一些同学争论得很激烈，气急得说不出话来，竟将手中的小茶壶掷地摔碎，表示他已下定决心从事排满革命，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动摇的。他与湖南学生陈天华、杨笃生等共同创办了《游学译编》。这个刊物同留日的浙江学生出版的《浙江潮》、江苏学生出版的《江苏》、湖北学生出版的《湖北学生界》，都是宣扬革命理论的刊物。同时，邹容所著《革命军》、陈天华所著《猛回头》、《警世钟》、杨笃生所著《新湖南》以及各省留学生所著宣传革命的其他各种小册子，风起云涌，大量输入国内，唤醒了国人，也震动了清廷官吏，因而曾引起查禁报刊、停止留学生官费的一场风波。黄先生与万声扬、李步青、金华祝和我毕业回鄂时，大为梁鼎芬所不满（梁在当时是张之洞所最宠信的红人，执掌湖北教育大权）。他对我们四人大加申斥，不派职务。于是李步青、金华祝分别赴天津、长沙从事教学，暗中宣传革命。万声扬赴上海开办昌明公司，表面上是经营普通书店业务，暗中发售革命书籍，并为国内外革命同志的联络机关。黄先生回湖南，同教育家胡子靖办明德学堂，培养革命青年，同时创办华兴会，准备起义。我在武昌闲住数月后，得东京同学资助，再赴日本，作自费生留学。当11俄战事爆发，东京留学生组织义勇军时，我曾参加，受过军事训练。我深感革命须靠武力，希望进日本陆军学校，但陆军学

校不收自费生，须由清廷驻日公使保送，而驻日公使保送须由清政府或各省督抚造送名册。恰巧浙江抚台保送名册中，有一永嘉县“丁人俊”的名额是预填的一个假名，准备留给革命同志顶替入校的。我就顶替了“丁人俊”名入振武学校，寻升入陆军士官学校为中国第五期士官生。

一九〇五年黄先生在湖南起义失败，潜赴上海，再到东京。适孙中山先生也来东京，他们会面之后，认为各方革命团体须统一组织起来，才能步调一致，力量雄厚，遂结合留日学生中的进步分子，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举孙中山先生为总理。孙先生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党纲。当时入党的人对于排满革命的理论是深信不疑的，并且正是因为具有这种革命决心，才宣誓入党的。先一年章太炎、蔡元培、陶成章等在上海成立光复会时，他们的党纲上只有“恢复汉族、还我河山”两句话。同盟会会员时孙先生所提“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意义还不大明白，以为是将来革命成功以后的事，现在不必推求。孙先生对宣誓入党的同志讲解“建立民国”时，是举法国和美国为例；讲解“平均地权”时，是举德国在青岛所订地价税和按价收买土地办法为例（“耕者有其田”系在辛亥革命以后提出的）。因此，同盟会会员在国内宣传革命、运动革命时，只强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两句话，而对“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意义多不提及。湖北共进会的誓词与同盟会的誓词相同，但把“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意谓满人压迫汉人，人权不平等，所以要革命。辛亥武昌起义以及全国各地响应起义所用的共同口号，只是“排满革命”。在南北议和时，南方提出的条件，只是要清帝退位，以为清帝退位即算是革命成功了。以后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也以为只要袁世凯宣誓赞成共和，就算是开始“建立民国”

了。当时许多革命党人都抱着这种看法。

孙中山先生不常在日本，自日政府禁止孙先生入境以后，同盟会总理职务即由黄先生代理。黄先生是留日学生，又长住日本，因此，国内外同盟会会员多与他直接商讨问题或通信联络，他和同志间的感情也就深厚起来。特别是黄先生与军人的关系，由于有一段特殊原因而更加密切。黄先生在日本代理同盟会总理时，中国陆军留学生的人数特别多。第四期陆军士官生有七十五人，第五期陆军士官生有五十七人，第六期陆军士官生有一百九十八人。其中加入同盟会的陆军士官生不下百余人，我所能记忆的：第四期有张世膺、周承蒺、张承礼、蒋作宾、吴钟镗、金永炎、覃师范、王家驹、高佐国、吴经明、何澄、刘一清、刘毅、翁之谷、成桃、史久光、周斌、刘维焘、曾继梧、刘绳武、邓质仪等；第五期有王孝缜、黄恺元、何成濬、陈乾、李浚、陈之骥、姜登选、李书城、袁华选、全恕、石陶钧、王凯成、吴和宣、殷承瓛、杨源濬、朱先志、齐琳、高霁等；第六期有居扶一、李兆祥、王兆祥、刘祖武、孙棨、吴藻华、陈强、欧阳武、张华辅、赵复祥、李根源、林爽、尹昌衡、胡万泰、刘存厚、卢启泰、刘宗纪、胡学伸、官其彬、黄国梁、刘汝赞、罗佩金、阎锡山、孔庚、李鸿祥、叶荃、杨曾蔚、李敏、高声震、仇亮、朱树藩、姚以价、程子楷、张开儒、纪堪颐、李乾瑛、耿飏文、张凤翥、黄毓成、顾品珍、朱绶光、温寿泉、唐蟒、唐继尧、童锡梁、孙方瑜、赵恒惕、田遇东、李烈钧、程潜、刘洪基、华世中等；此外还有陆军测量学校的黄郛、曾昭文等。其余的人记忆不起了。

黄先生以为陆军学生须在回国后掌握兵权，不可暴露革命的真面目。因此，他嘱陆军学生中的同盟会会员不到同盟会总部往来，陆军学生的入党证件也由黄先生一人独自保管。并商议由陆

军同学在同盟会会员中选择一批坚贞可靠的同志另组织一个团体名曰“丈夫团”，以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作为团员应具的品德。据我了解，当时加入这个组织的有李根源、李烈钧、程潜、李书城、赵恒惕、黄郛、尹昌衡、黄恺元、叶荃、温寿泉、曾继梧、华世中、刘洪基、程子楷、孙方瑜、曾昭文、耿飏文、李乾瑱、仇亮、杨曾蔚、陈强、孙棨、高霁、杨源濬、殷承瓛、袁华选、陈之骥、姜登选、李浚、王孝缜、何澄、王家驹等。黄先生还鼓励家有资财的同志出资捐官，俾将来获得兵权可更大更快些。团员中黄恺元用银一万两捐得道台，陈之骥用银六千两捐得郎中。辛亥武昌起义后，在南北各省举兵响应、充任都督及军、师、旅、团长的人，多属丈夫团的同志，都是黄先生所熟知的人。因此革命军人与黄先生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他在革命军人中具有极高的威信。

黄先生在日本同孙中山先生组织了同盟会，又将同盟会中的陆军学生组织成更严密的丈夫团以后，乃秘密回内地，亲率革命同志，在广西的钦、廉、镇南关（今睦南关）和云南的河口等处发动武装起义，均遭失败。最后，他在广州集合各省最坚贞勇敢的同盟会会员八百多人，组织敢死队，于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旧历三月二十九日）攻打督署，结果又失败了，这就是有名的黄花岗之役。这次起义虽未成功，但壮烈牺牲的精神震动了全国。

（二）在武汉前线

黄克强先生在黄花岗之役失败后，曾经考虑过全国的形势，在起义地点方面，他主张“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见冯自

由《革命逸史》初集载辛亥八月十四日黄致冯函)

是年，宋教仁、谭人凤（石屏）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加强长江各省的革命运动。谭人凤与湖北新军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早有联系。黄先生曾寄给谭人凤一首诗，极力主张在长江上下游特别是在武汉起义。诗云：

怀锥不遇粤途穷，露布飞传蜀道通。

吴楚英豪戈指日，江湖侠气剑如虹。

能争汉上为先着，此复神州第一功。

愧我年来频败北，马首趋拜敢称雄。

一九一一年旧历七月，湖北新军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召开会议，策划武装起义，并派居正、杨玉如赴上海迎黄先生来鄂主持。黄先生从香港复电说，须俟九月初（旧历）约十一省同时起义。不意孙武在汉口因炸弹失慎爆炸，武昌革命秘密机关被抄，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烈士被捕就义。各营士兵为破釜沉舟之计，决定提前起义，于十月十日（旧历八月十九日）晚九时在总指挥蒋翊武被捕逃走之后，按照蒋翊武预草的命令分别发动进攻。当时预定的领导人黄先生未来，临时总指挥蒋翊武又不能亲临指挥，全靠各营士兵各自为战。一夜之间，起义军即把总督瑞澂、统制张彪赶走，占领武昌，树起十八星旗，创造了革命史上的奇迹。

革命之所以在武昌爆发，又能支持战争达数月之久，是因为当时武昌具有特殊的优越条件。湖广总督张之洞在鄂二十多年，提倡新政，改良教育，设汉阳兵工、钢药两厂及武昌纱、麻四局、并设银元、铜元局。他又成立新军一镇、一混成协，所招士兵必须识字，后且命题考试，衡文以定去取。兵士入伍以后，还有机会考入陆军特别学堂、将弁学堂，提升为官佐，或派赴日本学陆

军。如蓝天蔚、饒秉鈞、石星川、成炳荣、蔡绍忠、杜锡钧等都是从士兵中提拔出来、派送出洋的。再则当时还有一批思想进步的爱国青年志士如张难先、李六如、蒋翊武、刘静庵、江炳灵等，为了便于联结兵士，运动革命，都投身行伍，在新军中散布革命种子，他们成为组织革命团体的中坚人物。从一九〇二、一九〇三两年以后，湖北废除科举、兴办了不少学堂。如陆军测绘学堂，陆军中学堂，陆军小学堂，普通中学堂，工业、农业、商业、矿业、铁路、方言、理化、省师范、道师范等学堂，武昌五路小学堂，以及教会所办的博文、文学两中学和文华大学等，总计武汉三镇的学生约有一、二万人；从这些学生中派往东西洋留学的先后也不下数百人，自费到日本留学的人数更多。他们出洋后，见到外国的强盛和中国的积弱不振，两相对照，更感到目休心惊。其中接受孙中山先生政治主张的人，知道中国要发愤图强，必先推倒清室，因而纷纷加入了同盟会。在日本留学的湖北学生除将《猛回头》、《警世钟》、《革命军》等书秘密输入湖北之外，并且在东京出版《湖北学生界》，枝江张继煦、汉川李熙、潜江李书城等复在东京撰印《致湖北同学书》，皆用激烈的言辞鼓动革命。湖北的学界、军界受到这些革命书刊的影响，大为振奋。湖北留日学生并捐购幻灯机片运至武汉放映，观者甚众。留日归国学生如吴禄贞、刘伯刚、金华祝、余德元等常于放映幻灯时，讲演国内外形势，宣传世界各民族反抗压迫进行革命的情形，对于激发爱国思想，亦收效不小。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武昌革命的潜力甚大，经过数年的酝酿，在文学社、共进会联合组织统一革命机构以后，革命势力在军队中更加强大起来，遇到机会成熟，便即爆发。起义以后，武昌、汉阳两处存储的枪枝、弹药，足供几万兵士之用。武昌藩库存银及银元局、铜元局、官钱局所存硬币及台票，合计

约有四千多万元。兵械充足，物力丰盈，由此可见一斑。而团结一致、有纪律有训练的士兵，亦不下五千人。武昌起义就是在这样人力、物力各种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发动起来并取得初步胜利的。

武昌起义半个月后，黄先生于十月二十五日在上海红十字队队长张竹君女士的掩护下，扮作医疗队队员，偕同夫人徐宗汉及日人萱野长知等从上海乘江轮上驶，于二十八日到达汉口。黎元洪都督派兵一队从武昌江岸迎至都督府。黄先生听说汉口战事紧急，立即赴汉口担任总司令，设司令部于歆生路满春茶园。各军士见黄先生亲来指挥作战，士气大振。

先是，汉口民军总指挥何锡藩受伤，以张景良继任。旋张景良因通敌正法，又以姜明经继任。姜明经又因战事失利，避匿不出（张、姜两人均系起义前的中级军官，未参加革命团体），战线上无人指挥，士兵各自为战，仅能守住现有阵地。作战十余日来，军民死伤已有数千人，大智门、刘家花园、外沿铁路、华洋街、水坛、硚口等处均先后失守。黄先生重新部署以后，连日反攻，夺回了几处阵地，但每到夜间辄不能固守。士兵依靠市街房屋作掩蔽，射击来攻敌兵，敌亦不敢进逼。因此，敌人乃纵火焚烧市街房屋，使我军无藏身之所。到十一月二日全市大火，我军难以立足，遂全部向武昌撤退。黄先生回到武昌，在都督府开军事会议。他在报告中分析汉口战事失利原因有五：一、各队新兵太多，未受过训练，难以指挥。二、军官多从弁目提升，指挥能力太差。三、各队战斗日久，伤亡过多，官兵均甚疲劳，一闻敌方机关枪声，即纷纷后退。四、兵士是在武汉附近招募来的，夜间多私自回家，战斗员减少了多少，军官亦无法查实。五、我军只有步枪而无机关枪，且只有山炮，亦不能抵御敌方的管退炮，因此较敌人的损失为重。但黄先生又指出，我军有一优点为敌人所不及，

即我军冲锋时异常勇猛，敌人虽系北洋久经训练的军队，每遇我军喊杀时即后退；我军所恃者全靠这一点猛劲。

这时接到汉口报告说，在汉口作战的第三协协统林翼支已于十一月一日晚间离汉潜逃（初逃襄阳，又匿随州，后被枪决）。以后又接汉阳报告，负责防守汉阳的第一协协统宋锡全擅率所部向湖南撤走（宋退至湖南，由黎元洪电请湘督谭延闿逮捕正法）。会议当即一致决定：先在汉阳防守，俟湖南报军开到后再反攻汉口。

我是从北京经上海乘江轮于十一月二日到汉口的。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我即随同陆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到保定，计划举兵响应。忽接军谕府大臣载涛的电令，命我即日回京。我原是军谕府的科员兼官报局副局长，即遵令回京。载涛命我同科员黄郛赴南方与革命党人商议罢兵言和办法。我与黄郛即日携眷出京，从天津乘海轮赴沪。到沪后，黄郛留沪帮助陈其美攻取上海，我则乘江轮赴汉。十一月二日船抵汉口时，我见全市火光熊熊，烟雾弥天，枪声已息。即换渡轮到武昌江岸，岸上有一队学生军来迎。到都督府后，会见黎元洪、黄先生及首义各同志，并参加当日举行的军事会议。会议决定黄先生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我为参谋长。

十一月三日晨，黎元洪命各部队派代表到阅马厂广场举行登坛拜将的隆重仪式，借以鼓励士气。授印时，黎元洪、黄先生都有演说，士气大振。是日，即将总司令部人员组织完成。以吴兆麟为副参谋长（吴原系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左队队官，未参加革命团体，八月十九日夜间起义士兵攻占楚望台军械库时，推他为临时总指挥，由他下令攻打督署。他曾向张之洞所聘请的日本铸方大佐学过参谋学，以富有军事学识著称），姚金镛、金兆龙、高尚志、甘熙绩、耿丹、辜仁发、吴兆鲤、余鸿勋等为参谋，田桐为

秘书长，王安澜为兵站司令。以后王孝缜从北方来鄂，任为副官长。原在武昌起义的湖北及外省学生共同组织的学生军，由刘绳武为标统，田化龙、赵士龙、余子祥为管带，共约三百余人，调归总司令部直接指挥。是晚，黄先生率总司令部人员同赴汉阳，在伯牙台设总司令部，嗣因敌方枪弹能射至院中，次晨移往昭忠祠。

四日晨，黄先生率总司令部人员登龟山顶观测汉口敌方阵地，敌方大炮向龟山射击，炮弹都落入龟山后方的江中，无人受伤。寻沿河边防线视察一周，决定利用汉阳兵工厂、铜药厂的铁板、木材沿汉水南岸构筑防御工事。因部队都系新兵，须受训练，不令担任此项任务，另由各部队招募民工，按日付给工资，由官长督修。当汉口大火以后，火燄多日未熄，敌人亦不能踏过火场来攻汉阳。因此，两岸枪声沉寂，我方沿河岸每日虽有数百人修筑工事，敌军亦未来扰，工事得以顺利修成。工事修成后，我方即向敌方进行宣传，夸说防御工事如何坚固，形容得好似铜墙铁壁一样，借以使敌人有所畏惧，以延缓其进攻企图，并掩饰我方援军未到、汉阳守军空虚的弱点。

黄先生初到汉阳时，只有蒋肇鉴协统的步兵第一协守在兵工厂附近。第一协协统原是宋锡全，他把部队带赴湖南后，黎都督派蒋肇鉴继任第一协协统，其时只剩一营兵士，蒋接任协统后才陆续补充。其他调到汉阳的部队，有张廷辅所率的步兵第四协、熊秉坤所率的步兵第五协、胡效骞所率的步兵第四标。十一月六日，湘军第一协协统王隆中（与我在日本士官学校同学，未加入同盟会）率所部开到汉阳。九日，湘军第二协协统甘兴典率所部徒手兵开至武昌，领取枪支后也开到汉阳。湘军两协士兵开到汉阳后，在汉阳防守的士兵都大为兴奋，以为转败为胜的时机到

了。

从各方来汉阳参加作战的，有留日陆军同学曾继梧、程潜、程子楷、唐蟒、曾昭文、王孝缜等，他们曾在汉阳前线或后方分别担任各项临时的或固定的工作。有从南京陆军中、小学来鄂的学生蒋光鼐、李章达、陈铭枢、陈果夫等数十人，由队长张我权、副队长徐源泉带到汉阳，作为总司令部的督队员。有一日本军人大原大尉亲来汉阳向总司令部投效。他每日在汉口探访敌情来汉阳向我军报告，但十一月十七日以后即未见其再来。后来听说，他于是日我军进攻汉口时牺牲了。

上海光复以后，当地名流如张謇、汤寿潜、赵凤昌等推庄蕴宽来鄂，为组织统一革命机构事向黄先生和黎元洪征询意见。我以前在广西作陆军干部学堂监督兼陆军小学堂监督时，庄蕴宽是广西督练公所督办，我在广西的一切革命活动他都知道，也是暗中维护我的。他是一个同情革命的开明官吏，因邀约了一群革命同志到广西作革命活动，被广西巡抚张鸣岐胁迫而离开广西的。他告诉我来鄂的真意，是请黄先生到上海去。他说，上海方面的人认为黎元洪是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所拥戴出来的，不是真正的革命党领袖，而孙中山先生还在海外未回，现在只有黄先生是国内唯一的革命领袖，应该负起领导全国革命的责任，到上海去统率江、浙军队攻克南京，在南京组织全国军政统一机构，继续北伐，完成革命事业。他敦促黄先生早赴上海。但是黄先生对他说：“全国军政统一机构是愈早组织愈好，但不必要我担任领导人。我现在还担任武汉方面的作战任务，不能离开武汉，看以后情形如何再说。”

袁世凯曾派鄂人刘承恩来见黎元洪与黄先生，表示愿意停战言和。黎元洪和黄先生曾分别函复袁世凯。黄先生函中略云：“明

公之才，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局亦无不有拱手听命者。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析毋坐失。”黎元洪复函中的措词亦大致相同。是时，汪精卫亦派人来汉密告南方同志，说袁世凯不是效忠清室的人，如南方革命党肯举他为第一任共和国总统，他是愿意同我们一致行动的。汪嘱南方同志从速表示态度，以促袁早下决心。武汉革命同志都赞同汪精卫的意见，并嘱汪在北方对袁世凯多做工作，促成其事。

吴禄贞于十一月六日夜在石家庄被暗杀的消息传到武汉后，革命同志对清廷更加愤恨，发誓出师北伐，以雪此恨。甘兴典率所部湘军开到汉阳后，几乎每日到总司令部来催促下令反攻汉口，并说他的部队都愿意上前线杀敌，不愿缩在壕沟内消磨锐气。当时又探得汉口敌军日益增多，与其待敌军兵力充实后向我来攻，不如我乘其兵力尚未充实时先发动进攻。总司令部提出这个意见后，得到都督府的同意，遂作进攻汉口的准备。从武昌运来的枪弹每个士兵都领到四百发左右，可供几天战斗之用。架桥材料也运到渡河地点。一切进攻准备就绪后，黄先生于十一月十六日下令分三路向汉口进攻。第一路由步兵第三协协统成炳荣率所部从武昌青山渡江，在汉口湛家矶登陆，进攻刘家庙。第二路由步兵第六标标统杨选青率所部乘装甲小火轮及民船由汉阳东北岸出发，向汉口龙王庙强行登陆，占据阵地后相机进攻。第三路由驻在汉阳的各部队组成，归黄先生直接指挥，是此次进攻汉口的主力军。这一路以湘军第一协协统王隆中所部为右翼，湘军第二协协统甘兴典所部为左翼，鄂军步兵第五协协统熊秉坤所部为总预备队。其余炮兵第一标及工程第一营均随同前进。黄先生命令第

三路各部队在十六日黄昏后开始行动，从琴断口渡过浮桥，向指定地点集合，进入阵地，准备次晨拂晓向汉口玉带门及礄口一带之敌进攻。黄先生率总司令部人员于是晚十时许渡过琴断口浮桥。时正遇大雨，天黑不辨路径。先渡桥的部队把桥头一间草屋点火燃烧，作为照明之用。黄先生知道后，立即找到房主，给予房屋赔偿费。再往前进时，不见甘兴典部队的踪迹，甚为惊讶。不久，发现该部都藏在民房内避雨或蹲或卧，拥作一团，每个士兵的背上都负着一捆稻草当作雨衣，状似一群难民。我看见这种情形，实出意料之外。我对黄先生说：“我们的作战命令只是纸上谈兵，没有考虑到兵士的素质。这些士兵遇雨即如此狼狈，对战线上打来的弹雨怎能抵挡得住呢？现在还未接到第一路、第二路出发的报告，是不是同这里情形一样，深为可虑。预料敌人现在还未发觉我军的动作，可否改变计划，先把部队整理一番后再行进攻？”时陆军同学唐麟在侧说：“革命军人有进无退，退则沮丧士气。”黄先生叫我们先把藏在民房的兵士喊出来，再看情况。于是总司令部的参谋、副官及督战员都到各民房把兵士一一叫了出来，要他们赶快到指定的阵地上去。将近天晓时，这些士兵都被喊出来走上阵地了。学生军最勇敢，首先向前开了火。随着，左右两翼部队都向前推进，形势似很有利。不料中午以后，敌人运到了机关枪和大炮，向我军猛烈发射。甘兴典的士兵有几个受了伤，向后退却。甘兴典也骑着马向后奔跑，以至引起他的部队全部溃退。黄先生率总司令部人员及督战队持刀拦阻兵士后退，并砍伤了几个后退的士兵。但溃兵汹涌而至，竟要向拦阻后退的人开枪射击。不得已，只好让他们后退。他们在后退途中，有些士兵被敌军打到我阵地后方的炮弹炸伤了，于是又惊慌起来，拼命抢渡浮桥。因人多桥断，溺水死者达数百人。幸王隆中所部湘军是从新军扩

编成协的，受过训练的兵士较多，他们在阵地坚守至日暮，才撤回汉阳。熊秉坤所部鄂军虽被敌包围，尚能且战且退，全部渡河，回到防地。我军退却时，敌人并未追击。他们探知我军已全部撤退后，才开至河岸，与我军隔河相持。我与黄先生在将到日暮时，踏着泥泞道路后退。黄先生身体肥硕，行路很吃力，由人扶持步行。我由广西陆军干部学堂湖南学生首斌沿路搀扶，一步一滑，直到天黑我们才回到汉阳。是晚，下令汉阳各部队彻夜警戒，作战斗准备。

次晨，知甘兴典并未退回原防，竟率所部向湖南逃走。同时得知第一路军亦未按照原定命令从青山渡江向刘家庙进攻，原因是协统成炳荣是日酒醉，下错命令，竟命军队向与青山相反的方向开动，及至发现错误，再叫士兵向青山开进时，兵士因行军半夜已极疲劳，又值天雨路滑，都不肯遵令行动，故第一路军未能按照命令执行进攻任务。第二路军因标统杨选青适于是晚在家结婚，未亲往指挥，故亦未遵令从汉阳东北岸向汉口龙王庙进攻。黄先生将以上情形报告黎元洪后，黎即将成炳荣撤职，改以襄秉钧继任步兵第三协协统；将杨选青正法，并电请湖南都督谭延闿于甘兴典到达长沙时立予正法，将其部队缴械遣散。

这次进攻汉口失败，不仅暴露了我军的弱点，也使敌人轻视我军，加强了敌军进攻汉阳的企图。这是因为我在战略战术上都犯了极大的错误所致。从战略上说，我军若不进攻汉口，敌人是不敢轻于进攻汉阳的。因为汉阳的防御工事相当坚固，并且作了一些夸大的宣传，使敌军望而生畏。且敌我两军隔河对峙，船只都靠在我方河岸，敌若渡河攻坚，地势于我有利，于敌不利，我若坚守汉阳。可争取时间。得到更多省分的响应和所派援军的支援。如果这样，汉阳是尽可不失的。从战术上说，我不懂得兵士是作

战的基础，未查明军官和兵士的训练程度，只照书本上的作战公式下命令，结果三路进攻的负责军官一个被撤职，两个被处死。士兵不仅在战场上死伤了很多，而且在退却途中并无敌军追击，落水而死的亦竟达数百人之多。敌军是素有训练的北洋军，我以初成之师与之作阵地战，真是既不知彼也不知己，犯了军事上的大忌。进攻汉口的失败，又引起了汉阳的失守。我对这两次战役的失败，是应该负重大责任的。因我的作战计划错误，使黄先生受“常败将军”之讥，使革命形势受到挫折，我至今犹引为遗憾。

十一月十七日进攻汉口既未获得胜利，兵员、武器、弹药却损失不少。甘兴典既率部逃回湖南，他原来守的防线不免薄弱，从而不得不加重了王隆中部队的负担。这支部队能战能守，但经多日的拉锯战，兵员损失也不少。特别是连日继续作战，不能休息，兵士疲劳过度也是事实。王隆中竟于十一月二十三日率领他的部队擅离汉阳，退到武昌两湖书院，说要在武昌休息几日再赴汉阳作战。我奉黄先生命，到武昌劝他开回汉阳。但他对我说，兵士实在太疲劳，不休息几日不能作战。我商请黎元洪允给该部五十万元犒金，只要该部开回汉阳。他还是执意不肯开回，竟至向我下跪。我未能说服他，只得回去报告黄先生。黄先生也无法可想，只是和我共同叹息而已。

十一月二十五日，湘军协统刘玉堂率所部千余人来汉阳增援。刘系山东人，身干魁梧，性情豪爽，旧式巡防营出身。他初见黄先生时，即问前线情形如何，并表示愿率所部到急紧的前线去作战。黄先生命他到花园前线抵御从仙女山来攻的败军。他率所部到达阵地后，数次向前冲锋，因敌军用机关枪扫射，未能得手。当日下午，刘不幸中弹阵亡，所部兵士纷纷后退。在花园山、扁担山防守的鄂军均在黄昏后全部退却，日间所守阵地都被敌人

占领。总司令发出的当晚作战命令都已无人接受，传令兵只好带回，交还总司令部。我们发现总司令部所在地已成为最前线了，乃将驻在后方的辎重营调到前线来作总司令部卫队，并在学生军中征集敢死队员百余人在总司令部前方布防。

在这种情况下，汉阳已危在旦夕，实难再守。我与黄先生商议，将战况报告黎元洪，请早将兵工厂机器、存储汉阳的弹药、粮秣以及一切军用物资撤回武昌，以免资敌。

十一月二十六日，我到武昌向都督府报告以上军情，当即在都督府开军事会议。大家都赞成作有准备的撤退。惟都督府副参谋长杨奎章慷慨陈辞，主张坚守汉阳，虽至一兵一卒亦不放弃。于是杨奎章自告奋勇，组织参谋部同志十余人赴汉阳助战。我因连日疲劳已甚，向黎元洪请假休息一天，当晚宿在都督府秘书万声扬家中，睡至次日午后才醒。醒后，惊闻杨奎章已于是日午前在汉阳阵亡，汉阳守兵正在向武昌撤退，退兵在渡江时伤亡不少。晚间，黄先生退到武昌，向黎元洪报告失利情形后，即率一部学生军同徐宗汉夫人、张竹君女士及日人萱野长知等乘江轮赴沪。

黄先生离汉时，我未赶上，次日（十一月二十八日）始偕同汤化龙、万声扬、胡瑞霖、陈登山、黄中垲等乘江轮赴沪。我在这四天的航行途中，除饮食外总是沉沉酣睡，因在汉阳二十多天的紧张繁忙的生活使我疲劳已极，这时得到休息，真觉睡眠是人生最舒适的享受了。

我们到上海后，在昌明公司开会。汤化龙和万声扬提议：我们离开武昌时未向都督府请假，应该发一电报到武昌表示歉忱。胡瑞霖是一个争强好辩的人，他道：“电文措辞不要表示道歉，应该指摘武昌首义诸人对我们有种种歧视，所以我们才离鄂来沪。”黄中垲也赞成胡瑞霖的意见，说这是说真话。电文由胡瑞霖起草

发出。以后武昌方面对汤化龙竭力排斥，其原因即在于此。

（三） 南京临时政府和留守府时期

十二月二日，苏、浙、沪联军攻克南京，各省在沪代表议决临时政府设在南京。四日，公举黄先生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黄先生以黎元洪为首义元勋，抑居副职，恐武昌方面有意见，于革命内部的团结不利，乃坚辞大元帅不就。各省代表复于十二月十七日在南京开会，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先生为副元帅，并以副元帅暂行大元帅职务。黄先生本拟早日起程赴南京就职，并已商请张謇向上海日商三井洋行借款三十万元作到南京后军政费的开支。但在预定起程赴南京的先一天晚上，黄先生忽向我说，他明天不去南京了。我问何故不去。黄先生说：“顷接孙中山先生来电，他已起程回国，不久可到上海。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若不等待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他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太平天国起初节节胜利，发展很快，但因几个领袖互争权利，终至失败。我们要引为鉴戒。肯自我牺牲的人才能从事革命。革命同志最要紧的是团结一致，才有力量打击敌人。要团结一致，就必须不计较个人的权利，互相推让。”我听了黄先生这一番话，感到他的人格伟大，感到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纯洁，深为佩服。这一晚的谈话，使我深深印在脑海，永不磨灭。我看他以后处理一切事、对待一切人，都是从这种精神出发的。

十二月二十五日，孙中山先生到达上海。同月二十九日，各省代表在南京选举孙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议决中华民国纪年改用阳历，以旧历十一月十三为阳历一月一日，孙先生即在中华民国元年一月一日在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最初，各省代

表曾欲仿法国制度，设总理一职，并拟举黄先生为总理。后因孙先生主张采用美国制度，不设总理，此议始作罢。孙先生向参议院提出黄先生为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得同意后，黄先生即赴南京组织陆、参两部。黄先生本预定以我为陆军次长。当我正在上海南海会馆陆军招待所同北京陆军部、军谘府南来的同学商量南京陆军部各司局人选的时候，湖北陆军革命小团体中最年长的同志陈裕时要我把陆军次长让给北京陆军部的科长蒋作宾，因为蒋为人一团和气，又曾当过科长，在南来的陆军同学中他的官阶最高，他当了次长，则部内的各司局人选由他安排就比较容易，免得我作次长时引起同学的地位争执，不好处理。我接受了陈裕时的建议，即请黄先生任蒋作宾为陆军部次长（蒋以后从南京陆军部转到北京陆军部，受到段祺瑞、徐树铮的种种轻侮，他都能忍受，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他入总统府作黎的幕僚，又经常与专横的段、徐二人打交道，他确是很有耐性的）。参谋部次长是钮永建，他在江、浙军界中是相当有威信的。陆军部秘书长和秘书由汤化龙和林长民分别担任。汤、林两人在上海当过黄先生的私人秘书，黄先生对外的文电都是他两人草拟的。后来湖北方面因衔恨汤化龙曾在上海电责武昌首义人士，特电致南京反对他任陆军部秘书长。汤乃离宁赴沪。林长民在南京街头上曾受到老同盟会会员的当面讥刺，说他从前反对革命，现在又混进革命队伍来了。他因此也辞职赴沪。他们两人后来成立民主党，与国民党为敌。

某日，安徽军军长柏文蔚来陆军部领开拔费，说奉孙大总统手令，要他的军队即日开赴江北布防。黄先生因陆、参两部都不知道有此命令，遂与我商议，由我到总统府任军事秘书，以便与陆、参两部联系。我到总统府后，又请孙总统加派耿觐文为军事

秘书。以后总统府发出的有关军事文件，都是由我二人草拟的。

那时总统府的秘书长是胡汉民。秘书中有吴玉章、任鸿隽、王夏、张通典、谭熙鸿及宋霭龄等。

当时黄先生所担心的是军费开支浩大，并且需用甚急。某晚，黄先生约我同见孙先生，询问向英、美借款事有无头绪。孙先生当时正在看外国报纸。他放下报纸，回答说：“外国人曾向我说过，只要中国革命党得到政权，组织了政府，他们就可同中国革命党的政府商谈借款。我就职以后，曾向他们要求借款，并已电催过几次，昨日还曾发电催问，请他们实践诺言；但今日是星期六，明日是星期日，外国人在休假日是照例不办公的，明日不会有复电，后天可能有复电来，我再告诉你。”黄先生出来后，默默无言，心中似乎很着急的样子。以后他即未再向孙先生询问借款事，只是求助于上海的资本家张謇等暂时应付急需。以后又过了几个星期，一直到总统府取消时，外国款还是杳无回音。在向外国借款的问题上，孙先生比较乐观，而黄先生则认为外国政府如果攫取不到中国的特权，是不肯借款给我们的。当时在上海和南京方面的同志对于获得外国政府的承认和借款本抱有极大的希望，但结果都成泡影，因而他们对孙先生多不谅解，说孙先生只是“放大炮”。但黄先生向他们作了如下一番解释，大意是说：孙先生在国内的友人大率都是在野的政治家，还未取得政权。他们可能与执政的人有些联系，可以向执政者建议给中国革命党人以帮助。但欧美的当权派要借款给中国，首先考虑的是在借款条件上能否在中国攫取特殊的利益，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帮助中国进步党派，促使中国走上进步道路。例如我们曾向日本要求借款，它就要我们把汉冶萍公司同它合办，我们不应允，它就不借款给我们。孙先生当然不会拿我们国家主权去换取外国借款的。我们对孙先生应

该有此认识，不要抱怨孙先生向外国借款不成功。经过黄先生这番说服，同志们对孙先生的责难也就平息了。

孙先生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时，扫除了中国旧官僚讲排场、摆架子的恶习，也减除了一些官僚式的繁文缛节，无论官阶大小都着同样制服，这种制服以后称为中山服，流行至今。孙先生的生活非常简单朴素，很平民化。他常书写“自由”、“平等”、“博爱”的横幅赠给同志。孙先生以亲身的行动，在南京开创了一种新时代的风气。黄先生对孙先生这种作风极为钦佩，常常向人称赞不已。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南北继续停战，两方和议代表仍在上海开会。袁世凯所希望于南方的，是要南方选他为第一任大总统。南方所希望于袁世凯的，是要他促使清帝退位，改专制为共和。两方代表对此都早有默契。谈判中间曾有过几次波折：一是南方已许举袁为大总统，而又选出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在南京就职，致引起袁之怀疑，认为南方无诚意，会议曾因而一度停顿，经解释后仍继续开议。一是清廷有些顽固派阻挠清帝退位，袁乃故意使和议停顿一下，同时授意段祺瑞等四十二个将领联名拍电威胁清廷，迫其就范。清帝终于在民国元年二月十三日下诏退位。和议告成后，孙先生即向参议院辞去总统职。

在议和期间，同盟会内部在让位给袁世凯的问题上是大有分歧的。孙先生和一部分同志，认为袁世凯是一个巨奸大憨，把建立民国的大任付托给他是靠不住的；我们革命党人应该有勇气、有决心率领南方起义将士继续战斗，趁此全国人心倾向革命的时候，必然胜利可期，此时多费些气力扫除障碍，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家，将是事半功倍的。而黄先生和另一部分同志的看法则不同。他们说，袁世凯是一个奸黠狡诈、敢作敢为的人，如能

满足其欲望，他对清室是无所顾惜的；否则，他也可以象曾国藩替清室出力把太平天国搞垮一样将搞垮革命。只要他肯推翻清室，把尚未光复的半壁河山奉还汉族，我们给他一个民选的总统，任期不过数年，可使战争早停，人民早过太平日子，岂不甚好；如果不然，他会是我们的敌人，如不能战胜他，我们不仅得不到整个中国，连现在光复的土地还会失去也未可知。

这时，在北京出狱不久，在同盟会中素负盛名的汪精卫已到上海。汪早已同袁世凯及其子克定密商决定袁在北方推倒清室，他在南方推戴袁为大总统。他曾派人到武汉告知黎元洪、黄先生和武汉首义同志，他们均表赞同。这时汪既任南方议和代表，仍坚持他的主张，甚至不惜恶意攻击孙中山先生本人有权利思想。他并邀约当时负社会重望的吴稚晖、李石曾等发表宣言提出“五不”主义（不做官，不做议员，不纳妾，不吸烟，不饮酒），他自己也故意力辞广东都督不就，以表示他个人的“清高”和“言行一致”。此外，光复会的领袖章太炎、陶成章等对孙先生因早有误会，也曾对孙先生大肆攻击。攻克南京有功的浙军司令朱瑞系保定军校学生，与段祺瑞有师生关系，这时已向段密通消息，表示拥袁上台。黎元洪当汉阳失守后，因情势危急，曾一度退出武昌城外。袁世凯抓住机会，通过汉口英领事提出双方停战，黎始悄悄回城。因此，黎认为袁世凯对他有意维护，对袁感激不尽。其他各省都督如谭延闿、程德全、庄蕴宽、汤寿潜、陆荣廷、孙道仁等，各省统兵大将如沈秉堃、王芝祥等，本系清廷大官僚和地方大绅士，在他们看来，拥戴气味相投的袁世凯自然比拥戴那些素不相识的革命党人要好一些。当时如和议破裂，要他们听革命党人的命令对袁世凯作战，他们很可能是反戈相向的。以张謇为首的上海名流们曾替袁世凯划策，怂恿他推翻清室，并在上海起

草清帝退位诏书，送交袁世凯用隆裕太后名义颁布。他们当然对袁有好感，也是不肯反袁的。同时，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温宗尧等既已切实允诺举袁为大总统，并且因此才换得一纸清帝退位诏书，他们当然也要实践诺言，不肯失信。还有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革命军的实力。当时南方除少数从正规军扩编的军队尚有作战能力外，大部分新编入伍的士兵多是城乡失业民众，尚未受过军事训练。各部队形式上虽具备军、师、旅、团、营、连、排的编制，实系乌合之众。从汉口、汉阳失败的经验看来，想依仗这种军队去冲锋陷阵，一直打到北京，是靠不住的。在国际方面，那时袁世凯已同英政府暗中勾结，英政府随时可给他援助。其他各国也大都希望中国形成分裂的局面，以便于他们任意要挟宰割；他们自然绝不会愿意中国有一个新兴的，由进步的势力组成的统一政府，来抵抗他们的侵略。因此，凡是考虑过以上各种情势的人，都主张对袁让步，举袁为总统。曾在日本、欧美学过法政的同志如宋教仁、王宠惠等，主张用约法限制总统的权力。当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后，随即修改约法，把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以为这样就可以限制袁世凯的行动了。此外，参议院还通过了建都南京、要总统在南京就职的两个决议。但是这些纸上的决议都被袁世凯种种设辞和阴谋手段（如南方迎袁代表到京后唆使兵变）所撕碎了。袁世凯终于实现了他在北京就职、窃取政权的野心。我们当时主张让袁世凯做第一任总统，当时的背景约如上述。关于这个历史问题的是非得失，从今天看来，应该怎样判断，应该如何吸取经验教训，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南京临时政府撤销以后，设立南京留守府，办理政府机关的结束事项和接收管理驻宁的军队。黄先生被任命为留守府的留守，我为总参议。府内设政务、军务两厅，以马良（相伯）为政务厅

厅长，张孝准为军务厅厅长，陈嘉会为秘书长，何成濬为总务处处长，耿飏文为参谋处处长，曾昭文为军需处处长，陈登山为军法处处长，赵正平为军学处处长，林虎为警卫团团长。黄先生经常在上海同各方面会商国事，他的留守职务由我代行。当时最感困难的问题是南京拥有十余万人的军队，军费没有来源。熊希龄在上海时曾允俟到北京就财政总长职以后，即拨汇军费到南京来，但他就职以后分文不给，虽经多次函电催促，仍置不理。我曾用南京留守府总参议名义，公开指摘他的失信，他还是不理。我不得已，只得把南京军队的伙食从干饭改为稀粥。以后连稀粥也不能维持了，乃将南京城的小火车向上海日商抵借二十万元，暂维现状。某夜，江西军俞应麓所部突然哗变，在南京城内肆行抢劫。经清广西军王芝祥军长派队弹压，到天晓才平定。除由军法处将罪据确凿的犯兵予以惩处外，其余均遣送回籍。经过这次兵变，我才认识到有兵无饷的危险。我当时曾想到，在兵多而无饷的情形下，黄先生与其担任南京留守府的留守，不如作一个江苏省的都督，可以有丰富的财源，来训练几师精兵保卫国家。我正拟将此意写信到上海向黄先生建议，不料上海方面已推定程德全为江苏都督。我感觉到出路已穷，南京留守府多存在一天，即多负一天危险的责任。袁世凯一面迭次挽留黄先生，请黄先生不要辞职，一面又总不拨给军饷。这明明是袁世凯的毒计，要使黄先生堕入陷阱，身败名裂。我遂商请黄先生从速结束留守府。

在结束留守府以前，在南京驻扎的军队除江苏军队划归江苏都督管辖外，其余浙江、广东、湖南的军队分别调回原省，剩余的军队一律在南京遣散。但为保存革命实力计，将所有遣散部队的优秀军官及精良武器组成一师，定名为第八师。这个师从师长以下至营连长，都是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

同盟会会员。师的枪支有两套，一套分发士兵，一套存储仓库备战时扩军之用。饷项归中央陆军部直接发给。师长陈之骥是直隶（今河北）省人、日本陆军士官第五期学生、同盟会内的丈夫团团员，为人忠实耿直、尚义气、重然诺，曾经捐过郎中，又是北洋军阀冯国璋的女婿。他被推为第八师师长，是陈裕时首先提出来的。陈裕时是一个多计谋、喜用策略的人。他那时从广西带来一支军队，编入第八师为一旅，他也被推为第八师的一个旅长。他认为陈之骥是冯国璋的女婿，在北方有靠山，不会受袁世凯的抑压，将来还可大有发展。大家都赞成他的意见，推举陈之骥为师长。同时，推定两个旅长，除陈裕时之外，另一个旅长是从广西桂林带来一支军队的司令赵恒惕。王孝缜、黄恺元、何遂、陶德瑶、刘建藩、张华辅、张厚琬等先后为团长，吴和宣为工兵营营长，袁华选为参谋长。其后，陈裕时辞职，赵恒惕也调到湖南，由王孝缜、黄恺元两人兼任旅长。我们当时只想用全力把第八师组织得坚实健全，作为革命军队的一个中心堡垒。对其余应裁的军队就设法促其迅速裁遣，以便早日结束留守府。我看到有些师、旅长对裁遣军队进行不力，就订出一个限期裁遣、饷项包干的办法，即：先发一个月的全饷交师旅长掌握，过期不再发饷，从早遣散了士兵，所剩余的饷项也不上缴。这样，各师就不待催促，都尽先裁遣士兵，以便留有余款作官长回家的旅费。正当各师大力裁兵的时候，第八师的同志就急忙从他师被裁的士兵中，挑选精锐来补充自己的队伍。此事被各师发觉后，他们纷纷来留守府控告，指明第八师的团长何遂招收了遣散而尚未出城的士兵，要求处理。留守府知道裁遣各师而只保留一个第八师，这件事早为各师所不满，现在各师又把第八师违令招兵的事实来府控告，若处理不善，恐有碍裁兵的顺利进行。我遂忍痛将何遂同志撤职，

以暂平各师的攻击，准备事后再令何复职。第八师不同意，要我收回成命。我坚持不肯，王孝缜同志还气冲冲地到留守府来要打我。我还是照原令执行了。裁兵完竣以后，留守府即取消了。

（四）宋案前后和癸丑讨袁

南京留守府取消以后，袁世凯即派同盟会会员张钫来沪邀请黄先生赴京。是时孙中山先生已在京多日，与袁世凯商谈国事，尚称融洽，黄先生到京后亦参加会谈。袁世凯对孙、黄两先生不仅招待极为隆重，而且态度也表现得很谦恭，表示他一定要邀照孙、黄两先生的政见次第付诸实施。孙、黄两先生对袁世凯也表示信任。孙先生在袁世凯召宴的筵席上说：“让袁总统作总统十年，练兵百万，我经营铁路建设，把铁路线延长至二万里，民国即可富强”云云。袁又发表了八大政纲，谓系他与孙、黄、黎共同协商决定的。袁请孙先生担任全国铁路督办，在上海设立办公室；请黄先生担任粤汉铁路督办。黄先生想早日建成南北交通干线，促进南方的建设事业，亦允担任。但黄先生离京后，派我同当时的交通总长朱启钤商量职权问题时，朱坚持督办应受交通部管辖，一切用人行政事项均须向部请示批准。黄先生认为与原议不符，知袁世凯实无诚意，遂决定辞职。湖南革命同志拟请黄先生回湘为都督，但黄先生因不肯取代谭延闿的职位，亦不同意。

黄先生离京时，曾与袁世凯商议，留我在北京作总统府军事处次长，以便联系。军事处总长是荫昌，我与他都无事可办，负实际责任的是参议唐在礼。所有关于军事机密事宜都是由段芝贵与参谋部次长代理总长的陈宦直接同袁世凯密商办理，连陆军总长段祺瑞也不令参与。袁世凯那时对持南方革命军人表面上极为优渥，凡来府谒见的，他都亲自接见，褒奖备至，离京时赠送珍

费礼物，并随时赏给文虎章或嘉禾章，以资笼络。袁对肯受收买的人更给以高官厚禄，使其甘心作他的爪牙，经常在各省内部捣乱，并把各省内情密报北京。

袁世凯侦知宋教仁联系南方各省，在国会议员中能获得多数选票，可能被选为内阁总理，乃与赵秉钧密谋，唆使奸人于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在上海车站向宋行刺。宋遇刺后于二十二日四时身死。宋案发生后，很快便发现这是袁世凯的阴谋。袁世凯本来照例每星期中总有一天约我同段芝贵、陈宦与他共餐，会谈南北两方情况的，但自宋案发生后有两星期没有约我聚餐。我心中怀疑他对我有所疑忌。恰巧一个素有神经病的同乡名叫刘端吾的来找我，向我说：“你不要怕，我今天已写信给袁大总统，说你是个好人，不要怀疑你有什么举动。”我听了他这番话，怕他这封信反而提醒了袁世凯对我有所行动。我为了免被袁世凯暗中监视或者暗害，即于是晚借送客上车为名，跳上京沪通车一直回到上海。未出京的军人同志仇亮和林述庆，以后都被袁杀害。我却因这个神经病者的一番话，得以幸免。

我到上海后，同孙、黄两先生及在沪同志会商处理宋案的办法。大家都异常悲愤，主张从速宣布袁世凯谋杀宋教仁的罪状，举兵讨伐。当即商定由孙先生密电广东陈炯明，黄先生密电湖南谭延闿作出兵的准备，并派我同李根源、张孝准赴南京发动第八师准备出兵讨袁。但陈炯明、谭延闿都回电申述出兵困难，说他们内部不一致，实力还薄弱，不能在此时出兵。南京第八师的陈之骥、陈裕时、王孝缙、黄恺元等都说第八师兵士缺额尚多，以前归第八师指挥的林虎一个团已调往江西，湖南都督谭延闿因湘省防务空虚，又把该师陶德瑶的一个团由赵恒惕率领调回长沙。他们还责备我在留守府主持裁兵时禁止第八师招兵，又撤了一个

团长，以致他们不得不把招兵计划延缓下来。因此，他们的结论也是：现在还不能出兵。我们回上海向孙、黄两先生报告南京情形后，黄先生鉴于掌握兵权的人既不肯在此时出兵讨袁，仅仅我们在上海几个赤手空拳的人空喊讨袁，是不济事的。他遂主张暂时不谈武力解决，只好采取法律解决的办法，要求赵秉钧到案受审。黄先生这种用法律解决的主张也是有一种用意的。他认为当时国人还未认清袁世凯的凶恶面目，还以为反袁是国民党人的偏见；我们如果通过法律解决的办法把袁世凯谋杀宋教仁的真相暴露出来，使国人共见共闻，即可转变国人对袁世凯的看法，激起国人的公愤，使他们转面同情国民党。是时，上海法庭曾根据所得证据票传赵秉钧到案，赵拒不到庭。同时北京方面亦借口在京破获了国民党的暗杀机关，通知上海法庭转传黄先生到案。黄先生为了揭穿这个阴谋，便按时向上海法庭报到。袁阴谋终不得逞。

是时，袁世凯到处派人收买革命军人，广东驻沪代表覃籟钦已被袁世凯收买，态度暧昧，行踪诡秘，上海同志都对他特别警惕。袁世凯并派北京平政院院长庄蕴宽来沪探听我的意见。庄对我一向关怀，且知道我的性格，他不直接找我而托他的秘书问我愿不愿离开上海。他的秘书对我说：“袁总统托庄院长告诉你，如你愿意回京，不必再入总统府，可出任绥远都统；如你愿出洋，袁总统愿送你旅费八万元。这是袁总统的意思，托庄院长回沪之便向你转达的。”我说：“黄先生在沪一天，我绝不会离开此地。如宋案得到合法解决，我与黄先生也都不会长留在上海的。”

孙先生在那时还是主张出兵讨袁。他一面派人赴各省联络军人，一面还派陈其美、戴天仇（后改名戴传贤）来与黄先生辩论。黄先生仍然坚持不能用武力解决的意见，往往争论激烈，不欢而散。孙中山先生这时想亲自到日本寻求日政府的援助，但黄先生

和在沪同志多不赞同此举。黄先生认为依靠外援来反袁，是不容易得到国人谅解的，而且袁世凯反可以此为借口向欧美各国求援。

袁世凯在对南方的军事部署就绪、大借款成功以后，就下令把广东、江西、安徽三省的都督免职。此时大家都感到保全实力、隐忍待时已不可能了。江西都督李烈钧离职赴沪后，又返湖口，于七月十二日宣布独立，树起讨袁旗帜。

南京第八师的两个旅长王孝缜、黄恺元于七月十三日午后仓皇来沪，向黄先生密报说：朱卓文从上海携款二万元到南京运动第八师的几个营、连长，叫他们杀了师长、旅长后宣布独立，并请孙先生莅临南京主持讨袁军事。但未受运动的营、连长向王、黄两人报告了这个消息，并主张先发制人，除掉这几个营、连长。他们两人认为第八师主张慎重，不轻于发动讨袁，是为了替本党保存实力，留在将来起更大的作用；现在若内部自相残杀，必至两败俱伤，第八师实力势将完全消灭。他们两人感到与其自己消灭自己，不如一致对付敌人，虽实力不能保存，也算作了光荣的牺牲。因此，他们两人嘱咐告密的人把这个消息极端保密，不要告诉别人，也不要报告陈之骥师长，因陈是个性情耿直、胸无城府的人，恐怕他听了这个消息，暴跳起来，反误大事。他们两人在向黄先生报告了如上经过以后，就对黄先生说，现在事已至此，虽准备未充分，也只得树起讨袁的旗帜，请黄先生赴南京作讨袁军总司令，他们一致服从，但千万请孙先生不要在此混乱时期赴南京，须俟南京独立稳固后，再请孙先生去组织政府。

在商讨总司令部组织时，他们建议总司令部的参谋长人选可俟黄先生到南京后再行公推，只是声明不要钮永建、李书城两人担任。因为他们认为钮在广西督练公所作帮办时，遇事迟疑不决，

顾虑太多，往往对重大问题不能及时解决；而李在留守府主持裁兵过激，曾撤过第八师一个团长的职，致使该师兵员至今还不足额，官兵对他有意见。黄先生见势已至此，遂应允他们的要求，决定次晨赴宁。他随即往见孙中山先生，说他自己愿赴南京举兵讨袁，请孙先生在初举义旗时暂勿赴南京，俟创立一个局面后再请孙先生前往主持；并谓南京独立后，须有上海方面的兵力、财力的支援，请孙先生在沪督促陈其美赶快占领上海。孙先生同意后，黄先生乃囑王孝缜、黄恺元两人当夜赶回南京，布置起义。

七月十四日晨，黄先生装作赴南京游览的姿态偕同眷属乘沪宁火车到达南京。是晚即在李相府陈之骥住宅开军事会议，与会者有南京第一师师长章梓、第七师师长洪承点、第九师师长冷遹、第八师师长陈之骥等。会上决定出兵计划，各部分担任务如下：原驻江北的冷遹第九师，加上从第八师编成的一个混成团（团长刘建藩），共同配备在蚌埠铁路沿线，抵御冯国璋南下的军队；章梓、洪承点两师布置在淮扬一带，防守长江要塞，阻止张勋部前进。黄先生于次晨（七月十五日）赴江苏都督府会晤程德全，请程通电各省宣布独立。程德全被迫应允，并推黄先生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

当黄先生在江苏都督府会客厅候晤程德全、程尚未出见时，江苏都督府参谋长兼江苏第一师师长章梓突然宣布前第一师师长陈懋修、讲武堂副堂长蒲鉴、要塞掩护第二团教练官程凤章、南京要塞司令吴绍璘等通敌，均予枪毙；尚有张一爵、张斯麟两人闻风先逃，未被捕获。据陈之骥告我说：被章所杀的那几个人，多是留日陆军学生，曾在徐绍桢统制下作过军官，因与章梓素积嫌怨，遂为所杀，并不是由黄先生或程德全的命令执行的，也不是由南京几个师长会商决定的。

程德全虽被迫宣布独立，但于七月十七日托故离宁，设办事处于上海，饬南京取消独立。南京宣布独立后，第八师组织一混成团，由刘建藩指挥向江北进攻。在该团尚未到达前线与第九师会合时，第九师的前线指挥官迫不及待，首先单独发动进攻，与敌军交锋未久，即被击退，溃不成军，纷纷后退。刘建藩率所部进入阵地后，因人数不多，只能采取防御战术，坚守待援。与此同时，陈其美、钮永建攻取上海，亦告失败，敌军将从上海进逼南京，而湖口方面失利的消息又传到南京，南京将有三面受攻的危险。讨袁军参谋长黄恺元见南京形势危迫，深恐黄先生悲愤自杀，日夜守在黄先生左左，并极力劝请黄先生离宁赴沪。黄先生离宁时，师长陈之骥赶来送行，知黄先生身无一文，临时找卫队长凑集了银币七十元送交黄先生作旅费。黄先生坐日本停在下关的运煤船，与黄恺元同赴上海。据陈之骥说，黄先生临行时曾嘱咐他要维持南京秩序，不要让残留在南京的兵士扰害商民。

南京取消独立以后，第八师将开往江北的部队绕道瓜洲调回南京，并将蚌埠桥梁炸毁，以阻止敌军南进。接着，何海鸣运动守卫都督府的第一师残部，又在南京宣布独立，自称讨袁军总司令，旋为第八师的部队逼令取消。第八师兵士受何海鸣部下的煽动，向官长索饷，鼓噪不已。代理团长李浚召集士兵训话，严加谴责。士兵即将他打死，纷纷四散。第八师的军官亦全部离宁，各自逃亡。南京第八师的实际领导权一向为旅长陈裕时所掌握。上海方面的革命党人认为第八师初则反对出兵讨袁，继则一遇战事失利，就在南京取消独立，这些都是陈裕时在暗中主持的，因而对陈衔恨甚深。他们已组织几个暗杀人员，拟俟陈由沪赴宁进入城门时将他杀死。此消息为他的妹夫何遂所探知，乃急电陈中途退沪，陈始幸免于难。又陈裕时为使第八师获得保障与发展，

曾与袁世凯的亲信陈宦暗中有联系。在袁称帝时，陈裕时为表明自己的立场，曾约请黄恺元赴长沙劝说汤芑铭，他自己也亲赴成都劝说陈宦，敦促汤、陈通电反袁。后黄恺元出家为僧，在杭州一小庵内修闭关法，因病圆寂。陈裕时亦在家学佛，参访汉、蒙、藏佛学大师，颇为虔诚，在抗日战争时期因病死于重庆。

上海、南京讨袁军既相继失败，广东、江西、福建、湖南、四川的讨袁军亦先后崩溃。国民党内部有人认为此次讨袁失败原因在于未先发制人，坐失时机。但当时各省将领起初所以不肯举兵，都是因为各有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及早发动，举兵讨袁，也不一定就能取胜，因为成败关键并不是这样简单的。

（五）亡命日本以后

黄先生离宁所乘日本轮船未在沪停留，径直开往日本。他曾在船上写一密信告我说，他在吴淞口不能上岸，只得去日本。我还记得他信中有“这次上了当”一句话（大意如此），不知意何所指，以后见面也未再询问究竟，至今还不明白。

南京、上海讨袁战事失利后，我还未打算离沪。有一天，我在上海电车上看见上海护军使的悬赏布告，写明缉拿黄兴、陈其美，各悬赏五万元，李书城、黄郛各二万元，且不论生死，一律给赏。我觉得不可再留在上海，遂同何成濬离沪赴日。

我们在神户上岸，在所住旅馆的旅客簿上填上假名，并向来访的警察打听黄先生的住址。警察未肯相告。我们忽接到一个自称是“同情”我们的日本人来信，说他有一件极机密的事要当面告知我们，请我们于某日某时乘某路电车到某站下来，他穿某种衣服在站迎接云云。我同何成濬照信中所述时间、地点前去。果然有人在站迎接，把我们请到他家中。这个人向我们说，他愿意

为中国政府效劳，刺杀黄兴，只要我们在中国驻日使馆取得一支手枪给他，他即实行。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个人看错了人，把我们当成袁世凯的爪牙了。我们同他敷衍几句，即回到旅馆，把当地警察找来，告知他这件事。警察听说，并不惊讶，谓可一笑置之。这时，他才把黄先生的住址告知我们，并陪同我们到黄先生那里去。

我们不久即同黄先生移住东京，国内参加讨袁失败的同志也陆续来到日本，大家交换意见，筹谋善后办法。这时，孙先生提出了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的意见。他把本党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党员不听他的话，并且认为黄先生应负更大的责任。孙先生说，在南北议和时期，他愤袁氏狡诈，曾主张宁可开战，不可让步，但黄先生不赞成；以后他主张建都南京，要袁世凯南来就职，黄先生也不表示坚决支持；宋案发生后，他主张用武力解决，黄先生也不肯听；他欲再赴日本求援，黄先生又力阻其行；最后他本拟亲赴南京出师讨袁，黄先生忽自告奋勇，阻其前往，致招挫败，全局瓦解。孙先生既把一切失败的原因，都归之于党员不听话，尤其是黄先生不听话，所以他主张改弦更张，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并且规定党员入党时要写誓约，打指印，以表明愿意牺牲一切，服从孙先生的命令。陈其美、戴天仇、杨沧白首先赞成，并邀约在日亡命的同志都一致参加。但一般首义有功的同志，尤其是在首义时作过高级将领的同志，都认为这种写誓约、打指印的做法有失身份，不肯附和。孙先生仍然坚持一定要这样做。陈其美复到处奔走，要大家赞成，凡不赞成加入的同志他就大肆攻击。黄先生曾约请胡汉民、汪精卫两人设法婉劝孙先生改变这种做法。胡、汪两人说，他们最初曾尽力劝阻过，但后来鉴于孙先生的意见异常坚决，为暂时照顾孙先生的情绪，他们两人都勉

强按照孙先生规定的办法履行了入党手续，等候时机再设法进劝。黄先生以为长此在东京相持下去，恐同志之间意见日深，将自行削弱革命力量，给敌人以挑拨离间的机会，故决定离开日本，远适欧美，以便使孙先生得以行其所是，各不相妨。黄先生遂于一九一四年夏由日本乘轮先赴美国，并准备遇有机会再到欧洲游历。

同黄先生赴美的有翻译徐申伯、秘书石陶钧和我。翻译唐月池则先期前去办理入境手续。我们到达美国旧金山时，唐月池与先在美国留学的黄先生长女振华以及旧金山的许多侨胞都前来迎接。因时临夏季，在旧金山未住几日，即在旧金山北面的一个海岸避暑地住了一个多月，随即赴纽约小住。不久就在费城郊区租赁一所住宅定居下来。

从美国西部到东部，凡有华侨聚居的地方，黄先生都被邀去作了访问。各地华侨同胞除开会欢迎外，并拟筹集款项送给黄先生作革命活动的经费。黄先生每到一处，除了说明旅外侨胞历来帮助革命，贡献很大，向他们表示感谢之外，并详述袁世凯背叛民国的史实，鼓励华侨继续奋斗，共同打倒袁世凯。他并嘱华侨同胞将筹集的款项直接汇寄东京交孙先生支配，声明他自己这次是来美暂居，不需要侨胞资助。他每与侨胞谈及孙先生时，都表示很尊敬孙先生，从未讲及他自己与孙先生在党的改组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因为他唯恐因此使侨胞热爱祖国的情绪受到影响。

黄先生旅美期间，欧战已发生，日本也接着对德宣战。聚集在东京的一部分未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同盟会会员认为时局严重，相约组织“欧事研究会”，经常商讨当前时局及应付的方针，并函告黄先生，征求黄先生的意见。

黄先生到美国后曾商请章士钊在日本创办《甲寅杂志》。这个刊物在当时对革命起了推动的作用。当时有些同志在东京创办了

大森浩然庐和东京法政学校，专收亡命日本的同志学习军事和政治。殷汝骊主办浩然庐；彭允彝主办法政学校。两校的经费是由黄先生和李烈钧负担的。

黄先生在美听到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时，立即向国人表示，为了举国一致反对日本无理要求起见，即时停止反袁活动，以便袁世凯专心对外，维护国权。国内外同志多响应黄先生的号召，作了同样的声明。后来袁世凯阴谋推翻共和、僭称帝号时，黄先生听到孙毓筠、胡瑛、李燮和加入筹安会，洪承点等签名赞成帝制的消息时，极为愤恨，骂他们是革命党中的败类，认为这是革命党人的耻辱。

黄先生在费城郊区住下以后，正拟从事美国国情的研究，并计划参观访问一些地方，以广见闻，不意在某晨起床以后吐血数升，经医生诊断为胃溃疡病，须妥速治疗，并作长期休养。为使黄先生能静心养病，我与石陶钧迁出黄先生住宅，另在附近各寄寓一家庭旅舍，一面学习英文，一面了解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石陶钧不久移居旧金山，寻又先行回国。我学到几句英语后，即坐火车从费城到旧金山，又从旧金山经美国南部绕道华盛顿回到费城，计往返时间约一月有余。

我在这一个多月的旅行期间，结识了一些美国友人，增长了不少知识，特别是对于美国的种族歧视政策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感触甚深。当我旅行归来，同黄先生谈到这些问题时，黄先生说，我们回国后，一定要用政治力量来尽量防止这些不合理现象的产生；同时他也谈到了他对于将来建设中国新社会的理想。他说，将来中国要由政府开办养老院、慈幼院、卫生院、残废院，经费全由国家供给，不收费用。所有大、中、小学校也都由国家设立，免费供给学生膳宿，学生只要考试及格，

即可入校读书，使穷苦人家的子弟也能受到教育，不让有钱的子弟占有特权。黄先生还时常谈到男女平等的问题。他认为中国社会受孔教的影响，对女子抑压太甚，要矫正这个积习，应先让女子能与男子受到同等的教育，享有与男子同等的财产权、选举权、劳动权，只有这样，所有买卖婚姻、包办婚姻、童养媳、嫖娼不能改嫁等恶习才会自然消除。他还说，中国人口本多，如果占一半人口的妇女从沉睡中觉醒起来，同男子一样把力量贡献给国家，中国的富强就可以赶上欧美。他认为这是我们在回国后应该大家努力去做的一件事情。

袁世凯在打败国民党的讨袁军队后，更加肆无忌惮，公然帝制自为。黄先生在这时期，加紧与国内外同志联系，鼓励同志各就力之所及，分别活动，不论各党派政见如何不同，不论他们以前与国民党有何种嫌怨，只要他们现在反对帝制，肯出力打倒袁世凯的，都要与他们合作。当全国讨袁声势重新高涨的时候，国内同志及一些日本朋友都电催黄先生早日回国。黄先生遂于一九一六年五月由美国乘轮回到日本。轮船甫进入神户港内，尚未靠岸，头山满、宫崎寅藏、萱野长知等即乘小轮迎接黄先生先行上岸，寻赴东京。日政府先已借给岑春煊^①二百万日元，以半数作军费，半数在日本购买军火，这时又提出借给黄先生五百万日元作为招集旧部编练军队之用，并无任何条件。黄先生囑我到上海筹备。我到上海不几天，袁世凯就死了。于是黄先生回到上海，各地同志都来上海会商。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在国会恢复后国民

① 一九一六年五月一日，两广反袁部队组织都司令部，举岑春煊为都司令。八日，组织军务院于肇庆，推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兼抚军长事。

党的国会议员如何在国会内进行斗争的策略问题。在此期间，黄先生与孙先生互相过从，商谈国事，一如往昔，并无丝毫芥蒂。

黄先生回国以后，病体并未恢复，又因应接繁忙，生活习惯骤然改变，以致胃溃疡旧病复发，又未能及时转地疗养，照常会客谈话，病情因而日趋严重。十月十日，黄先生因胃血管破裂，吐血数盂，晕绝经时，延至三十一日午后竟溘然长逝，享年四十三岁。

黄先生的死耗传出后，国民党同志固然感到十分悲痛，即素与国民党敌对的政党或个人亦多函电致唁或在报章上著文表示悼念，并对黄先生一生待人诚恳、笃实厚重、效忠革命、勇于牺牲的精神称道不已。

黄先生临终以前，李根源向他辞行时，他曾对李根源说：黎元洪太懦弱，段祺瑞、徐树铮专为北洋派打算，恐怕全国统一无希望，对内搞不好，更谈不上对外了。并对李根源嘱咐几件事：一、胡瑛无志节，可恨可怜，闻他很穷，望念旧交，维持其生活；二、谭人凤修宋教仁墓尚未完工，应有人负责；三、李烈钧队伍快到饿饭地步，须请黎元洪妥筹办法；四、国会要注意立法，法立而后政治始有依据，只问政治则政治愈纷乱不可收拾。

黄先生死后，孙先生继续奋斗，经过一再遭受失败之后，终于一九二四年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使他所领导的国民党走上了新的道路。我常常这样想：黄先生如不早死，能活到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以后，他也可能同孙先生一样以俄为师，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将成为帮助孙先生实行三大政策的一个好助手，对中国革命事业将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原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个别地方经作者作了订正）

与黄克强相交始末

章士钊

吾与克强初相识，在武昌两湖书院斋房中，时千九百零一，即前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秋也。吾生于光绪七年辛巳，是年虚岁二十一。先是，吾读书于长沙东乡和佳冲老屋，用功甚苦，患咯血症。吾姊忧之，稍为摒挡，劝吾远游，至游何地，将何为，吾与姊皆未尝计及也。迨抵鄂，赴自强学堂，谒监督程颂万子大，辞以非考期，不收新生。则有旧同学善化王闿宪，隶两湖为寄宿生，愿分斋舍与吾共读。吾因以未尝注籍全不合格之僥来新生，鸠居鹊巢，朦混一时，以是识克强。克强以同治十三年甲戌生，虚岁二十八。

吾初识克强，不过同舍嬉游而已，彼此并无所体会。翌年壬寅，余赴宁，入江南陆师学堂。又明年癸卯，余率陆师退学生趋上海，蚁附爱国学社，公言革命。而克强以日本弘文师范生，毕所业返国，稍滞于沪。吾二人握手道故，而形势大变。

吾于是年五月一日，正式入苏报馆任笔政。距是以前，亦为苏报撰文。吾忆访克强于洋泾滨客栈。是日，苏报论文为诋诃江南陆师学堂退学事，克强询退学情形甚悉。可见克强由东抵沪，时在初夏。自五月以至闰五月，吾迫于报务，与克强见面不多。洎苏报被封，吾从事实际革命工作，开始与克强计划如何筹款。第一步，吾二人同赴泰兴，访龙硯仙，又同赴南京，访魏肇文（江

督魏光燾第三子，新由东京返国)，旋折回沪，部署略定，乃同返长沙，始筹备华兴会。

华兴会开第一次会议于长沙，地点在彭瀚恂宅，到会者共十二人。十人湘籍，余二人为侯官翁玖、无锡秦毓璠。湘籍十人，除克强与吾及彭瀚恂外，刘揆一、胡瑛、柳大任叔侄咸在。时癸丑七八月间。

会后，吾返沪，长沙经理一切，克强独任之。已在明德学堂充教员，别设华兴会机关，联络会党，乘隙起事。事后，据龙莫溪笔记，得其崖略如下：

华兴公司，赁屋于南门外为之，表面标榜兴办实业，里面直是革命组织。无何，外间指目克强为革命党，谣言稍起。九月二十五日，余（按：此龙莫溪自称）在家中宴客，克强与焉，扬扬如平时。唯笑谓余：“有相士谓我，将有縲绁之灾。”余曰：“此无稽谰言，公何信之？”时克强寓紫东园，忽报寓所有士兵搜检，里衙遮阻，人不得出入。寻知会党首领马福益，部下失风，于醴陵车站被逮，词连黄董午老师，即克强也。余亟引克强入西园密室暂避，而外察形势。时学务处总办张鹤龄、兵备处总办俞明颐，皆素交，且通达时务，无意兴大狱，事稍缓。是夜，克强以布置革命实况见告，党众约二万余人，教员学生居多，惟无一语及新军。此或克强不欲激动俞寿丞，俾便相助，亦未可料。综计克强所语要点，归宿于十月十日，那拉后万寿节，百官赴皇殿庆祝时，一举轰之，从而四方响应，庶几成事；今事已破坏，无取渎叙，现同志被获者不知几何人，如事态扩大，为首者谊当到官，何忍独生云云。胡子靖、谭祖安均在座，闻此言，则共劝慰毋躁，以图善后。克强又言：有一藏置秘件之小箱，存西长街

长沙中学室内，不可放佚。余假托谒客，衣冠出门，迳往该中学携归，就中册籍名纸，悉数焚毁，不留痕迹。克强因取自用水晶小印章赠余，已则读书自遣，饮啖如故。如是者三日，寻为圣公会牧师黄吉亭及湖北曹亚伯掩护出乡赴沪。久之，湘抚端方谓余：“足下胡乃放走黄兴？”张小浦从旁答曰：“龙黄溪不能卖友。”亦遂释然。

事非亲历，唯同人口语是信。黄溪遂以信友著闻，号八先生。岁甲申，即一九四四年，黄溪年七十，吾违难重庆，曾草一文，展扬龙氏昆仲风义为寿，辞多不录。大先生硃仙事，前见，兹仅留一语作质的，曰：辛亥以前，湖南新起形势，不论激随缓急，大小轻重，都不能违离龙氏，惟克强革命亦然。

克强返沪，与吾辈复合。时吾为革命后方略有筹画，重心尤在宣传。吾既创立《国民日报》，复别设东大陆图书译印局，除邹容《革命军》先期印发外，如《黄帝魂》、《孙逸仙》、《沈荇》、《攘书》等小册子，以及《保国歌》等单张，充类布达。吾又租赁招待所四处：一在余庆里，一在梅福里，两所在昌寿里，此一为日报编辑所，一为克强与吾徒秘密计事处。一夕，议程刚了，客散，克强出新置手枪，相与摩挲，偶一失慎，子弹翻迫吾额，扬声飞去，突入窗棂寸许。吾二人大诧不已，幸其地僻，未令邻屋闻知。尔时内地各处，东连日本东京，同人风闻克强在湘谋大举，渐次到沪会合。各招待所随分安置，而余庆里尤有人满之患。克强仍自赓续湘局，为逾年浏、醴起事张本。华兴会者，以振兴实业为名，人众而机事难密，则湘中增设同仇会，联络红帮弟兄，上海别树爱国协会，招邀内层志士。如蔡子民、陈独秀、蔡松坡辈，咸在上述秘密计事处，由杨笃生监视加盟。盖克强志切实行，恐其名重易漏，坚不肯任会长，于是众推笃生主持，而吾副焉也。

所有革命计划，当然以暴动为主，而暗杀亦在讨论之列。特后者克强不甚赞成，而笃生认为必要。笃生勤攻化学，制置锅炉道具，在余庆里宅，著手试验。居无何，以万福华刺王之春闻。斯案也，异军突起，与华兴会原不相涉，吾别撰甲辰年暗杀案一文详其事，兹不赘缕。案发之明日，缘吾侦察不谨，牵率余庆里同人十余辈入狱，克强与道员郭人漳亦在逮。卒之人漳得南昌抚署电保，先释出；克强以随员名义，连同被放，驰赴东京。后四十日，吾亦出狱东迈，上海之局，暂告结束。时千九百零四，即光绪三十年冬初也。惟笃生幸脱系累，独行踽踽，不告于众，潜踪北京。寻知栖身译馆（谓充译学馆教员），旅进旅退，假友闲房，托言制皂，从而阴合炸器，手授吴樾。越两年，东车站炸五大臣案，震耀一时云（制皂事闻之朱启铃）。

吾抵东京，寓牛込区若宫町二十七番地。未久，克强移来同居。适中山孙先生由横滨携小行囊，独来东京，旨在合留学生，议起大事。而留学生时以杨度为有名，彼寓富士见町，门庭广大，足以容客。于是中山与杨，聚议三昼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弊，畅言无隐。卒乃杨曰：“度服先生高论；然投身宪政久，难骤改，橐鞬随公，窃愧未能。度有同里友曰黄兴，当今奇男子也，辅公无疑，请得介见。”（刘禺生《世载堂杂忆》称：杨度与中山初见于横滨永乐园。愚按：孙、杨横滨之会或有之，然决非初见。禺生又谓：同行有梁焕彝。吾知焕彝留英，未到过东京。禺生记事疏阔，往往类此。）中山喜。翌日，吾若宫町宅，有先生足迹见临。克强与吾，皆初见先生。吾昨岁草《孙逸仙》册子，以前知尤相契合。楼下席广窗明，主客失次，三人或蹲或卧，按地图，议天下大势，殊未易一二数；俄而集留学生，为大会盟之议起。先生辩才无碍，指挥若定，吾徒倾心折服，难以形容。克

强情异虬髯，帜髯自树，太原真气，户牖冥濛。时则汪兆铭、胡展堂之流，头顶辘轳，手摩讲章，出入梅谦次郎之门，洋洋与同舍争一日之短长，顾仍木然无动于衷也。

上海之新败也，吾才短力脆，躁妄致敌，潜怀我杀伯仁之惧，兼蓄愿为周处之思；加以未达壮年，了无学殖，人众茫然无主，事到不知所裁，眼前失机犹小，将来误事必大，愿假数年之力，隐消大过之媒。际兹大党初建，应以分工为务，量其才力，资其性分，缓急文武，各任所宜。吾于焉发议，本党大队趋重实行，小队容其攻苦，审时度势，或庶几焉。孙、黄二公，不允所请。吾坚持本议，久而不决。吾忆太炎与孙少侯，同寓新宿，受二公之托，要吾莅盟，吾不署诺，则见诱禁闭一室，两日不放。卒之克强明吾本怀，敢证忠纯不二，听吾自择，众亦释然。当同盟会旗鼓大张之时，正鄙人闭户自精之候。时吾年已二十五矣，洋文不识ABCD，算学不解乘除加减，老泉廿七，初学篇章，才谢秦嘉，见笑聘室（聘妻吴弱男，行毕业青山女学院）。千九百零七年，吾发东京，经沪赴英，在苏格兰大学，修硕士学位，距结业不足一学期，而武昌事发。吾废卷东驰，涉冬抵宁，在铁汤池参谋部会客室，重与克强相晤，则千九百十一年之冬矣。

吾留英五年，所学几何，伊谁知之！顾吾赴游府西街，谒宋遁初，寒暄乍已，主人捧剪报巨册见示，则数年间，吾所寄京沪诸报论政文字咸在，质不可晓，而量殊可观。吾笑谓遁初：“江左夷吾偌大本领，原来孕育于故纸堆中，亦自可喜。”遁初以一笑见报，两俱莫逆。吾思之，吾重思之，遁初后来见毁，终为此类断烂朝报所误。五十年旧梦，默演一过，为之慨然。

中山先生之在伦敦也，原要吾掌记。吾率一妻二子，料量不易，迟迟其行。迨吾抵南府，则胡汉民独拥记室皋比，似无余

事可办。克强谓吾：“各部长官多久旷未到，君一试何如？”吾曰：“否否，吾有铁饭碗在，公何忘耶？”克强一笑喻意。时《民立报》为同盟会唯一刊物，言庞待理，于右任闻吾愿任斯职，大喜过望。虽然，此中铁门限，逾越不得，盖吾非同盟会员也。初建党时，吾未加盟，倘趋踰于政成之后，非鄙夫谁胜此？克强知吾性悻，因不欲相强。顾建政之初，党人势张，不治舆论之事非一，他报不敢置辞，訾嗽让《民立报》为之。就中建都问题，及汉冶萍借款一案，《民立报》社论之悍然不顾，去与政府为敌，其间不能以寸，而借款亦适以此不就。党人因大哄，谓党报也，奈何使非党人持之？实则此类反动文字，非出余手，撰文者例自署名，一目了然。顾余总主笔也，虎兕龟玉，究不得不负其责。克强、右任人窘，左右不知所为。余曰：“党人责难是也，吾辞职便。”黄、于皆坚不允。吴忠信时充报社协理，尤涕泣相留。余曰：“否否，凡事以理胜者，不可以情克。”吾卒摆脱此职而去。其时天下有视，视《民立报》，有所听，听《民立报》，某也“焉从而来，焉往而止”（二语本柳集），世多疑焉。

吾脱离《民立报》后，与扬州王无生，别刊《独立周报》布于世。报社设小花园。吾勤勤执笔，仍旧贯，然光气一落千丈矣。继知无生暗受袁世凯津贴，余尤意兴索然，不数期即搁笔。克强适以世凯邀遮，拟赴宛平，央吾同行。吾曰：“君且不免为曳尾龟也，独不畏尾大不掉乎？”相与一笑而罢。时元年冬也。实则吾困群疑罪谤之中，不欲久留沪，亦愿北首燕路，一看形势。因先趋天津，略有所事。一夕，访梁启超于《庸言报》馆，值熊希龄、杨度在座。启超慰曰：“国民党锐意起内阁制扼袁世凯，而手控宪法起草权，弛张惟意，世凯恨焉。吾党诚不知何道之从，君其无意解斯厄乎？”吾视启超儿上，有汉译蒲律士《民主政治》两巨册在，因检费城会

议一节，笑谓启超：“公试读此，应有所得。”三人者俱大论。越数日，《庸言报》出，梁先生主张宪法草案，脱国会独立，北美开国，供吾先例，中国有华盛顿，宜施设是。此常人所不敢言，宪政党人耻之，而余适于是时入京。杨度者，时以“旷世逸才”出入袁幕，屡谓吾曰：“袁遣沈兆祉先道地，子不入谒，非礼。”余不获已，偕杨往。

无何，吾与袁迹日亲，稍稍预袁秘事。吾内心滋疾，苦不得脱。袁已前知吾婿庐江吴氏，则谓吾曰：“君自家人，有所见，恣言毋隐。”余闻言大震。吾妻吴弱男，在沪得袁书道地，函电交盾吾，革命党不得自污为裙带官。其实余固无求官意，北京大学校长，牒虽出，已辞去矣。不久，宋案发，遁初遣电到府，吾方与袁会食。袁太息曰：“遁初可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余瞥视电文，仅寥寥“开诚心，布公道，尊重宪法”十大字。余隐笑遁初受袁诳，至死不悟。食竟，起赴邻室，就当日事泛论之，惯例往往如是。袁著黑绒缎袍，长不过膝。案置精器，贮鹿茸片，且谈且检食。额多汗，时以毛巾揩拭。两目有光如电，时奔射人。语次，竟以宋案凶手归克强，执先一日同孚路黄寓议事、黄宋争国务总理、两派大决裂为证。余大忿，不对而出。明日，余潜赴东站，独驰返沪。

吾到沪，先谒克强，问军事部署状，克强气不振。余曰：“即败，亦须为之，以袁且称帝，后世见责，将不任也。”克强意不谓然，谓袁专横诚有之，称帝却不敢。往见中山，语如前。中山喜吾主用兵，而同以吾诋袁为过当。余叹国民党军力熠矣，高论何益，即亦不辩。中山曰：“自苏慎初、张我权两师长被袁收买，粤如无人之境，非利用龙、陆，不足举事，君能往说岑春煊乎？”克强在旁，怂恿尤力。吾曰：“姑试为之。”明日，王芝祥来，吾与计此事。芝祥喜跃，急赴杉板厂，为吾先容。又明日，吾与西林（岑

春煊)纵谈天下大计,语无不合。西林极意诤袁,用力无所顾惜,且愤然曰:“吾且如汉文帝,单骑迳赴梧州龙济光营,视济光不作周亚夫,将胡为者?”此虽拟于不伦,而语甚壮。孙、黄二公大喜。吾因自居曹邱生,在沧洲别墅设宴,宴两公及西林,视士相见礼;约汪、胡与陈英士、于右任等,共襄是事;吾夫妇各出席之尽头起立,举盏为寿。由今思之,髣髴沈沈,此殆不得谓非革命豪帅之东南高会也。

西林时充粤汉铁路督办,越数日,约吾驰赴汉上,说黎元洪举事。西林勇锐过国民党,孙、黄阴寄厚望。迨吾偕过江,抵都督府,适章太炎、李仲仙咸在。吾徐以袁世凯帝制自为状语元洪,元洪愤激,立而誓曰:“项城称帝,元洪敢以百口保之。”一座噤然,主人送客。屏后袁探不乏,即日北京洞悉其事。是夜,元洪密遣人,资台票五百版,致太炎与吾,央即刻返沪,免为人算。西林稍迟数日,亦并东下。武昌约从之行,其效如此。

上海计事,孙急而黄缓。然黄先生之缓,盖深悉其军力及错综之情状而为之,非得如孙先生逞情而直行也。计其时可用之兵力,湘、粤均摧毁无余,已使两先生同为痛心,所剩者只区区南京第八师耳。此区区者,孙先生遽欲欲动其营连长,戕杀师旅长,冒险以求一逞。夫未加遗一矢于敌人,先喋血于萧墙之内,此何等惊险前景!黄先生所为痛哭出师,谓身代先生以赴敌,留先生领大事者,真披肝沥血,万分请迫之言,可为知己道,而难求谅于后人者也。是时吾在两先生左右,孙先生急,而吾似较孙先生尤急。何以故?以吾挟一袁氏称帝之固定观念,而两先生俱无有也故。(按此段所引两先生之言,皆出两先生遗札。)

卒之议定:孙先生留上海,督陈其美备豫响应;李根源充讨袁军参谋长,辅西林赴粤;吾充讨袁军秘书长,随黄先生入吴。

吾忆黄先生午车出发，吾夜车继之，翌日早旦，趋第八师司令部取齐，吾立伴黄先生，往谒都督程雪楼。未入督院小花园门，已睹严装劲旅，擎枪密集于议政厅前，无虑数百人，枪托顿地，吼声远闻，其为威惕势禁状，绝非恒人之所愿见。于是克强历阶而升，吾紧贴于旁，雁行徐进。雪楼自迎于门，口语不断；克强大声为兵动未戢告罪，雪楼张口荷荷，仍不辨何语。罗佑子时为督署秘书长，亦前席，则相将入客室，四人嘿尔对坐。雪楼先发言：“袁世凯不法，天下之公愤，江苏何敢独异？吾意如苏州人盘辫子，先佯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已耳。公骤起任事，得大解脱，幸甚幸甚。”克强向不善词令，称：“兴暂治军，余惟都督之命是听。”此外交换彼此情报，吐辞无多，饮茶一巡而退。癸丑讨袁之役，南京一幕之开场白，如此而已。

近唐生智记孙、黄两先生琐闻，录克强讨袁通电一则如下：

“兴一无能力，尚有心肝，此行如得死所，乃所尸祝。若赖祖宗之灵，民贼一去，即当解甲归田；国中政事，悉让贤者。如有权利之想，神明殛之。”

此赫然吾之手笔也。五十年后，犹能动人心弦，勤勤记录，则当时言非外铄，黄先生有其本来，可想而知。

此役士气消沉，匪夷所思。师长陈之骥，为冯国璋女夫，原不能为主动。黄凯元、王孝缜两旅长，虽为克强心膂，而以屡受煎熬，上下交迫，口称徇友，悒郁不堪。师部矛盾既多，兵额不足，守城而外，几于难移一步。冷遁第九师，屯第一线，由韩庄败退，强敌迫近眉睫。洪承点以师长兼兵站总监，徘徊徐、蚌之间，罔知所措。外无援兵，内困孤阃，两三日间，形势了然，倾败已睹，唯争顷刻。一夜夜深，两人相对愁苦，克强谓吾：“程雪楼逃出国城，妄自通电，利害虽异，交谊何存？君何不到沪责之，

加以禁制？”噫嘻！此克强不愿为张巡，而故放许远之托词，吾岂不知。翌日，禁泪告别，反奔沪渎。不数日，克强求自杀不获，亦以得日人遮护，迳航东京闻。南京讨袁总司令部，倏尔灰飞烟灭。

吾徒革命党也，共和昙花一现，重履亡命之途，浑沌穷奇，亦何所谓！顾克强精神抖擞，仍复计划多端，期于振刷。顷拾得遗札一通云：

昨晚劭襄兄来云：杂志之事，汉民兄等，仍要求兄主其事，未经允诺，殊为悬悬。弟思袁氏作恶已极，必不能久于其位，兄能此刻出为收拾人心之举，亦不为早。至组织后，如最激烈分子，当可设法使其不僭事，劭襄亦言及此。如何之处，乞示知，不胜盼祷。

由此贼可得窥见数义：

一、克强败后赴东京，仍与中山先生合作，至欲强拉一非同盟会之旧友，共创机关刊物。外传克强反孙，显系造谤。

二、强吾主持杂志，倡议者为胡汉民，可见当时仍不乏谋党内外团结者，克强实为当时作合柱石。

三、同时亦有如夏重民者一类激烈分子。吾另办《甲寅》后，夏重民曾捣毁吾林町社址一次。倘真共营一报，后患宁复可言。

四、劭襄者，刘承烈也。现外国语学院院长仲容之父，为热烈而有学识者之一人，解放后在北京化去，友朋中弱此一个，至堪痛惜。

时则中山认为二次革命失败，由于党员不听命令，意指克强，刻责无已。而克强温温自克，不一校也。中山别创中华革命党，以服从为第一义，声明必作真党魁，党员须捺手印，明信誓。旧同盟会会员皆不欲，克强不作表示。其时袁力寝盛，党军根株划尽，内地无措手间隙，假其有之，吾意克强终俯首莅盟耳。旧士

官派，方起欧事研究会，异军苍头，职志特异。克强暂难左右袒，乃担簦赴美，冀避其事。此行首尾三年，丙辰护国一役，克强未尝与闻；中山亦困顿异国，难于遽返。后虽在袁死边缘，闯关到沪，终于一筹难展。

一日吾谒孙公于灵南坡，周孝怀不约而至。语次，公废然太息，指吾称：“吾革命无成，因君不肯相助。”孝怀问其故。公曰：“行严左挈岑西林，右携黄克强，二力见辅，吾何功不成？”吾喟曰：“公何言之易也！西林吾新相识，孝怀则旧主宾，性习盖深知之。此公岂容易听指挥者？夫彼为逊清遗老，原与吾党无瓜葛谊，一旦强之濡迹，相率亡命，吾党不仅无一语相慰借，且骂之为官僚，排之不令预事，吾有何面目，更为耳语，使趋事公？至克强与公共事尔久，忠心耿耿，人无间言，今虽稍有痕迹，然吾敢保公有命令，彼无不从，何待有人从中牵曳为？”吾如此说，公亦无语。二客同时辞出，途间犹闻孝怀频频叹声。

袁世凯之自毙于帝制也，国民党殆全无起事力能，中山先生之命令，无可发处。独赖蔡松坡虽注籍梁门，而革命抱负甚大，犹降心与吾辈合。西林则依倚旧部陆荣廷，开府端州，强支门庖。迨吾由粤返沪，以病店僵卧医院，而克强始返自北美。吾忆对语病床，克强欲在西林之久原借款中，稍分一滴，以资因应，吾意款经用罄，商必无成，徒使桂系军人，蔑视吾党，所损太大，终乃未轻开口。未久，克强谢世，致成吾愧对良友之一大事，疾恨无已。

论曰：吾弱冠涉世，交友遍天下，人有认为最难交者，吾都能与之保持始终。吾恃以论交之唯一武器，在“无争”二字。然持此以御克强，则顿失凭依，手无寸铁。何以言之？我以无争往，而彼之无争，尤先于我，大于我。且彼无争之外，尤一切任劳任怨

而不辞，而我无有也。由是我之一生，凡与克强有涉之大小事故，都在对方涵盖孕育之中，浑然不觉。因而敢论定：天下最易交之友，莫如黄克强。又克强盛德大量，固不独对吾为然也；凡视天下之人，罔不如是。视天下之人且如是，何况首领。于是吾又敢论定：人若以克强不服中山相龌龊者，克强有灵，必且惶恐退避，而不作一语，使言者在克强之前，化为渺小无物，不知所裁。

又曰：克强平居自励之语，为“事苟有济，成之者，何必在我。”复举董江都之训诫，“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类语词，吾于昔年宴座谈言之顷，频频闻之。凡此皆先生砥砺自得，深信不疑之词。与泛泛以口头禅欺人者异趣。先生辞南京留守日，吾在《民立报》撰文送之，颂言美德，昭示后昆，即胪举上列二训，以为金玉之式^①。今忽忽五十年矣，巨人长德，历久弥昭；后死者谁，诟尤与积。噫嘻先生！爱而不见，搔首踟蹰，求其友声，还助放我。

①一九一二年六月十八日上海《民立报》社论，全文如下：

论黄留守

行严

黄留守昨解职来沪，中外人士多倒屣迎之；而悠悠之口，颇复飞短流长。语云：“德修谤兴，道高毁来”，其公之谓矣。

辨识英雄之难，夙所慨叹；而疑忌英雄之险，尤所痛心。今之短留守者，出于不识英雄，吾又奚责；而无奈由于疑忌者之多也！天下事之最伤心者，则将士舍其生命，从事疆场，而刀笔之吏舞文墨，以尼其后；不世之杰忍辱含垢，不屑以幸幸之态，愤天下事，而反对者本其阴贼险狠之心理，以施其谗慝。社会待遇英雄之薄，古今同慨，又宁自今番始也？

记者恒忆留守之名言三：

（一）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居；

（二）功成不居；

（三）明其道，不计其功。

兹三语者，留守恒以自励，并以勸同人者也。其心之皎然不欺，实

与天下以共见。黄兴本一书生，以战术绝人誉之，此诚阿附之言；然其能以死报国，义勇盖天下，则神人之所共信。黄兴本一武夫（此与书生之谊并行不悖），于政情法理，研求或不深；至迩时所发政见，诚不必尽履人意，即记者持论，亦恒有立于反对之地位者；至其心地之光明磊落，其不失为一明道之君子，记者梦寐之间，未或疑之。此次任职留守，可谓独任其艰；而道路遽以恋栈买名等号貽之，吾人不得不诵义山“猜意鹬雏意未休”之句，而感慨系之矣！

关于黄兴、华兴会和辛亥革命后的孙黄关系

周 震 鳞

（一）黄兴、华兴会和甲辰之役

“华兴会”这个革命团体创建的日子，是一九〇三年夏历九月十六。这天是黄克强先生二十九周岁诞辰，在省革命志士置酒二席称祝，地点在长沙保甲局巷彭瀚恂的住宅。席间一致认为非组织革命团体，积极进行排满革命，不能够挽救国家于危亡，其中有的人激动得声泪俱下，于是决定大家结盟，团结奋斗。当日参加结盟的有宋教仁、陈天华、谭人凤、吴禄贞、苏曼殊、张继、刘揆一、柳聘农、周震鳞等二十余人。一九〇四年，华兴会在湖南计划策动武装起义，因起义计划在预定起义日期的前一个月被清朝政府侦悉破获而失败了。这就是所谓“甲辰之役”。这次起义虽未成，但是它扩大了革命的影响，为以后“浏、醴之役”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关于黄克强先生早期的革命活动、华兴会在湖南的活动情况和甲辰之役的始末，现就个人所知所见，略述如下：

克强先生的父亲筱村先生和我的叔父理琴先生，都在长沙教馆，常相过从，因此，我和克强先生在青少年时期就订交了。后来我们又在湖北武昌两湖书院同学五年，同住一个斋舍。克强先生原名轸，字莒午，甲辰失败后改名黄兴，字克强。他是一个爱国的血性男儿，平居沉默寡言，治学行事，脚踏实地，对待同志，

披肝沥胆，因而能够得到一般革命同志的衷心爱戴。

清朝政府于甲午中日战争丧权辱国以后，逐渐激起了国内维新运动的高潮。一八九五年，张之洞在湖北开办了两湖书院，陈宝箴在湖南开办了时务学堂。梁启超在时务学堂讲学，传播维新思想，成立南学会，积极宣传变法改制的政治主张，谭嗣同、沈荃、舒善生、杨笃生和秦力山等，都是其中的主要人物。一八九七年，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就任湖北巡抚，谭嗣同延揽这班南学会人士进入他父亲幕府，朝夕相与研讨变法改制的道理。我和克强先生因杨笃生、秦力山是我叔父的门人关系，也就经常和谭嗣同等来往，从此关心政治，研讨时事。但由于我们接受了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思想，认为清朝政府以异族统治中华，媚外卖国，决不能够救亡图存，因此不同意他们的保皇主张，拒绝参加他们的团体。

戊戌政变，谭嗣同等六君子在北京遭害，南学会人士痛恨清朝慈禧太后和一般顽固官吏的专横腐化，急思变革，但仍固执保皇主张。克强先生累次以民族民主革命的道理向他们进行劝说，都没有效果。

庚子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保皇党唐才常等痛感国是日非，并想为戊戌六君子报仇，计划在武汉发动“勤王起义”，结果唐才常被捕牺牲，起义又告失败。这次失政，湘籍南学会人士在武汉、长沙两地牺牲了三十余人，几乎一网打尽，幸免于难的仅杨笃生、秦力山等少数人而已。当他们准备起义的时候，我和克强先生曾协助他们运动清军中的湘籍军人不加阻碍，事后其中有部分中下级军官被清军加以捕治不力的罪名革职。这是克强先生第一次运动军队，初步了解了当时清军的内部情况。

杨笃生、秦力山等经过这次失败，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转变，多次来到我们的斋舍商议以后的革命行动。而克强先生看到戊戌、

庚子两次的失败，更加坚定了根本推翻清朝政府的意志，决心从事排满革命，而且深深地感到武装革命的重要性。

杨笃生和秦力山出亡日本的前夕，克强先生和我在书院斋舍秘密为他们饯行，力劝他们丢掉保皇的幻想，只有革命，才能够救亡图存，为南学会死难烈士报仇。杨、秦等痛定思痛，认识了我们主张的正确，表示完全接受。他们当即同参加饯别的人们一致决定以根本推翻清朝、光复中华、建立共和政体为以后革命的奋斗目标。至于所采取的步骤，决定首先利用满汉不平等的积年界限，宣传鼓动民族革命，然后进一步推动民权革命。又决定从文化教育事业入手，兴学办报，制造舆论，尽情抨击清朝政府的腐朽政治，特别着重揭露它丧权辱国的媚外政策，从而唤起全国人民的爱国革命思想。而且通过兴学办报，得以培养革命青年，作为革命运动的前驱。杨、秦到了日本以后，不久就创办了《新湖南》、《游学译编》等刊物，积极宣传鼓动革命。

一九〇一年，克强先生毕业两湖书院，被选送留学日本，入弘文学院。我本也被选送留学日本士官学校，但因这时湖南一般比较进步的士绅向管学大臣张百熙争取我回湖南办学，张百熙注重桑梓教育，欣然允许。克强先生就坚决要我抓住这个机会，回湘办学，打破湖南的顽固风气，培养革命青年，为革命创造条件。我当即放弃了赴日留学，毅然决然回到长沙，担负起积极办学的事业。而克强先生一抵横滨，看到了日本维新后的新气象，回顾祖国，则是外侮频仍，危如累卵，因此，革命情绪更加激昂，他每次给我来信，都是督促我为革命作好准备。一九〇三年夏历三月二十九日，胡元倬、龙璋、龙绂瑞等在长沙创办的第一个私立学校——明德学堂开学。四月，胡元倬到上海延请教习，适值克强先生学成归国，到了上海，当即偕同回湘。同年六月，我因明

德内外反动派勾结向湘抚赵尔巽告密，说我在明德昌言革命，引起风潮；为了保全学堂，不得不辞去明德教习。革命学生坚决挽留，乃推克强先生到校任教，开始在明德教博物和图画课程，不久又别立经正学堂，由克强先生主持开办速成师范班。同时仍积极进行秘密革命活动。

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四两年之间，湘籍留日学生纷纷回到湖南，分布全省，开办了许多学堂。其中华兴会会员，都就地设立秘密革命机关，印刷宣传品，制造炸弹，购置枪械。一方面借学校讲坛，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另方面联络会党，利用他们的武装力量，待时发动起义。通过以上活动，也就建立了湖南华兴会的骨干。

当时华兴会在湖南的骨干分布情况如下：宋遁初(教仁)在常德中学；刘霖生(揆一)在醴陵渌江中学；谭石屏(人凤)在新化中学；在长沙的则有章行严(士钊)、柳聘农、张溥泉、曹亚伯以及一班革命教师和学生。关于具体分工：章行严因与江南陆师学堂赵伯先(声)等有同学关系，便往来长江一带，担任联络工作；柳聘农担任各地秘密革命机关的交通联系；刘霖生侧重联络会党，我则侧重联络文武学堂的教师和学生；克强先生统筹全局。

一九〇四年初，蔡松坡(锷)先生毕业日本士官学校，也回到了湖南担任武备学堂教习，这时他已放弃了康梁的改良主张，积极赞助排满革命。我在岳麓山高等学堂任教务长，他经常来访，革命情绪异常激昂，跃跃欲试。我每劝他韬晦蓄势，目前应该加意培养革命青年，等到掌握了实力再动。但由于他锋芒太露，不久就被反动学校当局辞退，随即被调到广西，训练新军，开办干部学堂。我当时介绍了部分高等学堂中革命意志坚强的学生，投考干部学堂，随蔡去广西。从此克强先生往来于湘桂之间，积极

进行革命活动。

经过一系列的秘密活动，克强先生认为湖南的军学两界已经联成一气，急欲发动。我则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学生还很幼稚，新军既未成立，旧军也没有完全运动妥贴，如果轻举失败，徒然损害了军学两界的革命基础。但是，这时刘霖生、宋遁初、谭石屏等，已经分别联络好会党首领马福益、游得胜，迫不及待。我只得加紧筹措经费，储备武器，准备起义。

克强先生为了全面指挥革命战斗，早于一九〇三年冬以兴办实业作掩护，在长沙南门外开设了一个“华兴公司”，表面订立章程，招集股本，凡属重要同志，都给以股东名义，以便参与起义机密。

刘霖生和马福益联络了会党二万余人，并联络了安源煤矿的工人，其他同志也在各方面作好了准备。于是克强先生决定在夏历十月十日慈禧太后“万寿节”那天，乘着省城文武官员齐赴皇殿祝寿的时机，在长沙发动起义。

在起义前一个月，克强先生独自来到我的住宅密议，商定万一起义失败的退步办法，嘱我在起义中隐藏勿露，以便万一时能够设法保全革命实力，掩护同志安全撤退。这是因为张之洞、张百熙以及当时的湖南学务总办张鹤龄，对我都有好感，可能得到一些方便。这次起义失败后，华兴会的骨干分子，除了曹亚伯有教会作掩护，得以安然无事外，我果然在张鹤龄的极力维护下仍得留在湖南，执行了克强先生事先交代的任务。

起义失败的原因，是由于马福益、游得胜等在浏醴一带的旧军中出入频繁，人多口杂，以致风声透露，被反动当局侦悉底蕴。因此，华兴会的秘密机关多数被破获，储藏的武器也被查抄，忠于清王朝的旧军更已严加戒备，到期无法调集起义军队。同时，马福益部下有一人在醴陵车站被捕，供出一切机密，并说出这次起

义的首领是长沙黄董午老师。于是长沙府、县衙门开始在省城搜捕革命党，并悬赏缉捕克强先生和刘霖生、宋遁初等。游得胜在驰赴长沙的中途被捕死难，马福益当时在湘潭脱险走广西，但在翌年仍被捕牺牲了。

克强先生于夏历九月二十五日才得到搜捕革命党的消息，当即由紫东园住宅来到龙黄溪（绶瑞）家。我和张溥泉正在龙家午餐，克强先生态度从容地同我们一起吃了饭，才告知这一消息。我马上回家派兄弟周震勋（华兴会会员，高等学堂体操教员）出外打听，才获悉马福益部下被捕的情形，急返龙家报告。克强先生这时才对龙黄溪说：“有一个重要的箱子，放在西长街长沙中学后进的一间房内，所有同志的全部名册和革命秘密计划都在里面，如果被抄去了，全体同志将被一网打尽。”当时情况紧急万分，黄溪表示愿意冒险去取。黄溪事前并未参与机密，也不是华兴会会员，这样见义勇为，令人感佩。第二天清早，黄溪伪装访友，坐着轿子前往长沙中学，打开克强先生所指的房间，找到了那个重要箱子，另外还发现房中有几支步枪，也一并放在轿内带回家中，交给了克强先生。箱中除了名册、计划之外，还有手枪和旗帜等重要物件，另有克强先生秘密通信和发布命令用的水晶图章一颗，克强先生特为检出赠给黄溪，留作纪念。其他重要文物概行烧毁，步枪、手枪则投入了龙宅池塘中。就在这天，克强先生的住宅被搜查了，但没有查得任何证据。龙宅门外虽有府、县衙门的捕差巡回侦探，但因当时的绅权特大，龙黄溪的父亲龙湛霖是退职的刑部侍郎，他们没有确实证据，不敢入内搜捕。因此克强先生得在龙宅安居了三天。这三天里，曹亚伯和圣公会的黄吉亭牧师为克强先生作好了出走准备。到第四天，克强先生坐一乘轿子，放下轿帘，作为龙宅女眷出外的样子，张溥泉扮作跟随，在轿后

步行保护，安全地到达了圣公会。克强先生在圣公会隐藏了一个多月，风声渐平，才由黄吉亭牧师亲自护送，偕同张溥泉搭乘日轮沅江丸，经汉口转轮到上海。

克强先生早在湖北武昌刘敬安同志开办日知书社的时候，就和我一道由曹亚伯介绍，认识了黄吉亭牧师，并由他介绍我们入教，以作掩护。黄吉亭虽然信仰宗教，充当牧师，但是一个忠于革命的同志。为了掩护秘密革命活动，日知书社最初就设在胭脂山他的教堂中。他到湖南来传教的另一个任务，是率领十多个通洋务的学生来湖南开办邮政局，这次营救克强先生脱险，邮局人员也多尽力相助。在“华兴公司”没有设立以前，克强先生曾经假圣公会开过几次重要的秘密会议，并寄存重要文件。这是因为自从义和团运动以后，清朝政府是不敢干涉教会行动，更不敢擅入教堂搜查捕人的。黄吉亭牧师利用教会帮助革命，掩护同志，不遗余力。同盟会成立时，他也加入了同盟会。两湖的革命同志，都认为他对于辛亥革命取得胜利所作的贡献是很大的。

克强先生和张溥泉到了上海以后，卒因万福华刺王之春案牵涉被捕，但经同志多方营救，复得脱险走日本。这时中山先生经过兴中会在惠州起义的失败以后，游历欧美东归，也在日本。于是在中山先生领导下，将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三个革命团体，合并组成革命同盟会，于一九〇五年八月开成立大会于东京，提出了革命政治纲领，决定团结全国革命同志，共同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国。又经过六年时间的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

（二）辛亥革命后的孙、黄关系

一九〇五年革命同盟会成立以后，黄克强先生在孙中山先生

的领导下，指挥了钦廉、镇南关和黄花岗各次的起义。这几次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革命的声势震撼了清朝政府，也显示了革命党人的英勇气概。此后辛亥武昌首义，获得了十七省的响应，终于推翻清廷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选举了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在这一系列艰苦斗争的过程中，孙、黄两先生的关系基本上是好的。但是，辛亥革命以后，在接着进行第二次革命的过程中，他们之间却曾一度发生过意见上的分歧。这主要表现在讨袁军事与整改党务两个问题上；尤其关于整改党务的问题，克强先生所持意见完全与中山先生相反，因此，当时外间对于孙、黄关系多滋猜议，反动派更是乘隙进行挑拨离间，大肆宣扬“孙黄分家”。其实，在革命主张上，黄克强先生终始服膺中山先生，矢忠民国，直至后来在策划护国军云南起义的时候，也能够中山先生领导之下精诚团结无间；在党务方面，克强先生也终能化除成见，服从中山先生的统一领导。现在就我个人记忆所及，将讨袁前后的一段经过事实，谈出一鳞半爪，以供了解孙黄两先生关系的参考。

一九一二年元旦，中山先生就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于南京，克强先生任陆军总长，统辖南方各省的革命军。南方的革命军在辛亥起义以后，数量上都有很大的增加。未几，南北和议达成，溥仪退位，中山先生以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作为让出政权的条件，向临时参议会辞职并荐袁世凯自代，从而奠定共和民国的基础。袁世凯原无拥护共和诚意，对于南方革命势力多所畏忌。他初则借口北方重镇，不能轻离南来，于同年三月十日在北京就任第二任临时大总统；继又借口南方军队骤增，糜饷过巨，南北既已统一，国民希整和平，倡议裁兵。克强先生当以既经让出政权，为了表示和平建设，也同意裁兵倡议，当即通令南方各省革命军严加裁汰。各省多败革命同志，起初对此举是不愿意的。但是，克强先

生坚持了他的意见，说是要想训练精兵，也必须先裁冗兵。各省同志一方面感到兵增饷绌，另方面恐怕加重人民负担，也就奉命执行了。裁兵之后，克强先生随即撤销南京留守府，随中山先生北上，着手筹划全国铁路建设事业。而袁世凯在各省进行裁兵的同时，急图将北洋势力伸入南方，于是进一步采取了阴谋措施，首先假军民分治之名，在各省设立民政长以削督军之权，继又增设护军使，直接受其指挥调遣。

一九一三年三月，袁世凯在上海暗杀了宋教仁。孙、黄两先生电召各省重要同志到上海开会商讨对策，我由湖南奉召参加。当时中山先生主张立即兴师讨袁。他认为宋案的发生，是袁世凯阴谋消灭国民党革命势力，以便帝制自为，全党同志对此极为悲愤，必须乘机立即调集各省兵力，一致声罪致讨；并认为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为时不久，对于各方面的阴谋布置还未妥贴，推翻较易，切不可延误时机。克强先生则认为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逆迹尚未昭著，南方的革命军又甫经裁汰，必须加以整备才能作战，因而主张稍缓用兵，以观其变。各省领兵同志多同意黄的意见。中山先生格于众议，只好从缓发动。因此，第一次讨袁会议的结果，仅议定进行全面布置的准备工作。

不久，袁世凯举借二千五百万镑的五国大借款，未提经国会参议院通过，就非法成立了。参议院议员多属国民党，对此极为愤慨，力促孙、黄两先生迅即讨袁。于是孙、黄两先生又召集重要同志到上海举行第二次讨袁会议，我又从北京前往参加。这时袁世凯的帝制阴谋已经完全暴露，全国舆论哗然，群情激愤，在此形势之下，国民党发动第二次革命，已再不容迟疑犹豫了。于是会议当即决定派出同志，分赴各省督促兴师讨袁。

关于湖北和江西两省，孙、黄决定派宁调元、熊越山两同志

前往。宁、熊二人本已买好船票，拟赴粤分别就三佛铁路督办和秘书长职务，奉命后临时将行李撤回，改搭江轮分赴赣、鄂进行讨袁活动。我则奉派回湘策划，得能调集革命军三旅，待命发动。三省布置粗定，一九一三年七月，李烈钧就在湖口揭起了讨袁义旗，湘军随即北上进入鄂境，柏文蔚以淮上军响应作战，克强先生亲赴南京督师。但是，这次长江用兵，上游方面由于湖北的黎元洪勾结袁世凯暗中作梗，虽有胡汉民、陈炯明、许崇智等在闽粤，熊克武、杨庶堪等在重庆先后响应，都因交通阻滞，应援不及。北方的陕西和山西又为北洋军所扼，势孤不能发动。袁世凯调集北洋重兵冯国璋、段芝贵、李纯等沿长江一带进行包围。经过两个月的鏖战，革命军不支挫败，各省取消独立。黎元洪奉袁旨杀害了宁调元、熊越山两同志。可是，他并没有达到保持地盘的目的，袁世凯立派段祺瑞率北洋重兵督鄂，迫使他只身入京，并派冯国璋率部分布闽浙。一时南方革命实力，大部趋于瓦解。

讨袁军事失败，孙、黄两先生和各省革命同志只得东渡日本，以图再举。中山先生总结失败经验，认为宋案发生后本应立即兴师讨袁，不应等到大借款成立以后方始举事，以致袁世凯得以从容布置，使革命军遭到失败。因此，中山先生对于克强先生颇有责难。关于党务方面。中山先生认为党内精神涣散，行动极不统一，必须恢复民国以前的精神面目而加以严格的整肃，因面决意另行筹建中华革命党；原来的国民党党员，志愿参加的，也必须各具誓约，服从党魁一人之统率，并须在誓约上用中指按上手模，以志矢忠。克强先生则认为当时亡命日本的国民党党员，都是参加讨袁且被通缉的，不应该在这时对他们严加整肃，而主张就原有基础发展反袁的其他革命分子，以便团结更多的力量共同奋斗。因此，他不同意中山先生另组中华革命党，并且表示他个人决不

参加。当时两人的态度都很坚决。中山先生虽然一时不能说服克强先生，但仍积极筹建中华革命党，而将协理职务仍然虚以待黄。当中山先生成立中华革命党的时候，各省重要同志二十余人一方面拒绝参加，另方面又发起成立欧事研究会，其中半数为湘籍。陈英士方面的人早就觊觎协理一席，欧事研究会的出现，更使他们振振有词了。当时还有少数叛徒已被袁世凯收买充当“袁探”，乘隙进行挑拨离间，尤其大肆宣扬“孙、黄分家”。克强先生因奔走革命多年，已染胃病，亟思易地疗养，乃向中山先生表明对革命事业始终不渝的态度，于一九一四年夏离日游美。中山先生对他仍然极表关怀，当电告美洲支部同志曹亚伯等为克强先生照料旅居方便。克强先生在美国各地发表演说和谈话，内容也仍然是宣传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足见孙、黄两先生虽然在意见上发生了一时的分歧，而在革命的根本主张上仍然是一致的。

克强先生离日赴美后，欧事研究会同人逐渐认识到革命组织不可分裂。覃振首先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并担任湖南支部长，主张解散欧事研究会。我原先因为不同意中山先生所要求的填写入党誓词和打手模的做法，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但我是始终反对党内派别分立的，此刻在覃振同志的力促下，也就按入党手续参加了。同时，李烈钧等也陆续办理了入党手续。中山先生大为嘉慰。从此一般革命同志皆能扫除成见，又复团结在中山先生统一领导之下，继续共同进行艰苦的革命战斗。关于孙、黄两先生间的意见分歧，我曾从中尽力斡旋，为双方解释，颇得嘉纳。关于党的名称问题，在讨袁军事将告结束的时候，我以国民党在国际国内影响较大，成员较多，也曾向中山先生建议：不如今后仍改称国民党，并为了区别于日本的国民党（日本的犬养毅等所组的政党也称国民党），可以冠上“中国”二字。当时中山先生亦予默

许。

当蔡松坡先生在云南揭举护国军讨袁义旗的时候，曾迭电促克强先生回国。迨克强先生由美回国，归途中在日勾留时，我即托赴日欢迎的同志带给他一封长信，把我斡旋他和中山先生关系的情形详告。克强先生得知中山先生对他完全谅解，急回上海。他行装甫卸，就晋谒中山先生。中山先生旋即回访克强先生。两人相见，握手言欢，极为亲切快慰。这时袁贼已死，讨袁军事结束，孙、黄两先生又在上海共同召集革命同志，筹商反对北洋军阀的策略，并命我赴北京在议会联络同志，进行分化北洋军阀的工作。不幸克强先生病势沉重，竟于一九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赍志以逝。中山先生顿感失去革命臂助，异常悲痛。党内同志组成了以中山先生为首的治丧委员会，翌年国葬克强先生于湖南岳麓山，典礼隆重。由此也可见孙、黄关系始终是建立在革命的友爱上面的，一时意见上的分歧，庸俗的猜议，固不能有所中伤，而奸人的乘隙挑拨离间更难施其狡技。我们对此应该有这种正确的认识。

（原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个别地方经作者作了订正）

回忆先君克强先生

黄 一 欧

先君克强先生逝世，忽忽已四十五年。忆自一九〇四年春，随先君就读长沙明德学堂，后来东渡日本，奔走海外，十余年中，聚少离多，回思往事，百感交集。现就我所知道的关于先君生活的片断材料，随笔述之。但因事隔多年，记忆模糊，错漏在所难免，希望得到指正。

应 县 考

先君曾对我谈过他青年时代的一些故事，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应县考。

先君十八岁那年，和姑父胡雨田以及同村的刘石介，一道往应县考。三个人进了考棚，凑巧都被分配在同一个字号。当时应试要做八股文，规定黎明前进场，即日交卷，不许继烛。这天，先君最先打完草稿，但是看了又看，很不满意，想另写一篇。而胡、刘两人正在搜索枯肠，还没有定稿。先君这篇文稿便被刘石介要去誊正，作为他的试卷。先君随后写好了第二篇，仍然觉得没有写好，结果又被胡雨田要去顶替了。最后先君聚精会神，写好第三篇，自己才感到比较满意。不料发榜时，胡、刘两人都是榜上有名，唯独先君名落孙山。先君落第回家，耽心先祖父不高兴，他不好意思地将先后三篇文稿都拿给先祖父看。祖父看过之

后，也认为第三篇胜过前两篇。这时，先君才解脱了心头的疙瘩。

一八九六年春天，先君又往应考。动身的前夕，亲友置酒预祝，先君不以为然，表示读书要求真学问，赴试仅仅是母命不可违而已。他写过一首《别母应试感怀》的诗，结句有云：“一第岂能酬我志，此行聊慰白头亲”，在应试期间，先祖父病重，继祖母特意瞒着先君，不使他知道，以便让他安心应考。这次，先君入县学为诸生，没有辜负老人家的期望。

华 兴 会

一九〇三年夏秋之间，先君由日本回到了长沙，在明德学堂教书，暗中联络同志，酝酿组织一个反抗清朝统治的革命团体。

这年十一月四日（阴历九月十六）是先君三十初度。一些具有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聚集在长沙西区保甲局巷彭渊恂（号希明，长沙人）家里，借为先君做生日酒的名义，办了两桌酒菜，举行秘密会议。到会的有彭渊恂、章士钊、周震鳞、张继、柳聘农、陈方度、徐佛苏、吴禄贞、陈天华、柳继忠、秦毓璠、翁巩等二十多人。会上，决定设立华兴会，公举先君为会长。但为避免清政府的注意，对外采用“华兴公司”的名义，以半公开的形式出现，并规定公司的任务是“兴办矿业”，集股一百万元，作为“开矿资本”，实际上是以“矿业”二字代“革命”，“入股”代“入会”，股票即是会员证。当时还提出了两句口号：“同心扑满，当面算清”。这两句口号，骤然听起来，象是谈的生意经，实则含有“扑灭满清”的意思。

华兴会成立后，先君又另外创立了两个小团体：一是同仇会，专为联络哥老会、策动会党参加起义的机构；一是黄汉会，专为运动军队参加起义的机构，陈天华、姚宏业、陈方度等人都做过

这方面的工作。

一九〇四年的出走

一九〇四年秋，先君谋于西太后“万寿”节在长沙起义，事泄失败，化装改名逃走。关于这一段史实，言人人殊，其说不一。那次出事，我是在场目击者之一，印象最深，虽然隔了五十多年，记忆犹新。

那年，我随先君在明德学堂小学乙班读书，陈果夫时名祖焘，与我同班。当时明德学堂师范班设在湘春街左文襄祠，中、小学设在西园周氏花园。我家则赁居紫东园，离左文襄祠仅二三百步。十月二十四日（阴历九月十六），为先君三十周岁。这天，他亲自下寒茵面招待三位进城的姑妈。大约是早上七点钟，西园龙宅差人持帖子来请先君去，先君正准备下面，没有去。过了半个多钟头，龙研仙先生第二次差人持帖子来催，先君说，面还没有下好，吃了面就去。先继祖母非常机警，她看到龙宅一连来了两次帖子，催得这么急，一定是有紧要的事，因此，催先君马上去，回来再吃面不迟。

先君刚刚坐轿出门，在门口就和来捕捉他的差役对面碰头了。差役见了，便问：“你是黄軫吗？”（先君原名軫，字廑午，后改字克强）先君情急智生，镇定地回答说：“我是来会黄軫的，他家里人说他到明德学堂去了，我要再到那里去找他。”于是差役跟着先君的轿子向西往左文襄祠走去。先君到了明德学堂下轿，佯称进去喊黄某出来，叫差役们在门口等候。他进校后，就由靠西边的金华祝老师住室旁的小侧门溜出，躲进了西园龙宅。差役在学堂门口久候不见有人出来，才知道上当了，只得将三个轿伕带走，把他们打得皮破血流。记得在一九一二年，曾有其中一个罗姓轿

伏的家属来过我家，先继祖母还送过他一笔钱。

我原来是在学堂里住宿的，那天因是先君生日，头一天晚上就回家了。我看到先君出门就碰到差役来捉他，心里惊慌万分，便飞跑到学堂里，告诉平日最接近的沈迪民老师。沈老师叫我待在他房里不要出去，他自己急忙走了出去，找人设法让先君脱险。

先君由明德学堂躲到西园龙宅内室后，又转移到吉祥巷圣公会黄吉亭处。十月二十六日深夜，先君化装海关人员，由黄吉亭、曹亚伯护送，乘一小船至靖港，搭轮船赴汉口转往上海。从圣公会临走前，黄吉亭嘱先君到达上海后来一电报，俾使此间友好知道他已经平安到达目的地，并为了保密起见，约定电报只署一“兴”字。先君到上海后，如约打了一个“兴”字电报给黄吉亭。

习 射 击

先君于一九〇四年起义失败出走后，有株连全家的危险。因此，一九〇五年秋天，我便同湘潭黄积成（后在士官学校习测量）一道去日本。到东京时，正是同盟会成立后不久，先君已往南洋去了。次年秋天，先君自南洋回到东京，住在牛込区东五轩町林馆。记得初到林馆的时候，先君就要我到相距不远的麹町区靖国神社去参观（那里陈列着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所夺得的战利品）。先君说：“你去看一看，就晓得我们国家成了个什么样子！”

每逢星期日，如无特殊事故，先君必定抽空前往麹町区神乐坂“武术会”参加射击比赛，有好几次是带着我一道去的。当时参与比赛的，除了各阶层的日本人之外，中国人去的也不少，辛亥革命后担任过国会议员的湘阴陈嘉会，就是经常和先君同去的一个。

“武术会”的竞赛，每次先分小组初赛，再由各小组优胜者进

行决赛。先君的射击技术很好，每射必中，弹无虚发，因此，名次总是很高，得的奖章不少。在他的书桌抽屉里，各式各样的奖章堆得满满的，有银质、铜质的，也有一种象景泰蓝一样的质料的。我有时趁先君外出未归，打开抽屉，拣出几枚佩在胸前，自鸣得意。有一次还瞒着先君，佩着奖章到附近的一家照相馆照了一张相片。

剪 辮

一九〇三年先君由日本回国，就剪掉了辮子。其时剪辮子的人并不多：有的人虽然剪了辮子，可是回国之后，又在头上装了一条假辮子，如柳聘农就是这样。

一九〇六年秋天，周震麟先生从国内来到东京，住在先君寓所。第二天，先君有事外出，临走时嘱我陪周先生往浴室洗澡。我因想到日本人素来看不起留辮子的中国人，尤其是小孩们见了就嘲骂，呼作“辮辮波子”，于是便怂恿周先生剪掉辮子再去洗澡，并且说做就做，拿了一把快剪，兴奋地给他把辮子剪掉了。先君回寓之后，看到周先生剪了辮子，非常惊诧，问明原委，才知道是我的恶作剧。先君把我叫到他的住室，厉声呵斥道：“你晓得吗，辮子要留都留不起，怎么可以随便剪掉？以后再不许胡闹！”

不久之后，谭人凤先生到东京，也拖着一条辮子。我因吸取前次的教训，就不敢轻举妄动了。谭老先生是为了奔走革命便于掩护而留着辮子的，一直到辛亥革命时才剪掉。

刘 道 一

一九〇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刘道一在长沙就义。他是同盟会会员中为革命牺牲的第一个人。噩耗传到东京，先君悲痛万状，

经久不能自己。

先君在长沙创立华兴会，刘道一是最先加入的一个。一九〇五年七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开筹备大会，他和先君一道宣誓加盟。刘道一每到一个地方，住上几个月，便学会了当地的方言；到日本后，日语、英语都说得很流利。同盟会的对外交涉，他曾尽了很大的力量。他生性好动，火气很大，容易和人家发生争论，有的人称他为“暴徒”。

一九〇六年，刘道一和蔡绍南、彭邦栋、成邦杰等被派回湖南，运动军队，重振会党。这年十二月，浏阳、醴陵起义，他是领导人之一，后来在衡山被岑春煊派人逮捕，严刑拷打，以所佩印章“锄非”二字罗织成罪。

刘道一被捕的消息，最先是刘揆一告诉先君的。当时他们曾从各方面设法营救，终归无效。先君听到刘道一被害的消息后，曾经不止一次地怀着无限沉痛的心情对别人谈过：“炳生（刘道一别号）平日锋芒太露，不稳重，人才难得，真是死得可惜！”

先君曾写过一首七律，哀悼刘道一的惨遭牺牲：

英雄无命哭刘郎，惨澹中原侠骨香。
我未吞胡兴汉业，君先悬首看吴荒。
啾啾赤子天何意，猎猎黄旗日有光。
眼底人才思国士，万方多难立苍茫。

在小石川区

一九一〇年，我随先君住在东京小石川区，同住在一起的，有林时埙、林觉民、何天炯、方汉成、李文甫以及方声洞之弟等十余人。当时大家的生活很艰苦，有一次连伙食费也筹不出来了，眼看就要断炊。先君拿出他的一件大礼服，要我去当了三十日元。

我们十多个人就靠着这笔钱吃了一个星期的红薯，才勉强度过难关。

典当的期限到了，我把大礼服赎了回来。在翻晒这件衣服的时候，出乎意料之外，从衣袋里发现一张一百日元的大钞。这张钞票是什么时候放在口袋里的，先君已经记不起了；我在送当时以及当铺中人收检时，都没有搜出来。忽然添了一笔意外之财，大家都很高兴。

先君对于衣着素来不大讲究，但求其整洁而已。即如这件大礼服，原是一九〇四年到东京后为了会见外宾之用而做的，到了辛亥革命以后，他的身体虽然发胖了，仍然穿着这件已经不合身的礼服去接待外宾。

广州三月二十九之役

一九一一年一月，先君由南洋到了香港，在跑马地三十五号设立统筹部，准备在广州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我于先君到香港后，也由日本来到香港。这次，我冒宫崎龙介之名，穿和服，讲日语，将由宫崎寅藏介绍向日本人仓地购买的驳壳枪五十枝、勃郎宁二十支和子弹一万余发，分装四口皮箱，运到香港交给了统筹部。

这年二月，党人龚敬夫从其亲戚张通典（湘乡人，时为广东巡警道衙门文案师爷）处，打听到巡警教练所有几名缺额可补。先君认为这是一个不可错过的好机会，因为教练所有学员四百余人，枪支二百支，如能掌握在我们手里，对起义会发生很大的作用。同时，派人进去，既可以联络同志，熟悉广州的街道和当地方言，又可以借巡警学员的合法身分作掩护，参与起义活动。于是，决定派我和陈方度、柳聘农、胡国梁四人同往应考。我们都

是湖南人，陈方度的年龄最大，我最小。在香港动身时，先君嘱咐我两桩事：一是要戒骄戒躁，谦虚待人，好好联络同志；二是要听从陈方度的调度，不要各搞一套。我们到达广州后，立即报名应考，结果都考取了。但一时找不到保人，到三月初才由张通典、周达夫（同盟会会员，湘阴人，时任广州西关警察署长）分别担保，入所受训。我们一面积极联络同志，一面等待发难的命令。当时全所学员四百多人，每支步枪有子弹五发。自温生才炸孚琦后，外间风声很紧，巡警道衙门怕学员出问题，把子弹都收去了。

阴历三月二十五日（阳历四月二十三日），先君由港到省，确定三月二十九日发难，并将原来决定的十路进攻计划，临时改为四路。其中陈炯明一路进攻巡警教练所，由我们作内应。二十九日午后二时许，我们四个人一起去见该所所长夏寿华（益阳人）。陈方度对夏谈了一番革命道理，并出示手枪（统筹部发给我们每人手枪一支）对夏寿华说：“我们就是革命党，今天下午五点半钟就要发难了。”夏寿华对我们说了一些同情革命的话，并坚留我们喝一杯酒。我们在夏寿华的签押房里吃了酒菜，就飞奔到小东营五号机关里。先君正在发号施令，整装待发，没有和我们多讲什么话，只交代陈方度赶快回去，待机行事。于是我们又匆忙跑回巡警教练所，等待陈炯明来攻，以便里应外合。不料陈炯明不按计划行事，初以全力守大南门，后则并大南门面不守，因而坐失良机，对整个起义影响很大。先君后来还几次对我谈到陈炯明这次的误事，感到十分愤恨。

这年秋天，先君追念死友，填了一阙《蝶恋花》词。全文如下：

转眼黄花看发处，为嘱西风，暂把香笼住。待酿满枝消艳露，和风吹上无情墓。回首羊城三月暮，血肉纷飞，气直

吞狂虏。事败垂成原鼠子，英雄地下长无语。

辛亥秋，哭黄花岗诸烈士。调寄《蝶恋花》。

黄 兴

八 字 家 书

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首义，中外震惊。先君由香港打电报到东京，要我急速去港。当我赶到香港时，先君已经动身去上海，胡汉民坚留我和其他一部分同志在香港，等待广州发难。后因陈其美从上海连来两次急电，说需要人力支援。于是胡汉民叫我和赵光（赵声之弟）、洪承点等七八人速往上海。到上海后，才知道先君刚赴武汉督师。十一月四日，上海方面攻下了制造局，洪承点等即着手组织军队，以原第九镇一部分官兵、上海参与起义的警察以及巡防营士兵为基础，组成沪军先锋队，并推洪承点和我担任正、副司令。

这时，武汉战事正在剧烈进行中。先君托张竹君（女，上海南市医院院长，武昌起义后组织红十字会救护队去汉阳前线，这时回上海采购药品）带信给我，要我赶快到武汉去。我因沪军刚刚组成，又须往镇江、杭州等地联络，不能抽身前往。随后不久，先君从汉阳前线寄了一封信给我。拆开一看，仅仅八个大字：“一欧爱儿，努力杀贼”。这是先君因为我不能到他身边去，在军书旁午之际，特地写来勉励我的。

就在接到这封信之后不久，汉阳战事危急。为了策应汉阳战局，牵制清军兵力，我们率领沪军，会同浙、苏、吴各处民军，陆续开到镇江，会合当地民军，推第九镇统制徐绍桢为联军总司令，协力围攻南京。十二月二日，南京光复。

“南 北 一 家”

一九一二年六月十四日，南京留守府撤销，先君解职，退居上海。这年秋天，袁世凯邀请中山先生和先君入京会谈。先君本来是不准备去的，中山先生到了北京以后，来电极力敦劝，先君才于九月十一日入京，待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即行返沪。

据随先君入京的秘书陈凤光告我：先君至京时，袁世凯表面上殷勤接待，礼遇甚优，并请中山先生和先君提出组阁人选，而暗地则密派心腹随时侦察先君的行动。当时京中人士到处开会欢迎，先君莅会演说，宣传三民主义。有一次，湖北旅京同乡在湖北会馆开欢迎会，先君演说之后，会馆负责人请他题字。先君不假思索，立即写了“南北一家”四个大字。斯时斯地，题这四个字，是十分发人深省的。

拒绝袁世凯的笼络

一九一二年九月七日，袁世凯授先君为陆军上将；同时授为陆军上将的，还有黎元洪和段祺瑞。这年双十节，又授先君勋一位。

授勋令公布后不久，袁世凯派专使到上海同孚路先君寓所，送来陆军上将特任状、授勋令和勋章，另外还有几件礼物和两匹英国种枣骝玉点马，先君当时勉强收下了。来人去后，我因为好奇，戏将勋章佩在胸前，左右顾盼。正在这个时候，先君上楼来了，我感到非常尴尬。先君严肃地对我说：“这有什么用！你知道吗，这是袁世凯的笼络手段，可是我不会上当的。”接着又说：“这些东西都要退回去，把马留下来。”我问先君：“为什么要留马？”他说：“因为将来还要我打仗的。”他随即将特任状、授勋令、勋章以

及所有礼物都退回去了，只留下两匹马。每天清晨，先君要我骑着马到寓所对面的打铁浜骑马道去调教，他自己则站在阳台上观看。

一九一六年双十节，北京政府又授先君以勋一位，先君也坚决拒绝了。

“卅九年知四十非”

先君向来不喜欢人家做寿送礼，作无谓的应酬。他自己的生日，总是随随便便地度过的。一九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为先君三十九岁初度，也未宴请任何宾客。他于由沪返湘途中，在“楚同”兵舰上曾作了一首生日感怀诗：

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风歌好不如归。

惊人事业随流水，爱我园林想落晖。

入夜鱼龙都寂寂，故山猿鹤正依依。

苍茫独立无端感，时有清风振我衣。

这首诗的原稿，连同先君使用过的一支猎枪和其他几件遗墨、遗物，我已于一九五三年捐献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原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个别地方经作者作了订正）

追忆蔡松坡先生

唐才质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冬，湖南时务学堂成立，余与松坡同时考入，始识松坡。当时同学中，在我脑中印象最深者，为虎村(李炳寰字虎村，庚子武汉起义殉国)、松坡二人。虎村年长于余，且同住一宿舍，意气投合，遂换帖为兄弟。松坡在同班年龄最小，体质亦复文弱，初不为人重视，然而言论见解，有独到之处，乃知年少好学，根柢甚为深厚也。

松坡原名艮寅(后来投考日本士官学校，乃改名锜)，湖南邵阳人，松坡其字也。生而颖异，年十一，补弟子员。母舅樊锥，博学多能，在邑中有才名；松坡请从之游，学业益有进步。丁酉冬，松坡应考时务学堂，名列第三；在堂每月月考，皆居前列。英气蓬勃，同学皆敬慕之。

松坡在堂，所居与余辈斋舍接近。课余之暇，必过余言学论政。谈到当前政治败坏，声情激越，决心贡献自己一切力量，以挽救国难。

按察使黄公度(名遵宪)与时务学堂同学联系密切，常约吾辈往官舍谈话，娓娓不倦，态度和蔼，无官场习气。公度在湘仅一年，旋以戊戌政变去官，养痾海上。翌年即归嘉应故里。其己亥怀人诗即是时作，内有怀李炳寰、蔡艮寅、唐才质云：“谬种千年兔园册，此中没埋几英豪。国方年少吾将老，青眼高政望尔曹。”

其期望与勸勉吾辈为国致力，情意至为殷切。

戊戌八月政变，新政尽废，时务学堂亦有趋于解体之势，学生多愤而退学。余与松坡、静生（范源濂字）亦与焉。吾侪商榷之结果，决定继续求学，以求深造。顾是时国内研究实学之学校，寥若晨星。武昌虽有两湖书院，院内事务，多半为旧派掌握。政变之后，对于湖南时务学堂之退学生，拒不接纳。南京亦无学校。于是吾侪不得不以上海为目的地。己亥夏五月，松坡与余辈同考入上海南洋公学。时值暑假，幸前时务学堂英文总教习李维格先生，在该校任教，特许先入宿舍。七月，梁启超自日本来函相招，又得家兄才常先生资助，遂东渡。

松坡与余到日本后，其他时务学堂学生，继续冒危险经上海而抵东京者，并余等共为十一人。梁在东京小石川久坚町，租赁三间房屋，让吾辈居住，为投考日校作准备。此是时务学堂解散以后，余与松坡在上海、东京二处，又得继续聚处求学，约为一年左右。物质生活方面，虽然甚苦，但精神方面，异常愉快。

庚子（1900年）春间，家兄才常先生决意在武汉起义，军事部署，略已就绪。当日时务学堂同学来到东京十一人中，除松坡愿留日本学习陆军，静生愿研究学术，致身教育以外，余皆回国参与其事。同学既行之后，松坡心不自安，旋亦毅然变计，只身回沪转汉，参与武汉起义。才常先生以松坡在同学中年龄最幼，暂不欲其担任艰巨以误学业，即函介赴湘见黄忠浩，面商机要，要求黄在武汉发动之后，同时在湘起义，以相策应。黄原在湘训练新军，此时正奉令移鄂。黄认为才常先生所谋，目的虽对，方法不行。结果使无数青年志士，白白牺牲，未免可惜。于是挽留松坡商论数日，未即遣行。未几自立军起义失数，松坡尚留黄寓，因而得免于难。黄仍送松坡赴日留学，以图上进。

松坡第二次到日本后，时时以学习陆军为念。梁启超笑之曰：“汝以文弱书生，似难担当军事之重任。”松坡答曰：“只须先生为我想方法，得学陆军，将来不做一个有名之军人，不算先生之门生。”松坡一生长处，意志坚定，日后事业，即基于此。当年到日本学陆军者，非由政府派遣不可。其时自费陆军学生，只有松坡、百里（蒋方震字）二人，但不久仍补官费矣。蔡、蒋二君，是士官学校第三期学生，毕业成绩，皆极优良。在日本百余学生之中，百里名列第一，松坡大致第五。松坡毕业回国，先到广西，开办讲武堂；旋到云南，初任标统，渐次升至协统，辛亥革命时期，成为云南新军唯一之首领。武昌反正，云南响应，西南局面，于是确定，皆松坡之力也。

庚子自立军武汉起义，吾友赵君曰生辅助何君铁笛（名来保）担任常德发难之责。事败，铁笛殉国，曰生走免。后来曰生蛰居日本横滨，松坡自江戸来，与共食宿者逾月，同作海水浴以为常事。曰生昔尝告我曰：“余与松坡居横滨，日赴海边沐浴，以为一门功课。松坡曰：‘凡作海水浴者，原为锻炼身体，非仅为水上游乐也。须以烈日晒之，海水浸之，时晒时浸，日久不息。久之，皮肤焦黑，便成铜筋铁骨矣。’约余日日赴海演习之，余不能耐，或作或辍，而松坡则未尝一日间断也”。

庚子起义失败，吾辈各有所图，遂皆离散。余与松坡居住异地，虽信使常通，而相见甚稀。余在领事撤职之后，漫游印尼各地，考察侨民情况，经过港、澳，略有流连。迨丙辰冬间，归抵北京，惊闻松坡为国劳瘁，已与吾辈永诀矣。丁巳（1917年）四月，举行国葬，余代表内务部同仁回湘，参与国葬典礼。每一追念往昔同学时言学论政、盘桓朝夕情景，为之怆然！

（湖南省文史研究馆供稿）

辛亥湖南光复的片断回忆

阎幼甫（鸿飞）

一、革命党人的各种组织和秘密开会地点

辛亥革命以前，革命党人组织了许多大小团体，各自为战，汇合成流。湖南方面，除了华兴会这个众所周知的组织以外，单就笔者个人参加或联系过的，就有下列十几个单位：

体育社：是易宗羲、阎鸿翥、阎鸿飞、文经纬、王猷、焦达峰、杨世杰、蒋名荪等所组织的；设在长沙太平街贾太傅祠，招收学生四十多人，以培养体育人才为名，实际是革命党训练军事干部的一个组织。

南薰社：是谭人凤、曾杰、李治、阎鸿飞、文斐、何陶等所组织的；设在长沙浏阳门东门捷径，革命党人曾在此制造炸弹。

卷施社：是吴孔铎、谢介僧、刘崧衡、洪荣圻、王伯存、文经纬等所组织的；设在长沙水风井胡家花园，悬有富训商业学堂筹备处木牌以为掩护。

图强社：是文斐、洪荣圻、黄柯陔、李德纯等所组织的；设在长沙府围后。

观海学会：是龙璋、文斐、周震鳞、黄昌溶、吴作霖等所组织的，成员多数为留日学生；设在长沙北门西园。

积健社：是陈作新、易堂龄、李郭俦等所组织的；设在长沙培元桥。

嚶鸣社：是成邦杰、阎鸿翥、杨守箴、袁天锡、袁世铎、罗杰、洪兰生等所组织的；设在长沙路边井定中栈。

南社分社：是傅熊湘、阳光鯤等所组织的；设在长沙西园。

日新社：是易定超、王鑫涛、李金山、朱先杰、杨玉生、刘芝德等所组织的；设在长沙小吴门外军路侧，悬挂日新成衣社招牌，备有缝纫机两架，集结了多位成衣工人，并且联络了部分军属妇女，力量充实，业务发达。湖南光复时所用十八星军旗和号召旗^①都是由日新社日夜秘密赶制的。

四正社：是焦达峰、焦达人、彭友生等所组织的，设在长沙太平街孚嘉巷。

兰芷书局：是杨任、王炎等所组织的，设在长沙玉泉街；为西路革命党人通讯的总机关。

义记灯铺：是李继芳、孙昆伯、黄昌濬等所组织的；设在长沙藩城堤。制造炸弹所需的的弹壳，就是由义记承办，分配到四城各灯铺加工制作的。

集成矿务公司：是谢介僧、刘崧衡、刘观海、罗毅等所组织的；设在长沙织机巷。

辛亥革命前、同盟会的会员散布各地，长江流域各省并没有同盟会的支部组织。当时在湖南的同盟会会员，多由三数个同志组织一个团体。如前述体育社、南薰社、卷施社、观海学会等组织都有几个会员在内。同盟会在辛亥革命酝酿时期，确曾起了核

^① 号召旗，亦称“标旗”，就是标语旗。清末成立新军，由北京陆军部颁发每标军旗一面。标旗在军人心目中是最尊贵的标识，所以革命党也叫号召旗为标旗。号召旗是红地黄字沿以黑边。旗上所标为：“兴汉灭满”、“建立共和”、“自由平等”。这些标语，都是由同盟会的战时统筹部制订发到各地盟员手中，由盟员在发难时交给各革命团体应用。

心作用。当然，其他革命组织也都起过大小不同的作用。只因他们“退藏于密”，不为外人所知；革命告成，民国建立时，那些志士仁人，不谈往事，既不居功，也不要名，更不做官；以致临时稽勋局局长冯自由在稽勋工作中，查得一些确有功勋事迹的人名而找不到酬勋的人。

革命党人因准备发难，开过几次重要会议。会议的地点，都是临时决定的，也没有固定的召集人，更没有书面的开会通知；间有书面通知，都是用的隐语。如：“请于某时到某地赶道场”，那时的隐语：称开会为“赶道场”，称宣传为“上赌场”。个中人一看，自然明白。从一九一一（辛亥）年二月起，开过会的地方有：北门外开福寺、岳麓山云麓宫、杨家山启新小学、沙湖桥杨氏宗祠、紫荆街福寿楼等处。各次开会都因警戒严密，大都平安无事。只有一次在福寿楼开会，因地点在城市中心，外面风声又大，被当局侦得开会消息，比较危险。但当军警开到之时，会议已经结束，只有几个未散去的人在喝茶，军警侧目而视，不取动手捕拿。上述这些革命党人开过会的地方，经过半世纪的时间，沧桑变换，已是遗迹难寻了。

二、革命党人的宣传鼓动工作

自萍、浏、醴起事失败以后，革命党人的情绪更加激昂，宣传鼓动工作，也更积极。各地报纸杂志，由于官厅监督綦严，不能登载激烈的言论。革命的宣传，就不能不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时值四川、湖南、湖北、广东等省反对铁路收归国有的群众运动闹得起劲，革命党人便紧密结合各种爱国运动进行宣传。开演讲会、发传单是极普通的做法，但也有一些动人的场面。记得有一张用“湖南保路同志会”的名义发布的传单（保路同志会

是四川的一个组织。这份传单是卷施社的同志假借名义发的)，内容很简单，只有几句话：“请问：你是不是中国人？你有无良心？你愿当亡国奴么？请加入救国运动。”寥寥二十几个字的白话文，是清末少见的新文体，简明扼要，很能打动人心。散发传单的人，有时遇到警察也发给他们几张。警察读了传单，也有受感动的。

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湖南，每天发传单的络绎不绝。有人说：看传单比看报好。因为传单内容很多是报道武昌起义的消息，是报纸上所看不到的。军警当局非常恐慌，他们出了许多维持治安的告示，对革命党人提出了严厉的警告：“倘有乱党敢于聚众煽惑，不服制止，准其格杀勿论。”可是革命党人并不怕这些恐吓，还是满街散发传单，随地讲演。每次讲演的时候，只要讲演的人一开口，不到一分钟就聚集了一大群听众。可怜那些岗警，忙着做驱散工作，东头的人驱散了，西头又聚集了许多人，赶走了北面的讲演者，南面又出现了传单，累得满头大汗，不知如何是好。那些宣传者听任警察指着“格杀勿论”的告示，向他们恫吓，也不理睬。我曾看见有一个警察对一位宣传者央求道：“老爷们！请你们走远一些，不要使我们为难。”当日警察的尴尬处境，于此可见。

较大规模的讲演，常常是在各庙宇中的戏台坪举行。当演戏么锣的时候，忽然走出一个人来对观众大声地说：“请慢走一步！现在有几句话向大家报告一下。”接着就看形势、看对象，趁机宣传一阵。记得辛亥年阴历二月十七的晚上，长沙自治公所举办一次讲演会，地点在玉泉山戏台坪。事前曾由自治公所发出通知，所以那晚到了好几百听众，加上到庙里看热闹的人，把整个戏台坪挤满了。在台上讲演的人有何雨农、阎鸿飞、文经纬、曹政典诸位。讲的内容是揭露清政府将筑路权收归国有——实际就是准

备出卖给外国人的阴谋和罪状。说到激昂沉痛处，台下掌声雷动，听众中有许多人泪如雨下。忽然群众中有一个人带着呜咽的声音跳起来高呼：“我们不当亡国奴，我们愿同你们去和卖国贼拚命。”接着又有许多群众自发地高喊着：“我们决不当亡国奴！”当讲演正在进行的时候，巡警道和长沙县、长沙府的军警已经手持灯笼挤在玉泉山东西两门，准备拿人。曹政典看到情况严重，便大声对正在讲演的阎鸿飞说：“伯外公病危，一舅派人来找我们说话。”老阎向东西门一望，心中也已有数，急忙说几句收束的话，退到休息座上。曹政典向阎、文两位说：“东西门不好走，我们往台下中门走试试看。”三人一个接一个地走向中门。中门虽合门，却没有上锁，也无人把守。大家喜出望外，出门往息息相关（即现在的息相街）急奔，回头不见追兵，不禁相视而笑，庆幸脱险。后来何雨农对姜咏洪说：“玉泉山向由东西两侧出入，每年只有二月十八九日、六月十八九日、九月十八九日才开中门。那天曾开中门打扫中门内外，不曾上锁，所以阎、曹诸人竟得以履险如夷。革命党人每因宣传，被官厅追捕，所以党人称赴讲演会为“上赌场”，就是说可赢可输。”

三、革命党人的兵器来源和策反工作

革命党准备用于发难的兵器，只有手枪、炸弹、马刀、梭镖、短剑（即匕首，俗称“小宝”）和鸟枪；为数很少的步枪是向逃兵购得，埋藏在僻处，以待大举时，再起出应用。一九〇六年萍、浏、醴起事时，同盟会托日本人运过三批步枪，只有一批六十枝的平安到达，其余两批都在中途被军警查出没收，所以决定不再运进步枪。但是步枪为作战的主要兵器，是少不得的。战时统筹部指示：惟有运动军队反正，就连人带枪都有了。以后我们主要

就是用这个方法来扩充革命的武装力量的。

手枪是日本造的“六子连”，由宋教仁在上海购买，交日商轮船公司代运来长。辛亥五月运到的二百枝，是由谭人凤随船运到长沙，起存在南门外碧湘街日本人所设货栈内，直等到发难的前一夜，才由各同志持条起出。

炸弹是自造的。由李洽、黄昌濬、阎鸿飞、曾杰四人制造，所用药品，由谭人凤在上海购回一些，其余是阎鸿飞在长沙南门商务印书馆购得的。弹壳是黄昌濬在藩城堤义记灯铺定制，由义记分配到各灯铺在两天两夜内赶制出来的。制造场所就在东门捷径李洽所住的房子里。制造炸弹是件很危险的事，在制造过程中，李洽伤了左掌，阎鸿飞伤了左眼，没有象湖北的孙武那样炸成了血人、几乎送命，已算幸事。

马刀、梭镖、短剑是革命党在黄花市、焦溪岭、嵩山寺等处设立铁铺，招收铁匠制作的。这些开铁铺的老板和伙计，都是四正社社员，所以没有走漏风声。

为了瓦解敌军、扩大革命武装、争取更多的同盟军，革命党人在新军和巡防营中，进行了许多工作。辛亥革命时，湖南新军只有二十五混成协一协，下辖步兵两标（四十九标和五十标）、炮兵一营、骑兵一营、工兵一营（缺一队）、辎重兵一营（缺一队）。这些新军都是革命党联络的对象。新军中的上级和中级军官几乎都是反革命和不革命的，他们脑海中充满了升官发财的念头。象蔡锷、朱瑞、吴禄贞、张绍曾、赵声、蓝天蔚等富有革命思想，又敢于斗争的人，在湖南新军的中上级将领中，可以说没有一个比得上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中的前进分子很多。他们很想看一些革命书刊，可是无法获得。革命党人只好向上海订购《民呼报》和《天铎报》，转送到各营队去，充作他们的精神食粮。负有联络新

军任务的同志，想尽方法和新军联络。有几次得到教会里一位黄牧师的支援，由上海和汉口请来善于讲演的名人朱少屏、曹亚伯诸人，在史家巷讲演。所讲的多是国外新闻，影射中国的黑暗，许多言论是带有强烈刺激性的。讲演后有时放映幻灯片。在讲演会举行以前，由联络人员到新军中去进行联络，秘密赠给入场券。每次到会的十之七八为下级军官和弁目。在几次讲演会中，负有联络责任的同志，展开了交朋友的活动，结识的人，逐渐增多。从此，革命的引线和军队接上了头。在杨家山小学开联合会时，新军的下级军官仅到几个人，而正、副目则到了三四十人。这些到会的弁目，后来都成了革命军中的标统或管带（相当团营长）。

巡防营是当时一种旧式军队。可是他们的兵器多数已换得汉阳兵工厂制造的七九新式步枪；杂牌洋枪也有，虽然子弹口径不同，但每杆枪都是能够用于作战的。巡防营里的中下级军官，多数是加入了会党的。焦达峰所领导的四正社，早在巡防营中扎下了根子。巡防营军官赵春霆、刘玉堂、袁国瑞、甘兴典都和焦达峰有关系。文斐也是爱和军人拉交情的，曾经几次请客为焦达峰介绍，更使革命党与巡防营中级军官之间获得了一种默契。湖南光复那一天，革命党组织了联络队和慰劳队向巡防营送臂章。先由联络队（自己右臂带有白布臂章）拿着白布臂章，见巡防营的官兵，立即笑脸上前，说一声：“总爷！辛苦了！”将臂章替他们带上。这些旧军人都喜笑颜开地接受了臂章的赠与。此时，联络队和军人互相鼓掌志庆，群众也鼓掌祝贺，有些店铺自发地燃放编爆，热烈庆祝。这样，长沙的巡防营就迅速转到革命方面来了。

四、湘鄂义军的进军和岳州的光复

辛亥年三月武昌会议，两湖革命党人原约定在是年八月，两

湖同时发难。一旦确定了起事日期，则在三天以前，用密电互相联系。当时商定了一套隐语和密码：以“指示机宜莫久使故国衣冠沦于夷狄，挥戈举义快团结中原豪杰还我河山”三十个字为初一至三十日的代替字，以“祖父故”三字代替“发难”，以“祖母故”代替“机关被破获”。如电报上说“祖父故促义弟归”，同志们一看，就知道是“十九日发难”，若说“祖母故促举弟归”，就是说“革命机关于十八被破获”。此外还有一些隐语和密码，暂不多述。辛亥八月十九日（十月十日），武昌发难，是因为彭楚藩、杨宏胜、刘尧徽三位同志被杀而激成的，这个日期并不是两湖事前商定的发难日期。焦达峰、阎鸿飞、杨任都是参加武昌会议的人，曾和孙武、蒋翊武约好，不管谁先发难，发难的省得到成功，则未及发难的省必须于十天之内发难，作为支援。湖南发难比湖北迟了十二天，并不是湖南的革命党人失约，而是因为准备工作来不及。当时革命党人的焦急心情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八月廿七夜，长沙的革命党人临时在西园吴作霖家中开会，决定由阎鸿飞去武昌和湖北方面联系，报告湖南发难准备的情况，并向湖北要求派兵支援。阎鸿飞乘日本商轮去武昌。湖北军政府即决定调派李树芝一协革命军为援湘义军，由湘鄂义军总司令阎鸿飞指挥；（在武昌商谈时对阎鸿飞的名义，初拟称“援湘义军总司令”，蒋翊武主张改为“湘鄂义军”，因为部队进入湖南作战，便成了两省的事，所以出发时改为湘鄂义军总司令。）并派高级参谋向海潜，王自民随军参赞，另调吉星、立中、翔鸥等四条小火轮为军运之用。九月初一，湘鄂义军在嘉鱼收编了两营湖北巡防营。初三光复岳州。岳州的光复，是传檄而定的。记得当日湘鄂义军总司令对岳州的檄文，是用一幅一丈二尺长的白竹布写的，叠成折式，上面有隶书“露布”二字，很象西藏的哈达。揭开“露布”，里面写的是：

“中华民国军政府湘鄂义军总司令阎为传檄事：痛昔朱明坠绪，衣冠沦于犬羊；清寇入关，岭峤遭其蜂蝥。浊乱华夏，箝制军民。满贼为灾，普天同病。凡所侵攻之地，必恣荼毒之威。须知天道好还，况复人心思汉。本总司令率师伐罪，除暴安民；岂觅尔公尔侯，只期保种保国。尔驻岳文武官员同是汉人，自应同申敌忾；只要易帜易心，即是同袍同泽。共襄此时之义举，以待他日之策勋。檄到如律令！”未署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初二檄。檄文是墨笔楷书，字如碗大。在“露布”上盖有四寸见方的朱印。由李树芝统领随带执事官、马弁共十人向吴镇台、卓道台传檄。因为李统领曾在岳州驻防，对于岳州的军政各方人员都很熟识，所以派他担负这个任务。先是，岳州在九月初一已经得到长沙光复的消息，官吏都很恐慌；忽接到阎总司令的檄文，卓道台、吴镇台、岳州府知府和巴陵县知县开会商量，决定欢迎革命军入城。九月初三日，岳州城高悬十八星革命军旗帜。岳州就这样和平光复了。

岳州光复后，地方新旧势力的代表人物都请求阎总司令以岳州军政府名义就任岳州都督。阎说：“岳州无设立军政府的规定，都督名义更不可随便使用。我可派陈标统暂驻岳州，和地方当局共同维持治安，静待焦都督的命令。”阎鸿飞布署完毕，随即乘吉星轮直驶长沙。

五、长沙光复，黄忠浩伏诛

武昌起义后第三天，湖北派蓝综、庞光志到长沙，携有蒋翊武的介绍信。他们先到体育社找焦达峰、阎鸿飞两人。那天，焦不在长沙，即由阎鸿飞陪同去会南薰社、卷施社、图强社和积健社的同志；又介绍他们会见谘议局的左学谦和常治。左学谦请了

一些谘议局的同事作陪，在他家为蓝、庞接风。席间谈了很多武昌起义的情况，对谘议局的人们转向革命，起了促进作用。蓝、庞到长沙的第二天，由安定超、李金山、刘芝德诸同志约了一些军队中的日新社的积极分子在杨家山小学开会，听湖北代表的报告。蓝、庞是两位青年，把武昌起义时各方同志的慷慨激昂情形，说得淋漓尽致，使到会的同志们听了，极其感动，个个磨拳擦掌，跃跃欲试。

九月初一长沙发难，是经过缜密的筹划和扎实的准备的。革命党人在发难的前一夜，都紧张兴奋得终夜不能合眼。初一天刚黎明，就有各部革命力量汇集在预先指定的地点，齐向总目标——抚台衙门前进。没有经过大的战斗，就占领了抚台衙门。

惟有占领军械局的任务，比较艰巨。这个任务是由阎鸿燾、成邦杰、吴作霖、曾杰、常治、王猷、杨世杰、蒋名荪等五十多位同志承担的。当革命党人由两路并进，到达军械局附近时，就有事先派好的手缠臂章的联络队队员，徒手走入局门，要会卫队官长，并将腋下所夹的白臂章赠送卫队，请他们反正。卫队长还在犹豫，忽听得局左局右有很多人在喊：“快些缴械！”接着就发出了轰隆的炸弹声和达达的手枪声。顿时烟雾弥漫，人声鼎沸，接连喊着：“缴枪！缴枪！”卫队长慌了，不敢抵抗，又无处逃生，只喊：“莫再进攻，免得起火，我们投降。”联络员很镇静地说：“你们把枪架好，退入卫兵室休息待命，我替你们保险。”随即将袖子一抖，扯出红白两镶的联络旗一挥，大喊一声：“得！”，只见进攻的手枪队应一声“胜！”，（“得胜”是当日的口令。）就涌入军械局，先收下搭架的步枪，由手缠白臂章的革命党人换用步枪接替守卫。这时，革命党已请出原来的卫兵队先在局前整队，随后由联络员请他们到附近的馆子吃点心。这是出发前一夜就商议好

了的做法，这时，象演电影一样地一幕一幕顺次序演完了。占领军械局成功了。除负有警卫军械局责任的同志而外，阎鸿禧、成邦杰等又率队伍向抚台衙门去会师。

此时，由小吴门、浏阳门进城的队伍，已达到抚署的东辕门，由北门进城的队伍也同时达到西辕门，足见联系工作做得很好。预先拟定的常治等四位代表进入衙门，要见抚台余诚格。相见后，代表对余说：“请抚台赞助革命。”余诚格说：“我从不同你们为难，至于如何赞助革命，还得等我想一想。”随呼他的武巡捕拿出早已预备好的白布，亲笔书一“汉”字，命手下人悬挂在抚署的桅杆上。吩咐快预备点心，请四位代表用茶。他自己便先告退，进内宅去了。四代表随即出衙，走到“护国佑民”牌楼前面，和革命同志相见。大家见抚署挂了顺风旗，知道已不必动武，可免流血，欢声雷动。老百姓原来耽心糜烂地方，此时看到抚台衙门挂了降旗，就纷纷燃放鞭炮志庆。不多时，全市一片鞭炮声，大家都说：“革命成功了。”

余诚格退入内室，即匆忙带着家眷在后墙打开一个窰口，逃往小西门外某洋行。革命党明知余已逃走，也未追赶。革命党原有命令：对于抚台衙门的人，只许出，不许进。余诚格的眷属还没有走尽的当儿，革命党已有一队人把守窰口，执行许出不许入的命令。起初，任其携走行李，后来有些差人乱搬东西外出，才禁止随带物件。抚署卫兵多人都换便衣，陆续走出。抚署渐渐寂静得象座古庙一样。这就是清朝在湖南的最高统治者所演出的最终一幕。

巡防营统领黄忠浩，是起义时敌方高级人员中唯一被杀一个人。湖南首义前夕，宪政派的人原想推举黄忠浩为总司令，曾经龙璋带同文斐、吴作霖等人去会黄忠浩，文斐向黄进言，只要

他反正，革命党愿推他为总司令。黄忠浩不独不接受文斐的好意，反而一本正经地教训了文斐一顿。吴作霖看到话不投机，就对黄忠浩说：“人各有志，不必相强，你不参加革命，是你的自由，还望莫和我们为难。我们告辞了。”第二天湖南革命爆发了，革命军由小吴门进城，正遇黄忠浩亲自出外视察变动，调遣队伍。革命军并不认识黄忠浩，忽然黄的马弁胡某大呼：“黄统领在这里！”随即一刀枭了黄忠浩的头。原来黄忠浩的人，早已加入革命党的四正社。事后，谭延闿曾说过，黄忠浩的马弁杀他，是为哥哥报仇，因为胡某的哥哥是被黄忠浩杀掉的。黄忠浩这个以曾国藩自比的大汉奸，如果当时能够冷静地想一想，不拿出老前辈的牌子，对文斐诸人发一阵湖南人的所谓“朽气”，表现得灵活一些，则长沙光复的那天，决不会是“人头落地”，而是“革命功臣”，都督、总司令或镇统的头衔都可能戴上了。某日，龙璋向友人追述往事，他说黄忠浩和他来往甚密，黄曾表示可以在湖南自由行动，他才同文斐和吴作霖去找黄谈话。结果却变了卦，弄得不欢而散。黄当晚曾亲到龙璋家对龙说：“我是会看相的，相人的有作为和没有作为，甚准；今天同你一路来找我的文、吴诸人，品貌平常，气色灰暗，我看出他们是决不能成大事的。”黄并对龙璋进忠告说：“您也要谨慎一点。”龙璋在说这故事时，还笑着说：“我是不懂相术的，如果晓得黄泽生（黄忠浩字）第二天就要杀头，我就会拿出一面镜子，要他自己照一照，考验他对自己的看法如何。”

六、推举都督的经过

起义前，大家讨论都督的人选。阎鸿飞说：“在武昌联席会议时，本来已经推定焦达峰为都督。”但焦自认年纪太轻，要推谭人凤担任。湖南的各革命组织，对于谭人凤多不认识，仍主张推焦

达峰。九月初一在全城鞭炮大作，庆祝革命成功的时候，大家齐集在諮议局开会，讨论推举军政府的负责人。陈作新向焦达峰说：“你当都督，我来当副都督。”焦达峰说：“原议没有副都督的设置，我让你当都督就是。”这是在会场公开的言论。焦达峰的人缘比陈作新好，当场就有人大喊：“不能让，不能让。”黄钊和陈作新素来相好，就说：“还是设正副两都督的好。”便向常治说：“请你宣布一下。”常治的嗓音极高，就唱道：“公推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大家一阵掌声，就算决定了。焦都督提议，推谭延闿为民政部长、阎鸿飞为军务部长。有人说：“阎鸿飞现时不在湖南。”焦说：“他很快就会回，可先由阎鸿藻代理。”革命党人中认识阎氏兄弟的人多，又是一阵掌声，作为决定。当推参谋部长时，谭延闿推荐原湖南军事参议官刘邦骥出任，陈作新随着说：“很好，很好。”大家没有表示异议。会议至此告一段落。在欢声中，大家齐向抚台衙门集合，再商议各司的组织。

抚台衙门变成了都督府。随后都督府宣布李治为秘书监。并设顾问厅、督勤处、主计处。有功人员一律安置在顾问厅和督勤处，等候调派。又决定成立陆军四镇：以余钦翼为第一镇统制；赵春霆为第二镇统制；易堂龄为第三镇统制；阎鸿藻为第四镇统制。新政权的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大致就是如此。

“中华民国军政府”和“都督”等名称，都是同盟会事先规定的。各省光复后，一律采用。湖南光复时，却闹过一次笑话：谭延闿当了民政部长。民政部所出的头一张布告，署衔为：“中华国民军政府湖南民政部”。那时革命刚刚胜利，“中华民国”四个字在人们脑子里，还是相当生疏的。一般老百姓搞不清楚，并不奇怪；而身任民政部长的谭延闿，竟不懂得，几乎使人无法相信。民政部秘书拟稿时原来写的是“中华民国”，谭延闿在画行的时候

用笔一勾，成了“中华国民”，交到总务司刻印，张贴全城。后为成邦杰所发现，告谭延闿说：“‘中华民国’错成‘中华国民’，太笑话！”谭延闿说：“你才是笑话！”成邦杰气愤极了，便去告知文斐。文斐上街看了布告后，再向谭延闿说明：“民国”是对“帝国”而言，就是说把帝国反正过来，成立民国。谭延闿听了老文的说明，说道：“我总以为我不错，竟错了！谢谢你的指教，并请转谢成先生。”随即借另一件事，印出一份加大的布告，加贴在那张布告上面，用以遮羞掩丑。事隔十多年，谭延闿做了国民政府主席。一次，请柳聘农吃饭，柳又提起往事对谭说：“文牧希（文斐字）曾告诉我辛亥革命时，你当民政部长，民政部出布告，头衔印的是‘中华国民军政府’。后来，冯玉祥组织了‘国民军’；于今你又是‘国民政府’的大主席。若是相信迷信，确是事有预兆。”谭延闿举杯一笑。那时，他的内心是认为光荣还是认为羞辱，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七、革命党和宪政派的一场尖锐斗争

湖南光复后，成立了一个临时参议院。这个机构的设立，是以湖南谘议局议长谭延闿为首的宪政派向焦达峰都督提出的。九月初一夜里，革命党人还齐集在都督府开会。到会的人因为筹备发难，好几夜不曾合眼，一两天没有好好吃饭；眼见军政府的组织有了头绪，不免松了一口气，只想回家去休息一下。谭延闿不是革命党人，在起义成功后，才邀约他到教育会去开会。一些崇拜在旧社会有名望的人的先生们要抬出他来当民政领袖，结果如愿以偿。而谭延闿野心未足，想把旧谘议局变为临时参议院，便利用大家精神疲乏的时候，施展他的阴谋。谭延闿说：“革命告成，我们要建立的是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应设议会，一则表示新

邦的民主作风，二则可以聚集各方贤达，集思广益。”焦都督当即问大家意见怎样？曾杰和吴孔铎都说：“可以设立临时议会。”只有文经纬认为：议会是应该设立，但现在就设，未免为时过早；我们的一切设施，都处在草创时期，此刻设置议会，可能对于革命政府的动作，发生牵掣。大家在精神十分疲乏中，对于文经纬的发言，没有人注意，更没有多加考虑。匆匆忙忙，随随便便就算决定设立。

第二天一早，谭延闿将参议员名单提交焦都督，请秘书监即发聘书。当天下午，谭延闿就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院长。谘议局改名临时参议院，参议员中多数是旧谘议局的议员，还有一些和谭延闿有勾结的士绅，其中也容纳了极少数的革命党人。选举结果：谭延闿当选为院长。文经纬（他也被聘为参议员）当时站起来说：“已就民政部长的谭部长，以行政领袖不能当院长。”谭延闿说：“我辞去部长就是。”这时外面有人对陈作新说：“美国的参议院议长，是由副总统兼任，你可向议会提议。”陈作新随即向参议院交涉。参议院的答复是：“军人不能当议员。”谭延闿果然向都督辞部长职，经焦都督慰留。谭辞部长不脱，又不肯辞议长，就用混水摸鱼的办法，来一个两全其美。

参议院要夺都督的权力，就提议制订一个“都督发令条例”。“条例草案”中规定：“参议院有权规划军民全局行政用人事宜”；并规定：“都督的命令必先送参议院审议同意，盖院印送还，才可发交各属执行；未经参议院盖印的，各机关得拒绝执行；又参议院认为应兴应革事宜，可先行决议送请都督交各属执行；参议院的决议，都督不同意时，可以送还请求复议，经复议后已盖院印文件，都督不能再持异议，应即执行。”这个条例草案传到都督府，谭人凤就说：“参议院要夺都督的权，不行，不行！他们胡作

乱为，应即先行取消参议院。”于是一场尖锐的斗争展开了。参议院那些阴谋家就到处散布谣言，诋毁革命；并挑拨陈副都督和焦都督的关系，搞得满城风雨。九月初四，阎鸿飞由岳州赶回长沙，初五就湖南军务部长职。宪政派的人对阎说：“参议院因为都督专权，正想法将都督的权力移到军务部。你可以从中消除都督反对‘发令条例’的意见。”阎鸿飞知道说话人用意所在，只好回答：“我刚回省，还没有听到都督提及这事。”初六日，参议院开会讨论“都督发令条例”，他们请都督到参议院发表意见。焦都督要阎鸿飞代表出席。当时会场气氛很紧张。谭延闿首先简略说明本议案提议的经过和理由，宣布应对条例作详细的讨论。有一个姓彭的议员说：“这个条例，为的是保障民主，防止独裁。议会越有权，国民就越幸福。大家应该赞成通过这个条例。”接着又有一个议员作应声虫，说了一些议会的尊严，议会为国民谋幸福的废话。谭延闿说：“请都督的代表阎部长发表意见。”阎鸿飞说：“我是军政府的代表。军政府对于这件议案，觉得非常严重！现在是革命的开创时期，东、西、南三面都是敌人，我们要对敌作战，一切都应置于军政之下。议会是明理的，不应干涉都督执行军政军令的大权。照文明各国的惯例，议会在战时对军事从不牵掣。军政府一定尊重议会。将来有媾和订约等事，当先请议会通过，然后执行。至于将都督的军令先送参议院审议，实际上窒碍难行，应请撤销提议。”忽有一位参议员说：“我们是‘临时参议院’，‘临时’就是表明革命性。革命的议会，自有其革命作风。防止独裁，就是革命。”阎鸿飞说：“把独裁的头衔，加于军政府，只能说是笑话。”谭延闿只好说：“军政府既另有主张，本案的讨论，暂且搁置。”

这件阴谋夺取都督权力的议案，闹了一阵子，结果虽然“搁置”了事，然而斗争接踵而来。革命党人都是胸襟磊落的，提到

权利，便觉可耻，一言不合，即行引退，对于世路的险恶和敌人的阴谋，并无警惕。不久便发生了焦、陈两都督被害的事。真是惨痛的教训！

八、焦陈殉国，竖子弹冠

都督府的卫队是九月初二日组成的。由军械局拨来新步枪一百二十枝，又在被服厂领到全新的服装。初三，就被陈作新副都督将人枪分去一半，另组织卫队第二队，驻又一村训练，作为副都督的卫队。

都督府的门禁，因新成立的卫队肯负责任，盘查较严，那时一些对革命有功的人，居功自大，觉得太受拘束，好些人对都督说：“现今清朝已被推翻，无人再敢于反抗革命。府门门禁太严，有点类似独夫的作风，而对宾客出入太不方便。最好训示卫队，凡佩有符号或由佩有符号的人陪同出入的，免于盘诘。”都督也认为民国时代，不应有旧衙署的官气，即时命卫队长以后只注意符号的有无，不要盘查过严，态度更应客气，以发扬自由平等的新作风。卫队得令，自然就对警卫放松了。不过十天，就酿成匪入府门，不曾阻止，以至都督被戕的惨剧。

九月初十，忽接报告：北门外和丰洋火局有许多人挤兑（和丰火柴公司发有钞票，流通甚广，素著信用；这次发生挤兑，显系有人故意制造事端），陈副都督亲率卫队二十人前往弹压，行至文昌阁附近，被预伏在那里的反革命匪徒所戕。

其时，另有反革命武装匪徒百余人，进至都督府，先缴去卫队的枪。其中有一个军官模样的匪徒指挥十多个武装士兵直入都督办公室，将焦都督拥出府门。焦都督问：“你们要怎么办？”匪徒说：“要杀你。”焦都督说：“要杀就在这里！”说完，就在都督

府前坪立着不动，昂头用两眼直望着高悬的自由幸福旗，任匪徒一阵乱刀斫死。这位实年二十五岁的青年革命英雄，就这样为国为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这段经过事实，是当日焦都督的一位差遣彭福生亲见亲闻，对我说的。曾见有某种记载说焦达峰临难前说了许多牢骚话，那是不真实的。

彭福生还亲眼看见匪徒用马刀在焦都督尸体上去掏他的口袋，并割下衣襟一块，蘸着血向照壁上写下：“焦达峰系匪首姜守旦冒充，应予处决。”这个匪徒手中还拿有一张纸条，看一个字，往墙上写一个字。写完，又向尸体看一看，踢几脚，才结队往东而去。老百姓从九月初一起，就对焦都督怀着好感，忽见被杀，又说是土匪冒充，一时弄糊涂了，不晓得革命究竟是搞些什么。

焦、陈被杀的事情传出后，立刻就有新闻记者到处采访新闻，打电报到汉口、上海。所以当时的报纸上都说：“焦达峰系匪首姜守旦冒充被杀。”听说长沙本地的报纸在九月十一也登载了：“焦达峰系姜守旦冒充”。还有些记载说：“杀焦、陈的人是黄忠浩的旧部，为黄忠浩报仇”，也是不确实的，

有个传说：军务部长阎鸿飞也是匪徒要杀的对象之一，被他见机逃脱了。实际上阎鸿飞当时由又一村一张朝东的大门走出，经巡道巷（又一村东面一条东西小巷，是贡院和抚署相通的、巡查队的交通道）的时候，还从后面飞来一弹，击中裤裆，裤上打了两个小洞，皮肉还未着伤。好险，好险！另一说：梅馨等原拟将阎鸿飞一起杀掉，因为阎鸿飞兼湘鄂义军总司令，知道他和湖北的关系密切，有所顾忌，不敢下手。这似乎颇近情理。但是飞弹何来？则是疑案。

焦、陈被戕害后，不几天街上就盛传都督被杀是梅馨干的事。

梅馨原是混成协一个管带，军政府已任他为标统。梅不满意，曾向焦都督表示要当协统。焦都督毫不迟疑答应他的要求，说：“可以升协统，编入第三镇。”梅馨因第三镇镇统易堂龄从前地位比他低，不愿受易指挥。焦都督说：“那么就编入第四镇。”梅又说他与阎鸿翥素昧平生，不愿共事。梅的希望是当独立协的协统。焦都督说：“独立协的名目，原议是没有的，等和大家商量再说。”梅馨很不高兴而退。第三天就搞出戕杀长官的乱子。

谭延闿做了都督以后，梅馨一帆风顺，由旅长、师长，一直升到长宝镇守使，显然是谭延闿提拔的。据说：谭延闿曾将库银一万两赠梅馨，作为游历欧美的旅费，湖南财政司有案可稽。后来梅馨并未出国，就在京沪一带将这一笔杀人的酬劳费挥霍掉了。另有传说：梅馨杀焦、陈是事先得到某巨公赠送的五千两，由梅包办的；梅部执行杀人命令的官兵，官长每人得到犒赏三十元，目兵每人得到十元。雪里不能埋尸，得到犒赏的有一百多人，那有瞒得住的事。又有一种传说：反动派起先只要杀焦都督一人，某有力者说：“连陈作新一起干了，免得老陈不安分，又要搞‘扶正’（意即做正都督）。 ”

某历史家有名句：“龙虎风云亦偶然，欺人青史话连篇。”曾见有人在所写辛亥纪事的材料中说：“焦达峰总不能脱江湖绿林习气，革命时头上扎的是包头”。其实扎包头的何止焦达峰一人：九月初一武装起义的革命党人都是扎的包头。陈作新在初二日才用二龙戏珠的旧帽徽，中间嵌一红珠。协统王隆中是新军编制，援鄂出发时，也是扎的包头。这位作者还指出焦达峰有一个“四正”两字的图章，说“四正”就是把天罡星的罡字拆开来的，焦达峰是自命为梁山泊的天罡。关于这点，笔者倒想找点历史证据，替焦达峰辩白一下。焦达峰在萍、浏、醴起事时，曾任铁血军总司

令李经奇的参谋，起事失败，和甯调元一路亡命日本，化名为“冈头樵”（这是因为孙文曾化名“中山樵”而仿效的）。从此焦达峰署名只写一个“冈”字，艸书的花押作“𪔐”，这是在《艸字汇》一书中摩仿的。懂艸书的人只能认为“冈”，却不能认作“𪔐”。同时，焦达峰是四正社的领导人。据焦达峰说：“最初他曾和甯调元、何弼虞、文公舒等人在东京组织了“四正学会”，也是搞革命的。四正的用意是心正、身正、名正、旗正。后来在湖南也组织了四正社。由此看来，焦达峰用这个签章也可能是有意造作的。他何曾知道在他死后，会有人拿着这个签章做材料来诽谤他。追记五十年前的经历，是过来人一件心中感觉沉重的事。老泪纵横，就此搁笔。

辛亥长沙光复的东鳞西爪

余 韶

湖南辛亥九月初一(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二日)革命的爆发,主要力量是陆军第二十五混成协(又称新军或常备军,以后简称新军)。但巡防营、水师营也是及时响应,一致行动的。

当时,我叫余斐生,是四十九标二营左队四棚的一个副目,对于军事情形是耳闻目见的。现就记忆所及,东鳞西爪地写出来,以供参考。

新军受革命宣传的影响有年,素质较优。协统姚广舜是一九〇四年由湖北陆军中挑选来的。以后逐渐由将弁、武备、兵目、陆军速成这些军事学校的毕业生接替了行伍出身的军官。而士兵是不能升官的,当时有这样的话:“副目出了头,正目封了侯;若要刺刀长一节(长一节就等于官长的指挥刀),除非四镇成八协”。

一九〇九年,又有日本士官生余钦翼、曾继梧、王隆中等十余人分任教练官、管带;而士兵有文化的也很多(有秀才、中学生),喜欢偷偷阅读《猛回头》《警世钟》等鼓吹革命的书籍刊物。因此,革命风气比较开得早些。陈天华那首“大地沉沦几百秋,黄烟滚滚血横流。伤心细数当年事,同种何人雪寇仇”的诗,也感动了一些人,加深了对清朝的仇恨,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一九〇六年,禹之谟入狱被杀后,有些人看了他的披发遗像和传略,深觉可惨、可敬,更加激发了对清廷官吏的无比愤慨。

新军中有些人与同盟会有联系，如陈作新在炮兵右队当排长时，曾将陈天华的《猛回头》等印成小册子散给士兵看。管带刘玉堂知道了，本拟将陈作新逮捕送协部法办。队官陈嘉猷说：此事一经正式揭露，牵涉必多，闹大了不好收拾，不如设法将陈作新调开，弭患于无形。刘玉堂深以为然，不久，就以陈作新不宜于炮兵为调，将他调到四十九标二营前队当排长。

一九一〇年，湖南大闹米荒，饥民抢碓坊、米店，烧抚台衙门。全城鼎沸，情势汹汹，军警全部出动戒严。陈作新认为这是农民起来了，想乘机大举，连忙去找管带陈强说：“报告管带，机会到了，我们拥护管带”。陈强问：“陈排长，你讲什么啊”！陈作新说：“管带在日本留学很久，自然知道的，不用排长多嘴。”陈强怕惹祸，故装不懂，喊声：“护兵，陈排长吃醉了酒，送他回去”。以后又借故将他撤了差。

焦达峰是一九一〇年七月回长沙的，住在玉皇坪陈作新家。阎鸿飞、李洽都同焦达峰很接近，帮助他与军队及各方面接头。

湖南的清廷官吏，对革命风声早有所闻，想极力预防与压制，派出许多密探刺探党人行动。中路巡防营统领黄忠浩（眇一目，多机诈，人称“小诸葛”）向抚台余诚格献策：新军要造反，只有巡防队靠得住，可将新军分散开往各县，削弱革命势力，调巡防营集结长沙，巩固城防，以资镇压。一九一〇年八、九月间，先后将四十九标第一营开往通城，三营开往蒲圻、羊楼司，五十标第一营（欠后队）开往醴陵、攸县，第二营开往宁乡、益阳，第三营开往常德。留在长沙的仅有四十九标第二营、五十标第一营后队、炮兵营、工程营、辎重队、骑兵队。十月十日前后，调到长沙的巡防队有十多营，他们都发足了子弹，驻在四面城墙上。其实，巡防营的革命情绪虽不如新军，但有很多同情革命的，尤

其是由新军过去的积极分子（如徐鸿宾、杨振基等）与党人早有联系，互通声气。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首义，一声炮响，湖南新军士兵震动了，人人兴奋，个个激昂。原有代表及新进积极分子在外面的活动更加频繁，或与党人接头参加开会，或与各部联络互通消息，并先后在紫荆街、贾太傅祠、水陆洲、清水塘、朱家花园等处开过会，但在清吏严防、密探四布之下，有时人未到齐，有时会只开一半就散了。少数人的会谈反能避开密探耳目，议出点结果。当时曾经作出的措施有：派袁天锡往宁乡雇来刻字匠在落星田定忠客栈密刻都督印信；派袁剑辉赴宁乡购来小镞子（小刀）九十九把，准备发给有武术的人出外活动；在义昌祥衣店定做号衣（店主刘芝德是同志）；派周岐、李洽、唐容在实业学堂造炸弹；推定洪复生、洪兰生、余鲲、李午云、余化龙等分别与水师营联络；总之，压力愈大，抗力愈强。后来新军的人竟暗藏刺刀，准备与密探格斗。

武昌首义消息传来后，在营士兵不论白天晚上、操场讲堂，三五个人一碰头就议论纷纷：有的说，湖北反正了，湖南应赶快响应；又说，湖南接应慢了，只怕湖北站不住，有人说怕巡防营反对；也有人说巡防营不会反对，硬要反对也不怕。性子急的人还想跑到湖北去投效，参加打仗；多数主张要在湖南搞起来，反对个别地跑到湖北去。每逢代表出外回来，就忙着打听消息，询问如何行动。群情岌岌，有一触即发之势。新军的纪律素来严格，此时为形势所迫，官长们对各代表外出不敢过问，对在营士兵的叙谈也不管了，偶然碰到也装做不见不闻，悄悄地走开。他们既不敢参加，也不敢阻挠。

十月十七、八日，焦达峰、陈作新与安定超、丁炳尧（四十

九标二营左队一棚、九棚正目)、杨玉生、徐鸿宾等密议决定：十九日晚起事，由炮兵营的吴舜臣在马房草堆放火为号；但部队没有都通知到，且事泄，吴被捕（到九月初一反正才出来），未成功。

十月二十一日，忽听到炮兵营要开差，群情愤激到了极点。因为当时一般人认为大炮有无上威力，以为炮兵营一开差，起义就搞不成了。焦、陈及积极分子连夜开会，准备不顾一切，于十月二十二日（九月初一）起事。当时拟定，以四十九标二营（欠后队）联合炮兵营由小吴门入城，打抚台衙门；四十九标二营后队邀五十标进北门到荷花池军装库抢子弹，工兵营到药院子（现在的湖南医学院）邀辎重营、马队，由北门进城，占领草潮门、大西门一带，并担任西城巡逻。计划虽定，但一时无法通知部队，预定第二日清早要各积极分子向部队传达。怕传达不到，又派人到军队必经的路上与部队联络，指示行动。

十月二十二日本是星期日，照例放假。左队官长们有的头晚夜假未回，有的吃完早饭就出去了。只有士兵得到了要行动的消息，没有一个出外，都扎紧绑带，心领神会地静坐等候。前、右、后各队的情形也是一样，彼此对着窗口，以目示意。

左队的安定超、刘光荣、骆兆荣（四棚正目），一清早就出外联络去了。八点左右，丁炳尧跑得满头是汗地回来，取出两个哨子交给李希能、傅勋华（傅现尚健在）二人，喊一声：吹！哨音刚起，大营门集合号也响了，大家取枪下楼，哗啦哗啦一阵响，都跑到营部抢子弹（新军平时不发子弹）；有的抢到一两颗，有的抢到一两排，又分给未抢到的。大家跑到营集合场，习惯地按前、左、右、后次序站成连纵队、营横队。达时没有一个官长，只有前队队官胡兆鹏默默地走来，大家也默不作声地看着他，相持了一会，胡以温和的口气问：“弟兄们，你们今天要做什么呀？”我

见没人答话，就站出来说：“我们要排满兴汉，请队官指挥。”胡慨然说：“好！”便抽出指挥刀走在前面，队伍成四路纵队跟着出了大营门。这时，工兵营的队伍也赶来了。走到惜字炉，路边有人喊：“快去邀炮队进城呀！”前面的队伍加快了步子向炮队走去。又有人喊：“后面的队伍快去邀辐重、马队走北门进城啦！”工程队就跑过去了。

炮队的士兵也作好了准备，坐在棚内等候。我们的先头才进侧门，他们就哗的一声涌下楼来，跑到炮房把大炮拖出来，接着步炮秩序向小吴门急进。

这时，城门关了，城墙上站满了巡防营的士兵，都是全副武装的。大家一怔，赶快把队伍沿城墙下摆开，一片声喊：“开城！”巡防营的人带笑的说：“城门锁了，钥匙抚台衙门拿去了。”城下的人喊：“不开城就打！”城上的人都俯身摆手：“不要打呀！已派人拿钥匙去了。”我喊：“这时还要什么钥匙，把锁砸烂！”正在这时，由新河开来一列火车，我们喊停车，打了几十枪，火车开过去了。又回来喊开城，有的要爬城上去，有的喊：“开炮轰城！”炮兵营就拖两门炮对城门口一摆，啪啦两声拉开炮门将空炮弹装进炮膛（因为当时没有炮弹，只有操练用的弹壳），我们自己只好出来做好做歹的喊：“莫打，打不得啦！这一炮开了，小吴门正街的人都会死光。”当时怕有其他变化，炮兵营有一连开到校场坪占领阵地去了。

正在相持不下，忽然城门开了。原来新军中清早进城的采买，得到消息，都挤到城门边来了。工兵营的赖福春（大个子，力气大，外号赖草包）等将城门锁打开，跑出来眉飞色舞地喊：“城内晓得了，快进去！”步营就进城向抚台衙门走去，炮兵把炮拖上城，向城中放列。

城内的人民都兴奋地站在路边看，还有些铺子当时就搞些白布旗子挂起来了，表示欢迎。

我们的队伍走到乐古道巷口，街上有人喊：“快去打抚台衙门！”胡兆鹏带着前队跑步去了。又有人喊：“快把人到荷花池劫子弹！”我就带左队拐弯经茅亭子到荷花池子弹库去。

子弹库大门是开的，没有卫兵，有一个人象是库员，站在屋檐下笑着向一旁咧嘴。我们顺着这个方向走去，进到弹药房间，这时二营右队也跟着来了，大家把子弹取足，连忙经稻谷仓到抚台衙门去（二营右队好象是到藩台衙门去了）。走到又一村，本队队官杨万贵来了，老远就扬着手高兴地喊：“好了，好了！抚台衙门打开啦！黄忠浩捉到了！我们到谘议局去。”

胡兆鹏带着打抚台衙门的队伍，走到辕门外，那里的卫兵是善意对待我们的，我们的士兵也喊：“弟兄们不要多心，我们都是汉人，我们只反满人。”当时衙门内的卫队营立刻表示和我们一致行动。进入大堂，余诚格正和他的卫队营的一部分人讲话，一见我们到了，装着很镇静地说：“弟兄们，我们都是汉人……，湖南都是好百姓，你们不要杀人。”随即用白布亲书“大汉”二字，叫人挂在桅杆上，他就进内堂去了。大家见他表现还好，就没去管他。

炮队营头目吴连宾、李金山同前队一路进去的，想抓黄忠浩，但不认得，只是喊莫让黄忠浩跑了。其实黄忠浩就站在余诚格旁边。他后面的一个差官向前咧嘴暗示，大家涌上去，把他抓出来往外拖，当时就有人打了他几个嘴巴，有的还用刺刀在他的背上戳，拖到小吴门，把他的头割下来，挂在城墙上示众。

焦达峰、陈作新随即进了抚台衙门，把抚台衙门改为都督府。余诚格当晚在又一村的围墙上打一个洞潜逃了。听说是有一个大士绅帮助他逃走的，余还在他家中歇了一夜。

四十九标进入抚台衙门不久，五十标易棠龄带的队伍也由又一村侧门进入衙门。

我们到谘议局后，杨万贵说：“绅商各界要到这里开会，我们担任保护。”当时派出几个卫兵，其余都架枪休息。

下午一点钟左右，开会的人陆续进来，焦达峰、陈作新也穿着军服来了。陈作新一见我们，就走拢来说：“弟兄们，你们都有大功，个个要升官。”四十九标教练官王隆中也来开会（标统黄鸾鸣奉命到永平阅操未回），协统萧良臣躲在协部未动，下午就潜逃了。

过了一会，会议厅已到了六七十人，穿长褂子的最多，有的交谈，有的私语。随即开会。焦达峰发言说：“我是奉孙文的命令来的，孙将湖南的事交给了我。”接着又有几个穿长褂子的人发言。我因站得很远，听不清。后见一个人拿着一张大红纸铺在桌上，另一个人执笔写，有些人围着看。写完，墨迹未干就贴在墙上，上面写着：“公举焦达峰为正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后来有个名叫常治的自治会的人发言，他说：“现在举出的正副都督是临时的，将来还要正式改选。”焦达峰听了，现出很不高兴的样子（有人说，焦曾拔刀示威，但我当时未看见）。当时有个巡警道申茂锡和长沙县知县沈瀛，因不赞成反正而表现不好，当场决议，将他们两个处死。还有一个在外面趁火打劫的，也在谘议局门外杀了。

五点钟前后，我队奉命到藩正街保护官钱局（现湖南省人民银行所在的地方），局中职员非常欢迎我们，弄了很好的饭菜招待。

这时，全城已基本安定下来，大家以为没事了，象平日一样开铺睡觉，我还钻到大门内一个柜子中睡了，门口只派了两个卫兵。大概二三点钟的时候，突然一阵枪响，子弹由前门打到里面来了。大家慌慌张张起来，抓好枪，只见两个卫兵已倒在血泊中（一个叫夏纪佑，另一个忘了名字），队伍挤在中进门口。杨万贵

也怔住了。我喊：发冲锋号冲出去！随着号声，大家喊着：杀！杀！……冲出门，枪声立即停了。我们向两边街上追了一阵，没追到人。后来打听是巡防营一部分人想来官钱局打起发的。

次日下午，我队又奉命开到金盆岭担任警戒。忽然传来风声，有几个巡防营要替黄忠浩报仇。一时满城风雨：有的说，由常德开几个营来了；有的说，有一个营已到了天心阁；有的商店还关上铺门，人人紧张起来。新军预备对付，陆军小学学生约二百人，也到了校场坪警戒。过一阵，还是无事，大家虚惊一场。

十月二十四日（九月初三），我到城内去，走到都督府，看见陈作新、焦达峰在大堂上摆两张大桌子办公（陈在外些，焦在内些）。他们身上都斜挂白布带子，上面写着：“正都督”、“副都督”，还盖有大印。其余职员也是这样地写着自己的职衔。我还看见一个高大个子，穿着军装，挂着指挥刀，头戴一顶军帽，上有四道金边，两边各有一个金衬，红宝石帽徽。旁人告诉我，这就是赵春霆，原任巡防营管带，新委第二师师长。我看着他那神气，心里发笑。因为师长的军帽只有两道金边，两边各有三个金衬，而军长的军帽也只有三道金边，他竟搞出四道金边，一个金衬来了。

当时前来要官求职的很多，焦、陈应接不暇。我看到一个青年人站在大堂上，焦达峰问他做什么的，他说：“我会写字。”焦往里面一指，说：“你去当书记吧！”这人走到里面，看到几个人都背着白带子，上面写着“一等书记官”、“二等书记官”，有人指着旁边桌上一捆空白带子，要他自己取一条写上职衔，他就拿了一条，写了“三等书记官”五个大字。后来看到别人要官不怕大，他又后悔没有写成一等。又有一个吴连宾（湘乡人）向焦、陈说：“我这回是有大功呀！我要招一标人。”焦、陈也不敢还价，就写了一个“某标标统”的白带子给他，他领了两万块钱去了。后来

听说，吴第二天又去要钱，军需说：“标统，你昨天刚领几万块钱去，今天又来了，你也要有个细账才行。”吴就拍着桌子大喊：“我大人做大事，有个什么细账嘞！”另外有几个在那里表功要官的，这些人大有拔剑击柱之势。我觉得太乱，颇不以为然。

陈作新由焦达峰桌边走来，看见我就招手喊：“你来了，到这里来坐。”我走到他的办公桌边坐下，他亲切地问：“你想搞什么？”我被他问住了，因为我根本没想到这一层，来这里只是看看热闹，没什么目的。只好回答：“我不晓得搞什么！”这时焦达峰那边有人找他，他起身，对我说：“你坐一坐，不要走，我就来的。”我坐了一会，不耐烦走了。

十月二十五日，标部传来命令：现在要扩充军队，准备派人去招新兵，正副目通通升连排长。有些人就赶到藩城堤荒货店去买指挥刀，一下就买光了。我也买了一把。

第二天，有人来说：“现在湖北战事吃紧，我们湖南要派队伍去增援，驻在大西门的甘兴典部，请命援鄂，王（隆中）统领已向都督府自告奋勇，愿开四十九标去。大家升了官的愿不愿意丢掉不做，仍就原来的职务？”当时，普遍的心理是怕湖北失败，大家表示不要升官了，仍回旧职，到湖北打仗去。

十月二十七日队伍就集合到大西门外上船，并发了饷，准备第二天出发。有人说：“我们现在不做清朝的奴隶了，把辫子剪掉吧。”大家齐声附和，立即动手，并向船老板借来几把剪刀，我帮你，你帮我，很快就把全队的辫子都剪光了。

十月二十八日清早开船，很多机关、学堂各界代表都到江边燃放鞭炮欢送。三十日到岳州，停了一天，同标一、三营都开来了，湖北又派了一艘“快利”轮船来接，队伍继续向湖北进发。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辛亥湘西光复经过

黄 穆 如

凤凰为清代湘西的政治、军事中心，又是辛亥湘西光复的先驱。叙述湘西光复的经过，必须以叙述凤凰的光复为主。

一、清廷在凤凰所设的统治机构

清政府为镇压苗族人民计，采用傅瀚“均田、屯兵、防苗、安边”计划，调镇台、道台各一员，坐镇凤凰。镇台以下：设置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外委、额外等军职，共八十一员；马兵、战兵、守兵，共四千六百四十名，称为“镇标”，每年俸饷七万六千余两，由长沙藩库按季发给，官兵口粮则由屯谷开支。道台（全衔：湖南省辰沅永靖兵备道）以下设置守备、千总、把总、外委、额外等军职五十六员；练勇一千零六名，屯丁四千名，称为“道标”，俸饷口粮均由屯谷开支。在行政方面，道台独揽三府（辰州府、沅州府、永顺府）一州（靖州）五厅（凤凰直隶厅、乾州直隶厅、永绥直隶厅、古丈坪厅、晃州厅）十四县（沅陵、泸溪、辰谿、溆浦、绥宁、通道、会同、芷江、黔阳、麻阳、保靖、永顺、龙山、桑植等县）之行政大权，兼握七县（凤凰、乾城、永绥、保靖、古丈、泸溪、麻阳）屯政，是当时有权、有势、有钱的官儿，被称为半边抚台，为湘西最高无上的统治者。同时凤凰又是湖南、贵州、广西三省的军事重地，如咸丰、同治年间贵州

的苗民反清，屡调凤凰兵，协助西路统领周宏印前往镇压，光绪中期，广西游勇肇事，又调凤凰兵随同湖南巡防营统领黄忠浩前往镇压，足证过去湘、桂、黔三省的边境，一有事端，凤凰是可以举足轻重的。

二、凤凰光复前的酝酿

武昌起义，长沙不稳消息传到凤凰后，道台朱益潜采取对抗态度，一面与省垣巡防营统领黄忠浩(黔阳人)秘密联系，一面分电乾州协台徐先发，永绥镇台梁国治，密查党人和会帮，并严禁宣传，违则拿办；又密商黄忠浩，将凤凰镇台周瑞龙(湘潭人)所辖之“镇标”精兵抽调一千六百余名，由镇标中营游击杨让梨(黔阳人)率带赴省，一则增加省城防务，一则削弱镇标实力；朱则厚集兵力，扼守厅城，并监视镇台周瑞龙及其侄女婿田应全(同盟会会员，留日学生)、邑绅张胜林、沈宗嗣等之行动；复派兵占据军装、火药两局，使周更不敢有所举动。

朱道既对田应全等监视甚严，周镇台精兵又被抽调下省，军装、火药两局，复为朱道占据，加之“镇标”所留之士兵，概未武装，不能战斗。处在这种形势下，田、张、沈等不敢猝然发难，遂密商决定，联络会党，发动苗汉人民，从外进攻，并暗与道标守西门之哨弁杨再春、守南门之哨弁向总如、守东门之领旗陈学斌、守北门之额外江斐全和驻中军衙门代理游击马子林等联络，约定只等外攻一到，即由内接应。

田应全等得道标官兵同意后，立即派人前往凤属之长宁哨，与哥弟会首唐世钧接头，组织“光复军”，并约定十一月二十八日拂晓袭击厅城。

三、朱益潜的城防布置

朱益潜非常机警，城防布置，随时调换，使对方不易捉摸，难与官兵接头，并可以随时打乱其接头计划。如在十月二十七日以前，即将由南门至东门、北门的防务，改由道标左营头、二、三、四队替换防守；由北门至七步卡、笔架城的防务，改由道标右营头、二、三、四队替换防守；笔架城以下，从山神庙到小西门防务，改由道标哨弁杨再春防守；由小西门到南门一带防务，由镇标前营都司邹润波防守；并从龙山县调回哨弁滕景龙，令驻守东门外大校场；另调枪兵一班驻守插草坡碉堡内；东门外之小校场，则调长卡百总田应松驻守，与滕景龙取联系；刚由洪江解运枪弹回凤之哨弁方振鹏、副哨滕文显、郑能文，则令驻守南门外龙王庙，分兵向白羊岭、祠堂坪警戒；又虑杨再春兵力单薄或不稳，调郑能文助守，兼管城防锁钥；令警员袁星德率枪警十余名，日夜梭巡，城防兵力共计约近千人，所持枪械，均属当时锐利武器。

四、凤凰光复经过及其影响

凤凰哥弟会首脑唐世钧，既与同盟会会员田应全等，商组光复军，确定举义日期后，立即派其亲信弟兄田平臣、周三林、田华堂、杨尊卿、田燕平、胡世古、龙冬狗、唐世华多人，分赴新寨、龙角洞、鸭堡寨、牛岩、得架、乌头、满家坨等苗寨，与苗族会帮首脑接头；并指派其亲信彭顺臣、唐侦元往来城乡，传递消息。唐世钧本人则亲上贵州松桃厅属之樟葛镇，与该地哥弟会首脑张尚轩接洽。张极力赞成，并立即约集会党及乡村群众开会，到者一千五百余人；张说明“驱满复仇”大义，待时出动。至于

新寨之龙凤山、龙角洞之龙廷贵，鸭堡寨之龙义臣、牛岩之吴正明、得架之唐世国、乌头之杨春元、满家坨之龙光福等，一经接洽，无不乐意；尤其是各寨人民，听到推翻清朝，共报世仇，更为热烈响应。他们于十月二十七日以前陆续集合于长宁哨，共到五千余人；还有闻风赴义群众跋涉在途者，络绎不绝。足证苗族人民被清朝毒害之深而复仇之急。这时距约定起义时间尚有一月，唐世钧恐聚众日多，风声难免不泄露，乃不暇通知田应全等，竟于十月二十七日半夜出发，进袭厅城。

光复军兵力之分布：以张尚轩之众约一千六百余人为一路，取道老官庙、祠堂坪，直袭西门；以龙凤山、龙廷贵、龙义臣、吴正明之众约千余人为一路，取道青坪湾、金家圆直袭北门；以唐世国、杨春元、龙光福之众约一千七八百人为一路，取道插草坡、老营哨，直袭东门；其余群众，或劝其暂时回各寨，或留在后方接应。

城防官兵因朱益潜随时调换防地，田应全一时难与接头；加之唐世钧等提前发动，事前没有通知，内外失掉联系，故张尚轩一路到达祠堂坪时，田栋臣前往叫门，郑能文不应。张众又被白羊岭守军发觉，开枪射击，幸得左营守备田炳南，右营千总朱瑜林，事前密嘱士兵不准伤人，故枪皆朝天发射，张众得以安全退却。

唐世国、杨春元、龙光福一路到达插草坡时，驻碉堡内之一班清兵都到河边碾房烧火取暖，毫无戒备，一经包围，全部缴枪。义军进至小校场，又夺得屯丁枪械五十余枝，士气更壮；迨至大桥头时，与滕景龙的桥头伏兵接触，展开激烈争夺战。双方战斗正酣时，杨让梨由沅陵县派来请饷之一班士兵，正宿桥头客栈，闻警助战，居高临下，以密炽火力封锁桥头。义军提刀持矛，反

复冲锋，前仆后继，牺牲甚众，城内毫无接应。唐世国、杨春元、龙光福等为避免过多伤亡，有挫锐气，令暂向后撤退，再图大举。

龙凤山、龙廷贵、龙义巨、吴正明一路进至金家圆公安殿时，不见城上接应，又闻各方枪声甚密，恐受包围；适值张尚轩一路向后撤退，警员袁星德，又率枪警掩至，开枪猛射，各路已失掉联系，情况不明，亦不得不向后撤退，待机再进。

当光复军出发时，各背苗土备(苗乡中最大的土官，清政府多检用苗族中的坏分子充当，在苗乡擅作威福，压榨同族，较清官吏尤甚)初存观望，及至各路义军撤退时，他们等在中途，挡路截拿，解城报功邀赏。如张尚轩及其部下二十余人，退至新寨途中，即被新寨苗土备吴国春截拿解城，壮烈牺牲。这次攻城之役共计牺牲一百七十余(包括城内外被捕杀之二十二人在内)，事后仅收获遗骸七十二具，分葬于播草坡、金家圆、豹子湾三处，光复后，刻石立碑，表扬先烈。

唐世钧等攻城虽遭受损失，暂时撤退，但仇讎未复，群情愤激，唐等传书四方，再大集松桃、凤凰、乾州、永绥四厅苗汉人民，誓攻凤凰厅城，擒斩满奴朱益濬；凤凰城内流言四起，一夕数惊。田应全、张胜林、沈宗嗣和才赶到凤凰之同盟会员罗绍武、贺成达等乃乘人心惶惑，草木皆兵之际，由田应全用火砖密刊湖南军政府印信，缮写布告，黑夜派人张贴于道台衙前之照壁上，借以瓦解军心，更使朱益濬惶惑疑惧，不敢妄动，只有困守孤城，坐以待毙；而凤凰、乾州、永绥、松桃四厅苗汉乡村，这时更便于号召群众，图谋再举。时值凤凰镇标请饷官滕代春和举人聂仁德由省回厅，尽量披露大局情况，并说：“省城要俟凤凰光复后才能发饷，我们回至途中，看到镇台长子局璜奉同盟会之命，已将

杨让梨捆送湘西巡按使龙璋处法办。”消息传出，人心大快，向义讨贼，跃跃欲动。

十一月十二日，田应全、聂仁德、张胜林、沈宗嗣、田学经、韩善培、梁叔铭和同盟会会员罗经武、贺成达、青年学生向阴生、张伯琨，刚由省奉命回厅策动光复之凤籍军官杨新国、曾君聘等在天王庙，召集地方父老和人民群众开大会。由戴新门执笔写信给道台朱益潜，促其表示态度。朱见人心反清，大势已去，复函表示愿洁身引退，要求保全身家护送出境。十一月十三日，全城悬旗鸣炮，庆祝光复，电省报捷。并经众决议，建立新政权，设“湘西军政分府”，公推周瑞龙为军政长兼管屯政，聂仁德为行政厅长，张胜林管财政，田应全管交际，韩善培管教育，唐世钧为镇标前营都司，田栋臣提升哨弁。朱益潜和凤凰厅同知张绍斌不予留难，让其出境。

清朝为了镇压苗族人民计，在凤凰厅、乾州厅、永绥厅皆设置重兵，号为“三厅子弟兵”，军政虽各不相属，而行政则直隶凤凰道管辖。因此，三厅皆称直隶厅。乾州、永绥两厅，一切措施，向惟凤凰马首是瞻。凤凰光复消息传到乾州厅后，协台徐光发（益阳人），厅同知李谦六，约请地方士绅及兵民群众开会，申明愿交出军政权，离厅回籍，经决议：协台军职由镇溪游击刘锐（凤凰人）暂代；厅同知职务得电省委员接替，先护送协台徐光发回家。乾州遂于十一月十五日宣告光复。永绥厅情况大致相同。靖州光复，原在长沙之后，凤凰之先。系由该州驻防军队领哨兼教练姚忠诚（乾州厅人）率众起义，直电省城宣告光复。事为凤凰道朱益潜所闻，立即派兵前往镇压，并悬重赏缉拿姚忠诚归案，姚因众寡不敌，离职逃省。其他各县，虽闻风向义，因无兵力，不敢妄动。自凤凰光复后，乾州、永绥两地相继光复，其他兵力薄弱和毫无

兵力的各县，一经传檄，都告光复。事后，闻旅省人士说：“凤凰光复电报到省，大街小巷鸣锣宣传，人心大定。”足证凤凰的光复，关系湖南大局，实属不小。

（政协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员会供稿）

谭心休招抚宝靖始末

李 晴 云

辛亥年，我跟着谭心休招抚使到宝庆，在宝靖招抚使署住过几个月。兹将亲身所经历的、至今尚憧憬在目的几幕，撮叙于后。

湖南是九月初一光复的，谭心休先生曾参与其事。

初九晚，我到驻省邵阳中学谭先生处探问，当时邵中几个教职员及几个同乡也在座。有一位同乡说：“日来本校同人接到家乡来信，说到宝庆四乡匪风大起，匪徒倡言：‘皇帝既已打倒，现在我们可以各显神通’；过去潜伏在高山的‘大王’，现已开府到平地来了；过去蛰伏在乡村偷牛盗马的强盗，现在招集一班流氓，强取豪夺，似此扰乱社会秩序，将来怎样收拾？”另一位同乡说：“照你说的还只是我们县里一隅的情形，我近日看到朋友的信说：湖南反正后，从安江、洪江到靖县的道路简直不通，真是萑苻遍地，行旅艰难；看来湘中、湘南也是糟得很。”谭先生说：“那么，明日我向祖安说说，他若留我在湖南，我要他假我一个名义，到宝庆去走走看。”

九月初十日，都督府委任谭先生为宝靖招抚使的公事下来了。公事上大概说：“贵使可从省标拨兵一营随带往宝；兵不敷遣时，可就地招募一二营听用；器械饷糈，由省供应。使署各职司及军营弁目，概由贵使委派，毋庸关白来省。……”这时，曾伯兴、唐伯龙二人亦到，推荐新化谢玉麟为招抚使所辖部队的标统，谭

使欣然接受。

九月十三日，标统谢玉麟和第一营营长王汉斌(字梅卿，邵阳人)率领队伍先到湘潭等待。十四日，谭使和我们一班随员坐轮船到湘潭，随军出发。十八日，抵达宝庆近郊的龙眼桥，城里各机关团体及乡绅几百人都集合在这里欢迎；独宝庆都督邹介人回新化去了，都督府只留下他的一位小姐办理交卸。

九月二十日，刘安民呈上推选营长名单，请谭使圈定。姚平阶(使署同事)对谭使说：“你老现顶着宝靖招抚使的头衔，如果湖南西南一带有什么风吹草动，需兵必多，省署既允你老招募一二营，那末，再多招募几营也不要紧。一个招抚使统领五六营，不算多，军饷横竖出在省里。”谭说：“那也不必多募。我由省带来了王汉斌一营。宝庆原有巡防营营长徐振岱现已晋省，我当电省请将这一营拨归我节制。现只准备三个营的营长，兵弁则由各营招募补充。”于是圈定石基、岳尧民、孙九初三人为营长。

过了一天，谭使指定各营的驻扎地点：第一营营长王汉斌驻队使署，新编第二营营长石基驻队府学宫，新编第三营营长岳尧民驻队天符庙，新编第四营营长孙九初驻队临津门李氏宗祠。原巡防营改编为第五营，营长仍是徐振岱。当时宝庆由各地回籍的丁壮甚多，一闻城里招募新兵，麇集来城，故新编二、三、四营的兵弁，一二日便已募足。但因反正不久，人心未定，加之仓卒招募，选择不严，故各营所募兵弁，流品极为复杂；又因王营是四十九标分来的，徐营是积久盘踞邵城的，今以新旧不同的部队，猝然组合，同驻一城；且以新任标统谢玉麟上下关系不够，情感与威信均未建立，自不免管教困难，问题丛生。因此，新营组成之后，不到数日，就演出了九月二十九日晚兵变的一幕。

九月二十九日下午五时，我由使署出来，见仪门内外拥挤着

枪兵多人。我到太平巷李氏试馆内询问使署总稽查李棠卿：“出了什么事情？”他说：“李先生！你在署内还不知道吗？现在的三营连排长及军佐等职，都是由谢标统选用武备学堂的学生，第一营与巡防营的兵士不服。他们认为：我们在军营积劳多年，未蒙选用一个当官，他们学生一出学堂门，便当起官来，那我们永世不能出头了，还出来吃什么粮，当什么兵？因此，老营便煽动了新营，群起反对谢玉麟，气势嚣张得很呢！”

我回到使署，见门口的枪兵越发拥挤。他们见我身上挂了出入证，未加阻拦。我直到谭使室内，见辉煌烛光下，谭使同署内职员，团坐在一桌饮酒，有说有笑。我问：“你们知道外面的事情吗？”姚平阶一把牵住我的手道：“晴云！你何必这样惊惶！坐着喝酒吧！”我见他们这样泰然，以为他们早有成竹在胸，便放下了心。刚刚坐下，就听得炮子响了。谭使和他们仍然坐着未动。枪声越响越密，屋瓦嚓嚓作响。只听得乱兵喊道：“我们保护谭都督，我们勿惊动谭都督！”这时，有两个枪兵抢入室内说：“都督！你老快避到巡防营内去！”随即又有两个徒手兵士进来，搀扶谭使走入巡防营驻地——双桂轩，我们也随从而去；只听得隔屋的使署内，倾箱倒篋，军需室内的银洋哗哗作响。谭使倒在巡防营的床上，闭着眼睛，不声不响。驻署的一营营长王汉斌始终未露而，也始终未见他出来弹压。约一小时后，枪声止了，银洋的声响也沉寂了，使署与巡防营两处都无动静；城内城外远处还有枪声间作。这时刘安民、唐梨严手提灯笼进来报告说：“顷据进署的人来说，第二营、第三营的兵士混乱的很。我们想请招抚使手令到该两营去安抚一下。”谭使即手书“各守营盘，不得乱动”的手令，盖上招抚使关防，交与刘、唐二人。我请示谭使后，与他二人同出使署，见街道上巡查的枪兵，一队一队地走着。我们持有招抚使的

手谕，无人阻拦。

十月初一早，我进使署探知：二十九晚只有城里某井溺毙一岳姓厨师，想是被人仇杀；人民财产并无损失，署内军需处被劫去几千元银洋，职员衣物损失约值几百元；标统谢玉麟和他所派用的几个连排长，均在那夜逃走了；昨日使署开了个军事会议，各营兵弁革去约十几名；军需主任姚崇举自请辞职，继任的为王锦初，系招抚使的妹婿；署内庶务归朱薰南一人负责。过了几日，我家听得城里兵变，父亲特来城促我回家，我报告谭使，即随父亲归家。

我家住邵阳南路下花桥，环村二三十里远近，平日尚称安静。这次我住在家里，见附近的村庄，多设有小的匪巢。他们虽没有公然出来杀人放火，但打鸡打狗、偷牛偷猪的行为，时常发现。我写了封长信向谭使报告一切。过了几天，我应谭使函召，再到宝庆城里。

一到使署，见谭使每天办匪，各营队伍也时常下乡剿匪。捕来的恶匪，以隆回、溆浦、安江及南路四望山一带为最多。捉来匪徒，一讯确知为匪的，即行斩决。杀匪没有虚日，或日杀十数人，或日杀数十人。仪门以外、清风阁以内、大路两旁人头累积。一天，我对谭使说：“匪固当杀，但罪情有轻重，请你老注意审讯，有可以原宥的还请原宥。”他说：“晴云！你的书生习气全未脱掉，《书经》上不说过吗：‘辟以止辟，刑期无刑’。古语又说：‘惟杀人斯能生人’。这些匪是害群马，杀害马才能保全得众马。以后杀匪，我还想要你们这班书生亲手动刀去试试，你还怜惜他们吗？”

我这次来署，已是十一月的天气，我陪着胡摯怀、左五云两先生围炉谈天。一天，我们听到使署审问欧阳协和一案，我便问胡老：“欧阳协和在我们邵阳不过是一个湘乡籍的纸商。他在邵阳

到底做了些什么坏事？邵阳各界为什么对他这样切齿？”胡老说：“欧阳协和有几个臭钱，会放官债。邵阳的官府到任，无不巴结；邵阳公私案件，无不包揽；公私产业，无不侵蚀；倚着衙门包庇，横行霸道。邵阳人无奈他何。谭使是个负气的公绅，最恨这个刁徒，会见时便骂，有时还想动手打他。他时时想寻机报复。当谭先生丙午年办理公葬陈天华于岳麓山事，与官府作对，官府指谭为革党领袖，他借着这个隙端，侦知谭先生那年年底由上海回家时，就到县告密，幸谭脱走广西。欧阳协和是个神通广大、罪恶滔天的贼子，是我们宝庆地方的巨蠹，若不除去，将来贻害无穷。”这时厅上正在审讯此案，我约左五云到厅上看看，见欧阳协和与其从恶曾卜生等一千人在案下。欧阳协和的年纪约在七十上下，须发苍白，面虽瘦削，却带一股蛮气。曾卜生是个胖子，年约四十上下，面露笑容，现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公案上叠着诉告他们的案卷，约有两寸多高。问官问欧阳几件案子的大概，他出言不逊。问官叫个衙役打着他跪下，掌嘴几十皮鞭，他爬在地上坐着。再问曾卜生：“那几案你可在场？”曾卜生老早跪下，说他与欧阳并无多大往来，欧阳作的事，多不与他商量。问官大怒，骂道：“你是邵阳县的败类，仗着会说会写，依傍欧阳协和门下混饭吃；关于邵阳地方的公款公产，件件你都拿着在他面前献殷勤，作谋主，邵阳人那个不知你是欧阳协和的狗腿子。今日你开口便说得这样干净。来人！给他暂且打两点钟的板子，再来问他。”只听得一声吆喝，将他拖倒在地，板子便响起来了。过了数日，闻听欧阳与曾两名都判决上站笼处死。从此邵阳地方的土豪恶霸气势，稍稍敛迹了。

在九月二十九日夜使署兵变后，谭使颇具戒心。署内募集了善于技击的卫兵一队。一天，有县署警备队长脚占魁解到土匪一

批，中间颇有几个凶恶的，谭使叫出问话，他们突然挺进，想直扑谭使。当被卫队击毙两人，余者被卫队徒手搏倒。谭使即将余匪数名，在署内阶前斩决。

这时，三、四两营分驻到洪江、会同两地；第二营石基率队在邵阳四乡剿匪；第一营王汉斌率队在四乡督促乡长等毁庵院，办学堂，并焚毁偶像，强迫男子剪掉辫髻。

时际腊月中旬，往时正是冬防吃紧的时期，现赖谭使办匪严厉，宝靖一路，绝无拦路抢劫行旅情事；即邵阳四乡，过去匪警骚扰，平地村庄都立着匪兵巢穴，现已灭迹；有些老匪已在平地立寨的，现也销声匿迹，远窜高山密林，不敢露头，且常被营兵兜剿，不断地被捕送城正法。因此，谭使政余暇时颇多，常到双桂轩闲谈醉饮。有时高兴，对我们说：“到是当匪风蜂起的宝庆，我们能够在此度过太平年节。”我们附和着说：“这是由于招抚使的刀快，能够把乱麻斩绝所致啊！”他抚掌大笑。

过了夏历年后，谭使奉到督署公函，大意说：宝靖一带既承贵使招抚就绪，仰即督带所有军营来省交卸，兵饷由督署发给。谭使一面飭属办理交卸，一面调回洪、会两地军营，打点返省之计。到正月底，留石基营代徐振岱巡防营在邵阳驻扎，余军尽行开省。正月廿八启行，二月四日抵省，驻留黄泥墩某公馆赶办交卸手续。一日，谭使对我说：“同盟会有人发起，订×日在东长街老鲁班殿集合开会，要另行改组。晴云！你去不去？”我说：“我在上海承你老介绍入同盟会时，原为革清朝的命，现在清朝的命已革了，还存个同盟会名义何用？鄙意管它是个新的、老的，都不愿预闻了。”谭使付之一笑。

再过了几天，关于使署交卸册卷，都已造好。谭使返上海，我们送他走后，才回邵阳。

（政协邵阳市委员会供稿）

启蒙时期青年运动的急先锋——禹之谟

邓 介 松

第一个印象

禹之谟别号稽亭，亲友叫他稽猛（猛，乡音读去声，含有不顾厉害的意思），也有人呼为“长毛”（吾乡对太平军的称呼）。守旧派为了表示对他鄙薄，一般称他为“织匠”。他家住湖南湘乡县三十一都义安乡貽则堂（现改属双峰县），与我的老家相去不过十里，两家世有往来。禹久客于外，在江南的时间很长，我于一九〇四年始识禹于长沙。

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先父带我到长沙参加小考。长沙府属各县考试，例在夏季举行。旧长沙市街道狭隘，人烟稠密，砖木房屋，石板道路，夏天烈日熏蒸，热不可当。我父子住在湘乡试馆，日夜汗流浹背。禹之谟所办的湘利黔织布厂，设在长沙城内戮子桥。那里，地方比较空旷，房屋也还高大。一日下午，我父带我去见禹，就在那里乘凉。我初见禹，印象特别深刻。那时，我还拖着小辫子，穿着长衫子，而禹则穿粗布青色对襟短衣，不剃发，不结辫子，也不盘发于顶，散发长三四寸，垂耳边。他的年龄同先父差不多，都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两人清瘦相似而强弱悬殊。禹目光炯炯，极健谈，声音宏亮，精力特别旺盛。

清县考试制度童生应考的要两个保人，做保人是廪生的职

务。第一保人为认保，就是保人与被保人相互认识，保证考生身家清白，遵守试规，无冒名顶替及其他犯禁事项。考生照例向保人交纳制钱四百文，请盖保戳。富家子弟随意多送，有交纳一两，一元，一串的不等。这是廪生的可靠收入。至于所谓廪饩，尽管法有定规，每年纹银八两，但从不发下，也从来没有人领过，全部在藩库里干没了。第二保人为派保，按各县考生人数，平均分派于各该县的廪生作为保人。考生照例向派保交纳制钱一百文。考生进场时，学台坐堂点名，唱名时呼某某保。廪生立公案旁边，答应某某保，然后发给试卷，进入考棚(试场)。

先父时为廪生，正在保人送考。禹之谟痛诋科举制度，劝先父勿再从事于此，尤其不要贻误后辈。先父不仅不以为忤，并且很以为然，两人愈谈愈起劲。谈至甲午、戊戌、庚子各役，更远溯至太平天国时事，禹痛骂清廷之腐败昏暴，摩拳擦掌，认为非革命排满不可。谈及吾乡人物，禹斥曾国藩为汉奸，而吾父言必称文正公，彼此稍有齟齬。禹忽另换话题，以诙谐语调问先父：“府上的老革命党现在怎么样？”这是指先叔金弼，于一八九四年在牢田聚众造反，事败，同党朱八虎，王真石，曾春荣等数十人皆惨遭杀害，斩首抄家，我家几遭灭门之祸。先叔侥幸免死，但长期不露面于旧社会，被视为漏网。我家认为这是家丑，讳言其事，惟恐人知。在禹的影响下，先叔果然又振作起来，他偕禹的妹夫陈翼郎同赴日本留学，回国后也倡言革命。但往往简单从事，方法就是剪辮子，在乡里引起不少纠纷。先继祖母在世时，常要出谷米以赔偿了事。禹善于鼓动，不放过每一机会和每一个人，即此可见一斑。

我初次听了禹之谟这一番新奇的议论以后，幼稚的心弦怦怦然颤动了。夜饭后，禹上楼授课，我随往听讲。学生就是厂内的

工人和艺徒共约五六十人。那夜讲史记《游侠列传》。禹绘影绘声，听众心领神会。我久在私塾，读的是诗云子曰，讲的是八股策论，枯燥无味。听禹讲课，上下古今，议论风生，更觉得比塾师讲解高明得多了，由此我决心要进学堂。经我父同意，试罢回县，我就进了本县的中学堂。这个学堂是由旧东皋书院改的。我的祖父曾坐过这个书院。中学堂的监督和教习是我祖父的学生，我父亲的朋友，没有经过考试，就把我收为插班生。我开始学习英文、数学，很感兴趣。但对于国文、历史各科很不满意，以为还是老一套，倒不如禹教的好。

为乡里创办新学堂而斗争

一九〇五年，清廷明令废科举。禹之谟于腊月中回乡号召青年进学堂。以青树坪为中心的六个乡（旧称六都），青年响应的就有五十多人，我兄弟二人在内，约期齐集永丰（现为双峰县城）。禹预先在永丰雇了四个倒扒子（永丰河里船名），亲自送这一批青年进省，一路殷勤照料，并宣传革命排满。

那时长沙学校还不多。官立的只有高等学堂（岳麓山）、实业学堂（落星田）、游学预备科（草潮门）、工艺学堂（戩子桥）、中路师范学堂（城南书院）、求忠学堂（荷花池）、陆军速成学堂和陆军小学堂（小吴门外）等几所，名额也很少。私立学堂只有明德、经正（后与明德合并）、修业（最初只有小学班）、长郡（长沙府属十二县联立）及长沙师范学堂等几个中等学堂。此外有教会所办的雅礼学堂，学费很贵，农村青年负担不起。为了安顿这一批青年，禹之谟倡议就湘乡试馆及与试馆毗连的昭忠祠开办湘乡中学堂和师范学堂。试馆原是科举时代士子应试时的宿舍，昭忠祠是祀咸、同年间湘军阵亡的湘乡县籍的官兵的。

禹之谟在长沙创办湘乡中学堂和师范学堂，自己首先捐银百两并向湘乡在省绅、商募捐开办费。同时召集旅省同乡开会，决议提拨湘乡宾兴公(全县学款管理机关)的学田租谷及其在长沙的房产租金为经常费。守旧派反对这个决议，而新派则坚决执行，明争暗斗，形成对立。新派以禹为首，以湘乡中学堂及师范学堂为中心。旧派以程希洛为首，以劝学所为中心(程为劝学所长)。每逢县里开学，双方针锋相对，甚至动武，大打出手。有一次举行丁祭(祀孔)后开会讨论教育事项，省方代表黄本溥(高等学堂学生)发言，要求教育经费独立，财政公开。旧派集团竟大声怪叫将黄轰下台来，并加以殴辱。

湘乡县学款历来全由旧派把持。食盐附加学捐，向由贪官劣绅伙通经收附加盐税的畅远盐行狼狈为奸，化公为私，共同分赃。新派查出这个黑幕，组织清算。一九〇六年夏季，省城各学堂放暑假时，湘乡在省学生四、五百人，整队回县，我也是其中的一分子。这个队伍，由禹之谟率领，到知县衙门请愿，要求追赃惩犯。知县陈继良，老奸巨滑，运用两面手法，一面接受学生要求，立即拘拿畅远盐行经理到案，打了几十板子，收押追赃，限期缴款。那经理出具甘结和票据，知县保证全数提充教育经费。请愿队伍解散了，学生们各自回家了。那知县就在这个时候密报省方把全部责任加诸禹一人，说他“率众谋乱，哄堂塞署”。

为了发动青年促进革命，禹之谟只顾多办学校，多收学生，任何艰难困苦，皆所不辞。在创办湘乡中学堂的同时，禹又在长沙和几个朋友创办另一所中学，初名广益专修科，后改为广益中学堂。这个学堂一直成为长沙有名的私立学校。

禹之谟祖籍邵阳，迁居湘乡已经好几代了，但凡大坝桥禹姓仍用邵阳籍贯，科举时代，须在邵阳参加考试，故与邵阳人士保

持一定关系。禹在创办湘乡中学的同时与邵阳新派领袖石广权（蕴山）等，就长沙黄泥堰邵阳试馆创办邵阳中学堂和师范学堂。衡州、永州各府在省的新派知识分子亦由禹推动，依照湘、邵办法，相继就衡清试馆及永州试馆开办中学。这是规模较大的几个。其他各县仿照办理的也不少。一时民立学堂好比雨后春笋一样。每一学堂都有几个积极分子与禹有联系。这样，禹就成了新学运动的核心人物。

禹之谟努力兴办新学，大为旧派所忌。有一天，王龙文（湘乡人，探花）与我父亲谈话，我在旁边。那时我已剪了辫子，穿学生制服。王对我父亲说：“你为什么听任子侄辈跟禹织匠胡闹？这不仅会败坏你的家声，而且是得罪名教的。你不怕做名教的罪人吗？”王龙文的话是很有代表性的。

在几次重要的群众运动中

二十世纪之初，美国政府以防疫为名烧杀檀香山华侨多人。全国痛愤，发动支援华侨、抵制美货运动，并反对美商的粤汉铁路建筑权。一九〇五年夏秋间，长沙方面积极响应这一运动，群情愤激。在这个运动中，禹之谟实为最主要的鼓动者。

旧派根本反对修铁路，反美运动又不触犯旧派集团的利益，因此对于这一运动，旧派采取旁观态度，极小一部分人甚至表示赞成。但在运动发展中，群众起来了，旧派也就害怕起来了，对禹开始注意并怀疑了。

第二年，有公葬陈、姚二烈士于岳麓山的事件。一九〇五年，日本政府发布取缔中国留学生条例。留学生愤怒反抗，准备全体退学回国。陈天华是同盟会会员，他恨日本政府侮辱同胞，摧残青年，忧愤万分，以至投海面死，遗书鼓励同学毋忘革命。翌年

五月，上海中国公学也发生风潮，留日学生姚宏业投黄浦江自杀。陈天华是新化人，姚宏业是益阳人。两人灵柩运回湖南，禹之谟倡议开追悼大会。各校学生全体参加大会。禹演说极动人，听者悲愤万状。群众高呼革命，声势惊天动地。大会决议公葬陈、姚两烈士于岳麓山。官府不准，并出示严禁开会。禹主持公葬筹备事务，不顾禁令，积极进行，定期公葬并组织全省学生送殡。

公葬的那一天，学生万余人，整队抬柩，由大西门横渡湘江，浩浩荡荡，奔赴岳麓山会葬行礼。时在夏季，当时学生穿白衣裤，戴平顶草帽，足登薄底布靴。送葬队伍绵长，步伐整齐，声势浩大，仪仗庄严。奉官方命把守渡口拦阻灵柩通过的兵丁，在这种形势下不敢执行命令，鹄立河边看热闹，有的还表示同情。送葬队伍高举旗帜和挽联祭帐。挽联都是带标语性质的，此外还散发了很多的传单和小册子。队伍的最前面，高举着禹之谟亲笔所写的两首挽联。其一云：“杀同胞是湖南，救同胞也要湖南，盼中原起义，首看湖南，烈士甘捐躯，双棺得赎湖南罪。”对边我只记得“事夷狄辱汉族，攘夷狄不辱汉族”两句。这一联是烈士自己作的。另一联云：“其所生在芳草美人之邦，宁赴清流葬鱼腹；以一死作顽民义士之气，奚问泰山与鸿毛。”这是别人所作，请禹代书的。前者是战士吹号角，后者是词人弄笔墨，风格不同，而皆传诵一时。

经过这一次大规模的运动，官方确认禹之谟为仇敌，动了杀机。有侦知官方消息的，密告禹暂时躲避。禹毫不介意，对革命事业更抱乐观，对组织宣传工作更加急进。

同年，又发生了揭露劣绅俞浩庆事件。事情是这样的：长沙县学款向由劣绅们把持，小学教育经费，全听他们支配。学款本来充足，而小学经费支绌，教师待遇微薄到不能维持最低限度生

活。俞诰庆是举人出身的，把持学款多年。他生活奢华腐化，常出入娼寮妓馆。教师们恨他极了。一日，俞诰庆在福源巷私娼处冶游作乐，有教师几人路过这里，识破了并且诘责了他。俞诰庆恼羞成怒，指挥仆人等殴打一位教师，激起教师们的公愤，合力还击，并剪了俞诰庆的辫子，这是旧社会拿奸的办法。双方闹得不能了结。当时有两位教师走告禹之谟，要求设法解决。他责备教师们行动失当，但仍亲往肇事地点，出面支援。时闻风而来看热闹的挤得水泄不通。禹当众骂了俞诰庆一顿，并提议送请学务处惩办。大家同声赞成，蜂拥至学务处。学务处总办张鹤龄（别号小圃）出见，简单地说了几句话，大意是：俞诰庆暂由学务处看管，听候查办；教师们要好好教学，勿在外滋事云云。张在旧官僚中是赞成新学的，但他处世极圆滑，对俞诰庆的看管查办，不过是临时应付的官话。群众散去后，俞诰庆就从学务处后门溜走了。案子表面上消弭了，而劣绅集团引为奇辱大耻，怀恨在心，密谋报复，一面运动同乡京官，参劾张鹤龄去职；一面包围三司（抚台，藩台，臬台），陷害禹之谟。

禹之谟的被害

张鹤龄去职后，清廷任吴庆坻为湖南提学使，学务处撤销了。吴庆坻为王先谦门生，曾任湖南学台，守旧仇新，顽固异常。以王先谦为首的旧派集团与吴庆坻沆瀣一气。吴庆坻到任后，极力摧残新学，首先解散游学预备科，说它是革命党机关。

游学预备科有英文、法文、德文、东文各班。我是英文班学生。功课排得最紧，以外语、数学、理化为主课。当时人人准备出洋，很少想起或关心政治问题。教职员中只有学监苏鹏，数学教员曾杰是同盟会员，与禹之谟有联系。苏鹏不大活动。曾杰是

活动家，但不到一学期就因故离开了。国立学堂为青年运动基地，官立学堂师生中与禹有联系的也不少。游学预备科并不突出，何以独被指以革命机关而被解散呢？原来几个官立学堂的监督，中路师范谭延闿、实业学堂曹典球、法政学堂胡子清，都是王先谦的门生。工艺学堂监督张鸿年（一般称为票大人，因他中过湖北签捐票头彩，得银五万元，捐官分发湖南候补），陆军小学堂总办俞明颐都是候补道。只有游学预备科监督罗永绍（仪陆）是日本留学生，不是由科举出身的，罗又经常穿短衣，步行，这在封建统治集团看起来算是异己分子，因而把这个学校看作了革命党机关。

游学预备科解散之时，正是禹之谟就义之日，这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而是反动集团的预谋。由于禹之谟在青年学生中深得人心，每逢有政治活动，只要禹主持，青年们就闻风响应，使统治集团不能不望而生畏。畏之愈甚，恨之愈深，谋之也就更急。禹赤手空拳，但他与青年血肉相连，有群众为之后盾。封建统治集团虽蓄意要杀禹而迟迟不敢下手，就是怕引起风潮，事态扩大，反不利于自己，故而等待机会下手。至湘乡知县密报禹之谟造反的文书到省，正值暑假期间，学生都已离校回家，散在各县。统治集团认为杀人的机会到了，遂于深夜派抚署亲兵包围禹所办的湘利黔织布厂，捕禹下狱。

散在各处的学生闻讯，不待暑假期满，纷纷自动回到长沙集合。青年们义愤填膺，奔走呼号。禹之谟家属生怕群众暴动，威胁禹的生命，欲侧面设法营救，可是毫无结果。

就在那年秋天，以焦达峰为首，结合帮会力量，在浏阳举义。省方派兵镇压，义军奋勇抵抗。省城戒严，传说潜伏城内的革命党与浏阳义军里应外合，即将起事。官方怕革命党，于是将禹之谟移解湘西的靖州（今靖县）监禁。靖州知州金蓉镜，是闻名的

酷吏，堂讯时诬骂革命党非人类（语见禹之谟遗书），禹严词反驳。经过各种酷刑拷打，禹始终不屈。狱吏也说从没有见过这样的硬汉，比之为关云长。

同盟会员陈荆为禹之谟同里老友，亦早被官方悬赏通缉，为谋救烈士，不顾己身安危，于此时到靖州探监并谋劫狱。陈荆贿通狱卒，出入狱中，为禹医治创伤，侍奉饮食衣着，一面在外布置，准备越狱。消息走漏了，州官大索城中，缉拿陈荆。他逃到黔滇山中，辗转潜入越南。州官禀报省方，说革命党到处煽动暴乱，禹之谟不死，祸将不测。这个报告与省方蓄意杀害禹的阴谋一拍即合，省方电复知州，令其“就地正法”。英勇的青年运动的领导者，就这样牺牲于靖州。时在丙午年阴历十二月二十四日。

禹之谟就义前夕，自知必死，用两个血肉模糊的指头夹一秃笔写下遗书。全文如下：

我所最亲爱之在世同胞鉴：

世局危殆，固由迂腐之旧学所致，亦非印板的科学所能挽回。故余之于学界有保种存国之宗旨在焉，与若辈以摧残同辈为手段者势不两立。于是乎有靖州之监禁。不百日，而金牧提讯，所发不成论理之问题，无非受人意旨，阴谋秘计，横为成见，是以所答动遭无礼之驳詰，不能置词，且曰尔辈牛马耳，人欲食则食之，有何爱焉？禹之谟正告同胞曰：身虽禁于囹圄，而志自若；躯壳死耳，我志长存！同胞！同胞！其善为死所，宁可牛马其身而死，慎毋奴隶其心而生。前途莽莽，死者已矣，存者诚可哀也！我同胞其图之，困心衡虑，终必底于成也！

禹之谟，四十一岁，丙午十一月十九日。

靖州狱中遗书。

遗书原件曾存我手，送覃振看过，并有他的题跋。抗日战起，我辗转迁徙，惟恐遗失，将禹遗书交与他的长子夷苍保存。

金蓉镜以杀禹之谟有功叙升知府。我曾在禹的从弟泽亭处看到金所著的《破邪全录》，自述酷刑审讯禹之谟的详细情形。其中所载禹的供词，都是志气凌厉，充分表现了坚贞的革命气节。辛亥革命之后，禹的家属曾呈请湖南都督府行文金蓉镜原籍缉拿金贼归案法办，未得结果。

辛亥革命以后，改葬禹烈士于长沙岳麓山。湘乡颜昌晓撰墓志铭，备述烈士言行。文见《珍珠山馆文存》。

关于邹永成的二三事

邹 协 勋

邹永成字器之，新化人。十七岁时，随其伯父沅帆在湖北求学。先是沅帆随清公使瑞澂留学英、俄，返国后，创“中国舆图学会”于武昌，拥资雄厚。而器之先生早在孙中山先生组织同盟会前，即已同黄兴、谭人凤等从事革命活动于湖北。因经费困难，器之先生倡议绑架沅帆的儿子安众（字郑叔，其时与器之先生同起居，解放前，在汉口任交通银行经理），索取赎金，以充革命活动费用。当由器之先生设计将伯母张氏及其家人，用酒（内放迷药）灌醉，然后率引革命党人将安众掳走，幽禁于汉口日租界。器之先生自己装醉，睡在隔壁房间，直到大家惊惶失措的时候，他又伪装寻找，并从中斡旋，诱迫伯母出赎银八百两，帮助了革命活动费用。

辛亥革命后，器之先生与宋教仁为了策划革命事业，往返日益密切。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宋教仁在上海被刺，器之先生不胜悲恸。当时，有些革命人士灰心丧气。器之先生则大声疾呼，定要倒袁，重振革命事业。一时难遂所愿，遂于某日早晨，投黄浦江自尽，幸经亲友赶到，得救。在投江前，曾在某旅馆留下一诗：

轰轰烈烈十余年，
驱逐胡虏著祖鞭；

不料猿猴筋斗出，

共和成梦我归天。

当时沪报争相报道这一消息，《申报》的报道是：今晨黄浦江边有一青年壮士，西装笔挺，投江自杀。群以为桃色事件，殊不知其为革命党人也。由于器之先生的企图自杀，激励了党人的倒袁斗志，加强了为宋教仁报仇的决心。

器之先生性情爽直，沉默寡言，是个不为利诱威迫的硬汉。袁世凯当政，谭延闿窃据湖南都督。谭是杀害焦达峰、陈作新的首恶，器之先生与之誓不两立。谭颇畏惧，总是找机会向器之先生卖好求和，或者设法把他调离湖南。最初聘请器之先生为都督府高等顾问，被他拒绝了；嗣又函介袁世凯，请予以重用，他也置之未理，仍旧奔走于湘、鄂、赣各省，从事革命活动，力图倒袁倒谭。后来，倒袁运动勃兴，谭又摇身一变，参加讨袁。某日，谭对器之先生说：“我们这次要请器之先生为湘赣鄂三省联军总司令；”并送给他一笔较大的款子，请其赴汉设立总部。先是，一九一二年秋，黄兴回长沙时，据说谭延闿曾馈送巨款，为黄所拒绝。当时，器之先生闻知，大怒说：“谭延闿这东西，把黄兴当作何等人物，竟送他这么多的钱！你真有钱参加革命的话，也要送一笔巨款给我。”至此，谭果真送给他不少的钱，他又大怒说：“谭延闿真把湖南人民的钱不当数。我去湖北倒袁，何需这么多的钱？”

器之先生生平疾恶如仇。蒋介石独裁祸国，他恨之入骨。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间，我在南京辘轳兵学校学习的时候，间常于星期日进城探望他（住南京虹庙11号），经常听见他骂蒋介石是强盗，是卖国贼，对于我影响最深。某次，他由国民党中央党部回家（当时他是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委员），气愤愤地同我说：“黄兴死后，蒋介石从来没有举行任何仪式纪念他；谭延闿

民国十年才参加革命，死后，倒还在纪念周上纪念，真是岂有此理！”一九三五年五月，黄郛签订何梅协定后回到南京的时候，器之先生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纪念周上，愤怒地说：“今天等黄郛到来，我们要把他揍死在总理像前，看是谁叫他卖国的！”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六年间，我在重庆联勤总部任职时，器之先生赁居重庆山洞一间矮小的破烂民房，我也经常去看他。他曾对我说：“中央党部的真正老党员没有几个人了。现在有好些所谓老党员是假冒的，我拿着他们的假材料就向火里丢，烧掉了不少。”又有一次对我说：“我曾当着张溥泉讲：‘溥泉，你是彻头彻尾地变成官僚了！’”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个别地方经作者作了订正）

